



国外马克思主义译丛

马克思学是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的研究。其考据研究和文本解读研究以及取得的理论成果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书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梳理和译介，试图从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基本观点、研究方法等多个层面，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新阶段和新特点，以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料 and 理论参照，为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和理论空间。

鲁克俭 / 主编

《大纲》：超越 马克思的马克思

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意] 奈格里 / 著 张 梧 孟 丹 王 巍 /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ISBN 978-7-303-11921-9



9 787303 119219 >

定价：30.00元



国外马克思主义译丛

鲁克俭 / 主编

《大纲》：超越 马克思的马克思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大纲》: 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 / (意) 奈格里著; 张梧, 孟丹, 王巍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1
(国外马克思学译丛)
ISBN 978-7-303-11921-9

I. ①大… II. ①奈… ②张… ③孟… ④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①F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9366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55 mm × 235 mm

印张: 16.2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策划编辑: 饶 涛 祁传华 责任编辑: 祁传华 郭 瑜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 总序 ·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筹划和准备，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正式推出这套“国外马克思学译丛”。现就译丛的编译旨趣、编译原则和工作分担问题作一简要说明。

对于“马克思学”^①这个术语，国内外学术界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我们认为，如果不过分纠缠于吕贝尔创制 *Marxologie* 这个法文词的特定含义，而是从广义上理解，马克思学就是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的学术性研究。

^① “马克思学”的法文和德文都是 *Marxologie*，英文是 *Marxology*，俄文是 *марксоведение*。

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的研究成果通常是马克思传记。比较有代表性且已译成中文出版的有弗·梅林的《马克思传》(1918年)^①、东德学者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著的《马克思传》(1968年)^②、苏联学者彼·费多谢耶夫等著的《马克思传》(1973年)^③、苏联学者斯捷潘诺娃的《马克思传略》(1978年)^④、英国马克思主义家戴维·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⑤等。

关于著作版本的研究成果有几种形式：一是马克思著作年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院长阿多拉茨基主编的《马克思年表》(1934年)^⑥、吕贝尔的《没有神话的马克思》(1975年)^⑦等；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题注”以及MEGA2资料卷对马克思著作(含手稿)和书信的写作时间、版本情况、文本写作过程和手稿修改等情况的介绍；三是马克思文献学专家发表的有关马克思著作版本考证的研究论文。

关于马克思思想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专著，包括以下几种形式：(1)马克思思想传记，如吕贝尔的《马克思思想传记》(1957年)^⑧、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1954、1958、1970年)^⑨、麦克

① Franz Mehring, *Karl Marx.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Leipziger Bchdruckerei A. G., 1918. 该书有两个中译本：一是罗覆南译本，由上海骆驼书店1946年出版，三联书店1950年出版；一是樊集译本，由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

② 中译本由易廷镇、侯焕良译，三联书店1978年出版。

③ 中译本由孙家恒等译，三联书店1980年出版。

④ 中译本由关益、李荫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⑤ 原书名是《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与思想》，1973年出第1版，2006年出第4版。中译本由王珍根据第3版和第4版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2008年再版。

⑥ 中文版由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该书在索引部分列出“马克思著作索引”，包括三个部分：甲，书籍、小册子和重要手稿；乙，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给报纸编辑部的信，以及声明、公告、呼吁书和文件；丙，文章、报告和演说。

⑦ Maximilien Rubel and Margaret Manale, *Marx Without Myth*, Blackwell Publishers, 1975.

⑧ Maximilien Rubel, *Karl Marx : 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 Librairie Marcel Riviere et Cie, 1957.

⑨ Auguste Cornu,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 Leur vie et leur oeuvr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5, 1958, 1970.

莱伦的《马克思思想导论》(1971、1980、1995、2006年)^①等。(2)对马克思思想的分期研究,如日本学者广松涉的《唯物史观的原像》(1971年)^②、苏联学者拉宾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1976年)等。(3)对马克思理论的整体研究,如艾伦·伍德的《卡尔·马克思》(1981、2004年)^③、艾尔斯特的《卡尔·马克思导论》(1990年)^④等。(4)对马克思某一方面思想或具体著作的专题研究,如阿维内里的《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1970年)^⑤、德雷珀的四卷本《马克思的革命理论》(1977、1978、1981、1989年)^⑥、奥尔曼的《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理论》(1971、1976年)^⑦、科恩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1978、2000年)^⑧、奈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1979年)^⑨、卡弗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1983年)^⑩、拉雷恩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1983年)^⑪、拉比卡的《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987年)^⑫、克拉克的《马克思的危机理论》(1994年)^⑬、莱文的《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

① David McLella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 An Introduction*, Harper and Row, 1971, 1980, 1995, 2006.

② 该书中文版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③ Allen W. Wood, *Karl Marx*,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2004.

④ Jon Elster, *An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⑤ Shlomo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⑥ Hal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⑦ Bertell Ollman, *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1976.

⑧ 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2000. 重庆出版社1989年根据该书第1版出了岳长龄的中译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根据第2版出版了段忠桥的中译本。

⑨ Antonio Negri, *Marx oltre Marx: Quaderno di lavoro sui Grundrisse*, Milan, Feltrinelli, 1979.

⑩ Terrell Carver, *Marx & Engels: 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⑪ Jorge Larraín, *Marxism and Ideolog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3.

⑫ Georges Labica, *Karl Marx. les Thèses sur Feuerbach*,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7.

⑬ Simon Clarke, *Marx's Theory of Crisis*, Palgrave Macmillan, 1994.

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2006年)^①等。

马克思学主要分考据性研究和文本解读研究两种类型。“考据”包括对马克思生平事业中历史细节的考据,对马克思思想观点的来源、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考据,对马克思著作版本的文献学考据等。“文本解读”是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思想的要旨和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和阐释。人们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思想的要旨和理论体系的言说,实际上都不是在描述一个客观事实,而是在进行“文本解读”。

作为专门术语的“马克思学”,或与之相近的名词虽然20世纪初才出现^②,但马克思研究却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甚至在马克思生前即已存在的学术现象。恩格斯在马克思生前所写的多篇关于马克思的传记和书评^③,以及他在马克思逝世后为马克思著作所写的大量再版序言或导言等,就是这种研究存在的证明。此外,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著作和思想的评论或批判,在广义上也属于“马克思研究”的范畴。正因如此,列宁1914年在《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中说:“论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数量甚多,不胜枚举。”他列举了威·桑巴特的《马克思主义书目》(开列了300本书)、1883~1907年及往后几年《新时代》杂志上的索引、约瑟夫·施塔姆哈默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书目》(1893~1909年)耶拿版第1~3卷等,供读者参阅。列宁还提到了庞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年)、里克斯的《价值和交换价值》(1899年)、冯·博尔特克维奇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价值核算和价格核算》(1906~1907

^① Norman Levine, *Divergent paths: Hegel in Marxism and Engelsism*, Lexington Books, 2006.

^② 一般认为,西文中“马克思学”(Marxologie)这个术语是法国学者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创制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早在1904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阿德勒就与希法亭一起创办了《马克思研究》(*Marx-Studien*)杂志,而且20世纪20年代在苏联就已出现俄文词“马克思学”(марксведение)。

^③ 例如,恩格斯1859年8月写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书评,1877年6月写的《卡尔·马克思》传记等。

年)以及《马克思研究》杂志^①等。

马克思学可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和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两大派别。恩格斯和列宁为后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奠定了基本解读框架。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看作是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认为马克思既是革命家又是科学家。列宁认为，经济学说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内容，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构成了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唯物主义历史观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结果，《资本论》使唯物史观由假设变为被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马克思的思想有三个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科学社会主义；虽然马克思没有留下“大写的逻辑”，但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等等。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在梁赞诺夫(Riazanov, 1870—1938年)^②那里得到发扬光大。梁赞诺夫早年投身革命，多次被捕和流放，两次流亡国外(德国和奥地利)。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进行马克思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积极寻找和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早在1905年前就被列宁评价为“视野广泛、有丰富学识、极好地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文献遗产”。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支持下，梁赞诺夫筹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③，并任第一任院长(1921~1931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梁赞诺夫领导下，特别是在列宁支持下，系统收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对马克思恩格斯大量原始手稿和书信进行照相复制，培养了一批马克思字迹辨认专

^① *Marx-Studien. Blätter zur Theorie und Politik des wissenschaftlichen Sozialismus*, herausgegeben von Dr. M. Adler und Dr. R. Hilferding, 1904—1923.

^② 原名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戈尔登达赫。

^③ 1924年起，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成为直接隶属于苏共中央的机构。1931年11月，它与1924年成立的列宁研究院合并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1956年改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苏共马列主义研究院)。

家，启动了历史考证版^①。除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收集、编辑和出版，梁赞诺夫还出版了许多关于马克思革命活动及思想理论的研究著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27年)^②和大部头著作《马克思主义史概论》(1928年)，主编《卡尔·马克思：伟人、思想家和革命家》(1927年)^③等。1930年梁赞诺夫60寿辰时，他的学生索拜尔^④评价说：“梁赞诺夫不仅是当代俄国，而且是当代世界最杰出的马克思研究者，马克思研究之所以成为一门特殊的科学，首先是因为有了梁赞诺夫的科学工作、编辑工作和组织工作……是他为马克思研究打开了真正无限广阔的历史和国际的视野……梁赞诺夫在进行马克思学研究的初期就已作为特殊标志表现出来的第二个特征，是在理解和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时力求有条理和尽可能地完整。”

梁赞诺夫使马克思研究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促成了苏联马克思学的研究传统，并为阿多拉茨基后来编辑出版MEGA1奠定了基础。俄文“马克思学”(марксоведение)一词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在苏联的出版和研究史》^⑤一书第109页写道：“在这些年间，这家杂志和其他一些杂志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马克思学’这一术语，并试图给它下一个定义。”“这些年间”是指1922~1923年，“这家杂志”是指《哲学问题》的前身《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苏联马克思学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它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历史考证版(MEGA)的编辑和出版有密切的关系。1982年苏联学者博尔迪烈夫就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50卷)出齐，说

① 即MEGA1(1927~1935)。

② 该书1927年在伦敦出版了英文版。1929年以《马克思恩格斯合传》出了中文版(李一氓译，上海江南书店出版)，1933年又出了刘佩元译本(上海春秋书店出版)。

③ D. B. Riazanov ed., *Karl Marx—Man, Thinker, and Revolutionist*, Martin Lawrence, 1927.

④ 1919年任匈牙利苏维埃驻维也纳大使。

⑤ 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69年出版。

成是“最近时期苏联马克思学的重大成就”。而从1975年开始出版的MEGA2各卷次的资料卷，更是代表了当今国际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卢卡奇、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家的代表，他们身兼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家)和马克思学家(学问家)的双重身份，旨在通过挖掘马克思丰厚的思想资源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为批判或改良资本主义提供理论支点。

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是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的主流，而吕贝尔是学院派马克思学研究的代表。19世纪40年代，吕贝尔从收集有关马克思生平传记和著作目录的资料入手投身于马克思学事业，并因创制了“马克思学”(Marxologie)这个法文词和主编刊物《马克思学研究》^①，而在20世纪下半叶几乎成为西方马克思学家的代名词。按照吕贝尔自己的说法，他自觉地继承格律恩贝尔格^②和梁赞诺夫的马克思研究传统，注重考据和思想研究相结合。具体来说，吕贝尔规定了马克思学研究的三项任务：一是了解马克思的著作；二是批判的分析的评论；三是文献和图书。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强调价值中立和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强调超越意识形态偏见。当然，研究者事实上很难真正做到价值中立，因为任何解读研究都会存在“合法的先见”。

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是“冷战”时期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产物。当然，我们不应将学院派的马克思

① *Etudes de Marxologie*, 1959—1994.

② 格律恩贝尔格(Karl Grünberg)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梁赞诺夫的老师 and 亲密朋友。他主编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1910~1930年)发表了大量马克思研究的成果，后以《格律恩贝尔格文库》而闻名。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最早就发表在《格律恩贝尔格文库》(1923年)。1924年苏共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达成协议，在出版MEGA方面进行合作，《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也就成为MEGA1的配套研究刊物。

学研究随意贴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以免犯下将洗澡水和孩子一同泼掉的错误。

二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它就被当时的志士仁人和知识精英选择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常常是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特定时代任务紧密结合的。但是，中国知识界从来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可以随意解释的灵丹妙药或实用工具，而是一开始就对马克思主义抱着严肃的科学态度。这种严肃的科学态度首先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思想学说的充分了解和深入研究。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思想学说，因此对它的学理研究又往往是与对国外相关学术成果的译介相互伴随的。

早在 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不久，中国共产党人及其理论家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宣传 and 普及，也开始对马克思进行学术研究。比如，早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季（1892—1967 年）所著的三卷本《马克思传：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1930～1932 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书中有蔡元培先生写的序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 1953 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后，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 50 卷（1956～1985 年）陆续出版，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在中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也逐步开展起来。首先是国外特别是苏联东欧大量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研究成果（专著以及论文）被翻译出版；其次是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但是毋庸讳言，中国学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成果的译介方面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说以前的片面性主要表现为偏向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而忽视西方马克思主义，那么现在则主要表现为忽视对国

外马克思学成果的译介。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熟悉和接纳的主要是苏俄马克思主义，甚至把它当成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统”，从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适应人们了解国外思潮的需要，学界开始译介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进入9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再次掀起高潮。因为随着苏东剧变，苏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其权威和“正统”地位，人们比以前更加迫切地渴望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形态，即西方马克思主义。近二十年来，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形成一种颇具声势的学术潮流。首先，研究视野拓宽了，除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外，进一步扩展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的一些新思潮，如分析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等。其次，研究基调改变了，逐渐从以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性中摆脱出来，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态。许多学者充分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事实上，自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学界以来，它就以各种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且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通过学者们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大都已翻译成中文，先后出版了几套丛书，如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重庆出版社）、郑一明和杨金海先后任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段忠桥主编的“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高等教育出版社）、魏小萍主编的“马克思与当代世界”译丛（东方出版社）、刘森林主编的“马克思与西方传统”译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此外，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周宪等主编的“现代性研究译丛”（商务印书馆）、刘东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译林出版社），

也都收入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也出版了大量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总数多达几十种。其中既有通论性质的著作或教材，又有专题、思潮研究以及人物和文本个案研究。即使不专门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现在也比较注意在自己的研究中参考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这说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内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我建构。事实上，国外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而且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锻造和培育了一批学养深厚、素质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但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烈程度相比，中国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和研究则相当冷清。这主要与人们对“马克思学”所持有的约定俗成的偏见有关。

对于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早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就通过苏联学者的一些著作有所了解。但是由于受当时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们对西方“马克思学”持完全排斥否定的态度。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虽然学界开始对以吕贝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学进行系统的评介，但是一直持续到 90 年代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定性并未改变。其实，从国外马克思研究的总体格局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外马克思学，以版本考证、文献梳理、人物思想关系研究为特征和内容；二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即带有明显现实关怀的研究。“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回到马克思”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大趋势并在中国产生回响，较之颇具意识形态色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国学者更能从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成果中发现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

2007 年初，在众多前辈学者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北京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论坛”。在此期间，鲁克俭向杨学功和张秀琴谈了编译“国外马克思主义译丛”的设想，迅即得到他们的响应。三人开始协商编译原则，搜集和遴选书目，并

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丛书方案，同时联系国外作者、版权以及国内译者和出版社。后经征求论坛成员的意见，大家都积极献计献策。在此过程中，中山大学的刘森林、北京师范大学的吴向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歌给予了十分热情的襄助，他们或者帮助推荐书目，或者联系作者和版权，或者承担相关译事。令人感动的是，不少外国作者向我们免费赠送了版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总经理兼总编辑杨耕教授独具慧眼，慷慨接受了我们的计划，高教分社副社长饶涛博士和责任编辑祁传华同志为本译丛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所以，本译丛得以顺利出版，是全体编委协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出版者敬业工作的产物，还包含众多前辈学者以及国外作者的关切和帮助。这里虽然不能一一列出他们的尊名，但我们一定会记住他们为此所做的一切。

目前，学界对马克思学的评价还很不平衡。有的学者明确提出“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口号和纲领，有的学者则仍然对马克思学抱着怀疑的态度。我们认为，这在学术研究中是十分自然和正常的。说实话，即使是在主编之间和编委内部，对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分歧，但这并没有影响译丛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原因很简单，我们可以不同意西方马克思学的具体观点或结论，但不能回避他们提出的问题。譬如西方马克思学中所谓“马恩差异(对立)论”，作为一种观点我们可以不同意，但是借用卡弗的话来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是一个“标准的研究课题”，谁也不能否认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发展的理解。

应该承认，与国外马克思学成果相比，中国的马克思研究仍然有很大的距离。一方面，我们缺乏原创性的版本考证和文献学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所探讨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超出西方马克思学一直以来的研究热点问题。苏联马克思学以考证研究见长，西方马克思学以文本解读研究见长。中国不像苏共马列主义研究院那样拥有马克思著作全部手稿的复制件，也没有实质性参与 MEGA2 的编辑工作，因此中国学者要在版本考证和文献学研究方面超过苏联马克思

学，是相当困难的，但中国学者完全有可能超越西方马克思学。伴随着改革开放 30 年来思想解放的深入，中国马克思研究者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宽松的学术环境，因此完全有可能像西方马克思学者那样生产出有分量的原创性学术成果。

为达此目的，首先有必要全面了解和译介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新成果，避免做低水平重复性研究，这是深化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外马克思学的代表性成果（包括西方马克思学开创者吕贝尔的著作）大都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我们策划出版的这套“国外马克思学译丛”，就是希望把国外马克思学的代表性成果全面译介过来。继首批 6 本之后，我们将根据版权落实情况 and 翻译进展，陆续分批出版，形成规模和系统，进一步夯实中国马克思研究的学术基础，以期逐步达到与当代中国地位相匹配的中国马克思研究应有的世界领先水平。

望海内外有识之士不吝批评匡正，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鲁克俭 杨学功

2009 年 11 月 16 日于北京

中文版序言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30年前写的东西能被翻译成中文。它最初成形于路易·阿尔都塞所指导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讲座。我敢肯定，阿尔都塞若能看到中国学者翻译并研究这本书，也一定会非常高兴。这本书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重建（即对《1857—1858年手稿》所进行的发展，具有与其同样的原创性和鲜活性），是对共产主义的一种政治化的解释，揭开了20世纪晚期欧洲和美国反抗资本主义的序幕。

马克思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即《大纲》，这是西方学界的通称，本书以后一律采用这一称谓），其重要性在于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导致利润的降低，并且最终阻止资本的积累。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持续增长取决于智能的发展，在于机器、自动控制以及以科技的手段代替人工。马克思还认为，由此在生产的核心环节就形成了普遍智能，其自身成为一种“活的劳动”，已然是科学的，是一种不受任何物质束缚的知识，具有带来共产主义、自由、平等以及民主的可能。

这是否是一个过于积极的看法呢？抑或是一种过于乐观的历史哲学？可能吧。关于马克思这一著作中的劳动理论的意义等问题的

争论仍然在继续。这本书所表达的正是我们对马克思这部著作的看法。让我们跳出一般的争论和阐释来抓住推论的本质，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在这里试图确定并描述了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正以其完全的成熟性向我们展现。当今的现实确实是：剥削的过程将主要发生在生产力创新当中，这凸显了科学和技术中创新的重要性并且直接体现在知识创新的生产过程中。另外，正像马克思所阐明的那样，这种生产知识是一种社会合作，而且更重要的是，将这种把所有力量综合在一起的持续更新用于改变自然以及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社会运动当中。

我们需要从新的视角加以考察的正是这种困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资本主义统治的现实（基于对鲜活的智力劳动的剥削）并不会导致自由和民主的加强。事实上，持续的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一点上，主体劳动力的新力量和智力的自由相对立，这使资本主义受到困扰并且需要新的对劳动的控制，这就是自私的极权主义。但是，正像马克思所教导的那样，这很快就变成相互矛盾的：资本主义所表现的困境为无产阶级打破并推翻其统治创造了可能性。《大纲》完全是由这样积极的辩证法组成的。马克思已经描述并且研究了一个资本主义危机（19世纪50年代中期的危机），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激动人心：这是一个使“资本主义踩空了”的危机。马克思的预言从来都不仅仅是科学的，而且还是大胆的以及革命性的。马克思将“纯粹”的推理留给康德和黑格尔，而被他作为变革标志的革命性的激昂，则直接体现在组织起来的国际工人身上。

在1977—1978年阿尔都塞的讲座中，我们的工作就是给出马克思主义者所预测的这样一份关于普遍智能的起义的报告（也就是关于革命的主题的报告）。这是为了去除积极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最后的残余，与此同时，不向任何的短暂的历史哲学让步。如果普遍智能

的生产成为了创造财富和社会资源，合作和不同生活方式等的核心力量，那我们必须对这个概念进行分析：将其看作是一群单个智力的抽象，是能够自由、理智地发出声音的劳动力的集合。因此这是一种批判性的重新挖掘以及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概念的尝试：从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到利润，从货币到危机，从社会资本到世界市场——而主要的是研究与工人斗争相关的消费和福利间的对立关系……所以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不单单包括经济发展史的维度，而是主要由基于折磨和痛苦之积累的革命意志，及其对革命渴望的主观表达，还有剥削的消失构成。这一转变过程不是经济学家所研究和展示的量变过程，这一转变是一个我们自身矛盾运动的主观过程。马克思说，“资本包含着种种矛盾，我们绝不会否认这一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发展它们”，而这里的“充分”（completamente）既指在现实中对剥削的反抗，也指对将来之解放的展望。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有“实践上是真的”才有可能是真的。毛泽东完全领会了这一道理。

革命性的力量认识到，资本主义统治的局限在于其总是与生产力相对立，现在则是与智力劳动——这一认识使得他们努力克服这一点。马克思的《大纲》是对这一实践中的真理的基本介绍。

总之，《〈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一书是对《大纲》的解读，其中包含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间的讨论。这里所讨论的《大纲》是马克思的理论和政治思想发展的核心。实际上，在《大纲》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组成部分的论证，甚至可以在这些论证中找到其解决。这一可能性不仅证实了政治经济批判与马克思的国家概念间的关系，而且明显体现了马克思否认国家在管理集体知识方面之作用的立场。尤其是革命、共产主义和转变这几个概念。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在《大纲》中被提出而在《资本论》中进一步发展）给出了无产阶级的核心概

念和构成，其主体性和行动的能力。阅读作为马克思政治批判基础的《大纲》，你将远远超越经典马克思本身。如果想要继续讨论马克思主义危机（即使是在当前的精致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全球危机的情况下），那我们应该在那些马克思已有的回答以及批判性的发展之外，去寻求马克思主义新发现的潜在可能性。《大纲》一书不仅仅是一本经典性（genetico）的著作，而根本上是一本展望性（prospettico）的著作。

安东尼奥·奈格里

2009年6月写于巴黎—威尼斯

禁书网

目 录

- 中译本导言 · 1
- 第一讲 《大纲》：一个开放的文本 · 17
- 第二讲 货币与价值 · 40
- 第三讲 对抗性趋势的方法 · 65
- 第四讲 剩余价值和剥削 · 83
- 第五讲 利润、危机、灾难 · 114
- 第六讲 社会资本和世界市场 · 139
- 第七讲 工资理论及其发展 · 164
- 第八讲 共产主义和过渡 · 192
- 第九讲 资本主义发展与革命阶级 · 213
- 译后记 · 235

中译本导言

奈格里的名字对于国内学界而言并不陌生，他是人们所熟悉的《帝国》的作者之一。在《帝国》及其姊妹篇《诸众》(Multitude)^①中，奈格里和他的伙伴哈特凭借马克思和福柯的理论资源，对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提出了极富穿透力的理论思考，构建了帝国与诸众之间的对峙。然而，如果追根溯源就不难发现，这个思路在奈格里的早期著作中已经开始孕育了。早在写作于1978年的《〈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一书中，奈格里就阐发了资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抗关系，试图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发生转换的时代条件下，重新建构自治的革命主体以抵抗资本的统治。奈格里关于重建革命主体的思考是建立在他对马克思《大纲》的文本解读基础之上的。在此意义上，他既在文本解读中回到了马克思，同时又在当代思考中重新激活了马克思，创造了“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的理论奇观。为了深入理解和思考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内在矛盾，探寻人类从资本的囚笼中获得解放的可能性，我们有必要将目光从《帝国》转移到《〈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如《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便是奈格里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

一、奈格里的解读语境：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

在对奈格里的《〈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展开解读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这本书的写作背景作一简单介绍，这将有助于我们对

^① “诸众”(Multitude)是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与《诸众》中提出的核心概念，国内学界有“群众”、“大众”等译法，考虑到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异质性特征，故本书统一译为“诸众”。

这本著作的理解。

奈格里(Antonio Negri)1933年出生于意大利的帕多瓦,23岁就以研究德国历史主义方面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随后相继获得了法律哲学、国家学说等方面的教职。1963年8月,奈格里和他的伙伴们在意大利一个石油化工中心组织了一个阅读《资本论》的工人学习小组。1968年法国发生了“五月风暴”,在此前一年,意大利就已经爆发了类似的革命运动,在实践上形成了“工人自治运动”(Autonomia),在理论上诞生了“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①。所谓“自治运动”,指的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从意大利社会底层群众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激进左翼运动。应当说,这场运动构成了奈格里人生命的一个转折点。1973年,“工人自治运动”也明确开始了。在意大利帕多瓦出现了肇端于工厂内的“自治委员会”的许多自治团体,包括妇女团体、学生、工人、激进青年、文化人士和其他边缘群体。他们走上街头,开展抗议活动。当抗议活动从帕多瓦大学扩展到其他区域的时候,奈格里受到煽动暴力行为的相关指控。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奈格里流亡到了法国,1978至197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法国生活并任教。然而奈格里最后还是没能摆脱被捕入狱的厄运。《〈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就是在这段风起云涌的骚乱岁月中完成的。

《〈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是奈格里1978年春天应路易·阿尔都塞的邀请,在法国巴黎高师所作的系列讲演的成果,因此在形式上,这部作品是解读马克思《大纲》的课堂记录。奈格里这部作品的完成得益于他和阿尔都塞的相遇。奈格里曾在一个访谈中回忆说:“我得说,在1977—1978年,我们之间观点的分歧无论是对于我还是对于他(指阿尔都塞)来说,都是很明显的,当时我在巴黎高

^① 关于意大利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一流派,国内学界已经有研究者开始关注。参见张历君:《普通智能与生命政治》,载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知识分子论丛》第4辑),153~19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刘怀玉、陈培永:《从非物质劳动到生命政治》,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2)。

师讲课，经常见到他，他也经常出席我的讨论会。特别是，曾经有一度，不光是阿尔都塞还包括他身边的朋友，都严重低估了《大纲》的价值。我并不是说他们公开这样说过，但他们中最后有人怀疑《大纲》可能是和认识论断裂之前的那些文本一起写作的，也就是说，写作于马克思思想中伟大的结构主义阶段开始之前。”^①正是由于他和阿尔都塞学派之间对马克思这一文本的评价上的分歧，奈格里才会致力于对马克思这部伟大作品的创造性解读，力图在这部作品中挖掘出深刻的时代洞见。事实上，以马里奥·特洪迪(Mario Tronti)为代表的意大利左翼思想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掀起了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潮流，深受影响的奈格里自然也不例外。他自己曾说过，“在我对马克思的阐述过程中，1972年之后回到《大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刻”^②。毫不夸张地说，《大纲》对包括奈格里在内的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个奠基性的文本。没有对马克思《大纲》的创造性解读，就没有后来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

虽然奈格里和阿尔都塞在对马克思《大纲》的文本估价上存在着分歧，但是二者仍然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即对革命可能性和主体性的思考。晚年阿尔都塞在对苏联教科书式的线性决定论展开反思的时候，他一方面关注从伊壁鸠鲁到马克思关于“偶然”和“相遇”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在对比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的政治宣言的过程中思考“主体的自我生产”问题。正如奈格里所说：“晚期的阿尔都塞就是这样。在精神危机之前，阿尔都塞就已经把马基雅维利—斯宾诺莎问题看成是改造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问题了。在阿尔都塞的著作中，重新探讨主体性的努力包含了对政治过程之下本体论转型的思考。”^③奈格里在当时也同样关注革命的主体问题，应当说，这个问题构成了《〈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的核心问题意识。

① [意]内格里、亨宁格：《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社会转型——内格里访谈》，肖辉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12)。（内格里实为奈格里，音译不同，以下本书同）

② 同上。

③ 同上。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得益于奈格里和阿尔都塞的相遇和对话^①，但是奈格里的意识并非来自阿尔都塞，而是内在于意大利的工人自治运动之中。因此，我们将简要分析奈格里对马克思《大纲》的解读是如何在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中被生产出来的。对此，奈格里自己曾有一个分析：“一方面，《大纲》突出了60年代以来我们在‘工人自治’运动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方法论（因此也是主观的、认识论上的）特征；另一方面，在从大众工人（mass worker）向社会工人（social worker）的转型过程中，《大纲》对理论话语的相应转型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助于重估生产性社会的本质。换句话说，重要的是探讨当前面临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探讨的基础上，我们才回去寻找支持我们观点的理论文本。这一过程决不是从详尽的理论分析走向实践活动的问题，而是相反，是从一种理论观点出发，来重新思考现有的实践活动的问题，这是我们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大纲》对我来说极为重要，我选择研究它。《〈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是我对马克思进行这种解释的最终成果，它有浓厚的战斗色彩，分析的问题都产生于当时的政治讨论和斗争进程中。”^②

从奈格里的这段话中，我们发现，奈格里之所以会选择马克思的《大纲》展开解读，恰恰是与当时的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紧密相关的。更准确地说，他是在工人自治运动中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这个文本，而不是在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基础上走向实践活动。这就注定了奈格里对《大纲》的解读是一种政治性的解读。奈格里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对此坦言不讳：“依据我们的传统，政治学和指令被置于对生产过程的分析的末尾，或者，依据最近的模式，政治学甚至被视为与‘经济的’马克思的利益相异的东西。恰恰

^① 关于奈格里对阿尔都塞理论的借鉴和反思，参见[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77~81页，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② [意]内格里、亨宁格：《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社会转型——内格里访谈》，肖辉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8(12)。

相反！在这里，在所有一般政治运行的强度中的指令的假设恰恰是基础性的。难道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吗？到此为止，我们看到的所有在《大纲》的原文中关于动因和煽动及其方法论的基础的内容，都是为了使政治因素成为分析的核心。还不止如此，这种揭示逐渐被越来越多地集中到政治的特性上。……正如我们将反复看到的那样，如果世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霸权的实现，那么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对阶级关系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追求的目标）：政治学从这一事实中孕育出来。因此，从货币到剩余价值——这就是为阶级提供武器的政治学途径。”^①奈格里对马克思《大纲》的解读的创造性，就在于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升为政治分析，从而为现实的政治运动提供理论支持。

奈格里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政治性直接体现为他的问题意识，即他对革命主体的思考。在解读中，奈格里非常注重《大纲》的写作动因，即1857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直接蕴含了革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同样，奈格里对《大纲》的解读也是在危机中产生的，并由此试图召唤革命主体的自觉。奈格里对革命主体的重建可以拆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在资本的逻辑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革命主体的重建何以可能？第二，如果重建革命主体是可能的，那么谁是承担解放使命的革命主体呢？对这两个核心问题的解答就构成了《〈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的全部内容。

二、革命主体的生产逻辑：劳动与资本的对峙

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一书中，奈格里重新探讨了马克思在革命主体方面的理论贡献。对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探讨是奈格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为了完成这一理论任务，奈格里

^①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Massachusetts, Bergin & Garvey publishers, 1984, pp. 60-61.

把激烈的论战和对文本的细致解读紧密结合在一起，将革命主体的自我生产内在于资本的矛盾发展过程之中，从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高扬工人阶级的主体性。

奈格里之所以如此强调主体的重新发现，是由于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西方左派批判理论中弥散的悲观主义情绪。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即批判理论忽视了马克思的阶级主体学说。在自卢卡奇以降的西方左翼理论中，社会批判理论家从物化现象的分析开始，始终强调资本逻辑的统治，这种统治使得原先的劳动异化蔓延成为普遍异化，最终形成了无可挣脱的“资本的囚笼”。奈格里并不否认资本的统治，他所反对的是这样一种倾向：在夸大资本统治的同时抹平劳动阶级的主体性，从而否认阶级斗争和人类解放的可能性。

在奈格里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有着两种主体的社会体制。其中，一个主体(资本)通过强迫劳动和强迫剩余劳动支配另一个主体(工人阶级)。这种资本/劳动二元主体的对抗性结构贯穿了奈格里解读马克思《大纲》的全过程。

从《《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的第二讲开始，奈格里首先讨论了马克思文本中的《货币章》。从马克思的原有文本顺序看，马克思所注重的是货币在流通过程的运动中所内在蕴含的一系列矛盾，并由这种矛盾的演进过渡到对资本的批判。从表面上看，奈格里似乎是紧紧追随着马克思的文本顺序，也从《货币章》开始解读；然而在奈格里的解读中，他紧紧抓住的是货币现象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关系对抗，从而将货币批判置换成了权力批判。这是奈格里的政治性解读中的重要一环。

奈格里之所以能将马克思的货币批判转换为权力批判，关键在于他发挥了马克思的“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这一重要思想。在马克思的原有文本中，马克思通过对比货币在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所具有的不同作用后发现，货币在现代社会中并不是一种“物”，而是社会关系的物质载体。“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

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但是，这要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①这里的“共同体”更准确地说，应当是“社会关系”。马克思进一步论述道，“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是：劳动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货币；而货币也直接购买劳动，从而购买工人，只要后者在交换中让渡自己的活动。因此，一方的雇佣劳动和另一方的资本，都只不过是发达的交换价值和作为交换价值化身的货币的另一些形式。所以，货币同时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②我们知道，在货币之中和货币背后，马克思发现了价值和社会生产关系。然而奈格里却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出发，将货币视为凌驾于劳动之上的社会权力，并且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货币本身就是资本与劳动二元主体对抗和链接的中介。

从奈格里对《货币章》的解读中，我们就能发现他之后的解读思路，即将经济现象的内在矛盾归结为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由此将经济现象的批判替换成了权力批判，从而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贯穿于马克思从货币到资本的一系列批判进程之中。在解读马克思对于剩余价值、剥削、利润、危机、世界市场等一系列的分析中，奈格里都注重从中提炼出这种对抗结构。例如，在奈格里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的解读中就特别注意到，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能力是一种施加在“他者”身上的权力，而“他者”自身的主体性必须按资本的设计被加以限制。

劳动与资本的对抗逻辑最终塑造了自主抵抗的劳动阶级的主体性。奈格里认为，马克思已经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是如何与作为一个独立而又对立的主体即工人阶级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活劳动被资本所控制的死劳动所主宰，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不断在新的层次上被生产出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同上书，178页。

奈格里认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资本与劳动的分离是第一阶段，这种分离采取了两种形式，首先是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相对立，其次是雇佣劳动的性质。第二阶段则是作为主体的劳动，这种劳动作为源泉，具有所有财富的潜力。^① 奈格里在这里印证了马克思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一方面，劳动作为对象是绝对的贫穷，另一方面，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两点决不是矛盾的，或者不如说，这个在每种说法下都是自相矛盾的命题是互为条件的，并且是从劳动的下述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劳动作为资本的对立物，作为与资本对立的存在，被资本当作前提，另一方面，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②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一方面是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另一方面这也同时是劳动的主体化过程。

继续分析这一对立，我们就会发现，工人的使用价值被资本主义转化为交换价值，两个自治的实体必须互相面对，并被迫联结在一起，这样一来，劳动力的再生产就服从于资本的普遍关系。资本的关系具有最大程度的对抗性，因为资本家的侵占具有绝对的对抗特性。这一对抗起源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被切断的关系：一方面，交换价值在货币和资本中被自动化了；另一方面，使用价值作为工人阶级被自动化了。当剩余价值一开始被生产出来的时候，就意味着工人完全被吸入资本中了。使用价值被还原为必要劳动的限制，保护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工人劳动的使用价值的剩余物完全被包含在资本以及资本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之中了。

在此过程中，资本不只是简单地表现为一个统一的过程，而是自身表现为一个主体。资本已经是自我增殖的，它将自我保存的社会代价视为自己应得的主体化因素。资本表现为扩张的力量，生产和再生产，并且总是控制的力量。增殖是一个连续的和整体的过程，

^① See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Massachusetts, Bergin & Garvey publishers, 1984, p. 68.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54页。

它既不知道限度也不知道休息。劳动在增殖的过程中被控制，以致其自治性在很多情况下都被极大程度地削减，几乎削减到不存在。在增殖过程中，资本具有了控制的主体性。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一旦资本达到了增殖和再生产过程的整体，它的过程实际上再次成为了对抗的再生产的过程。再生产并不忽视区别，并不弥合对立；恰恰相反，它将两者都加以扩大。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对抗的再生产的扩展和掩饰了历史力量的主体的反抗的再次出现。

奈格里对于资本与劳动二元主体的对抗逻辑的揭示是非常精彩的，因为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的直接生产过程中平面化地展开，而是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再现，从而得以立体化地呈现。奈格里在此更关注的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问题，这事实上构成了资本逻辑的重要一环。如果没有社会关系再生产理论的支持，那么劳动在面对资本的统治时就无法成为主体。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劳动与资本的二元主体的对抗并没有跳出资本的逻辑，恰恰相反，劳动成为主体的生产逻辑，以及与资本相抗衡的可能性，完全是内在地蕴含在资本的逻辑之中的。在此，我们需要从奈格里的分析中重新反思何谓“资本的逻辑”。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资本的逻辑是通过矛盾而自我展开的话，那么就会误认为资本的逻辑仅仅是一个同质化的单向度扩张过程，由此消弭内部一切差异，最终彻底抹杀了革命主体的生产的可能性。事实上，资本的逻辑具有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个矛盾最集中地体现在资本与劳动的对抗上。正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解释自己本身的存在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①同样，劳动被资本的逻辑生产为主体，事实上也是在宣告资本的逻辑的“解体”。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劳动成为主体是外在于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本逻辑的过程，从而将劳动与资本的对抗看成是两种力量此消彼长的简单对抗和线性发展，以至于以为能够轻而易举地消灭资本力量。这种肤浅的看法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我们不能将资本理解为一种物，同时更要理解为一种关系。劳动与资本的二元主体的对抗仍然根植于资本的关系之中。总而言之，劳动成为主体并与资本相抗衡，一方面是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只有在资本逻辑的矛盾展开中才能得以确立。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说，会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这种界限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因为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①

三、革命主体的重新界定：从大众工人到社会工人

如果说在革命主体的生产上，奈格里仍然是按照马克思的逻辑而展开的，那么在革命主体的重新界定上，他就开始了“超越马克思”的思想之旅。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革命主体就是无产阶级。在马克思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就是指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劳动者。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变迁，革命主体必须随之进行重新界定。在此意义上，卢卡奇所关注的阶级意识在奈格里看来并不是首要问题，因为问题的实质并不是阶级意识如何生产，而是这个无产阶级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历史性的观点看，卢卡奇所关注的阶级意识只是泰勒制时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然而奈格里所关注的阶级已经不再是卢卡奇意义上的阶级，即泰勒制时期的阶级，而是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转型过程中的工人阶级。与前福特制、福特制和后福特制这三个阶段相对应，奈格里提出了专业工人、大众社会、社会工人三种革命主体概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05页。

奈格里依据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形态将工人阶级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前福特主义和前泰勒制阶段，工人完全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工人阶级以专业工人的样态表现出来，即在工业生产中按等级组织起来的高度熟练的工人。二是与福特主义和泰勒制生产相呼应的工人阶级，奈格里称之为大众工人。大众工人的战斗性将其自身的自我定价结合成对工厂工作的拒绝，并将其权力扩展到社会再生产的所有机制上。它计划要创造一个对资本主义权力系统的真正替换。^① 三是与后福特主义的信息生产对应的社会工人。在社会工人这个角色上，不同方面的非物质劳动被结合在一起。在这个生产模式中，社会工人构成非物质劳动的组织，这是一个作为由民众管理的生态政治统一体的生产的和政治权力的组织，它由民众组织，受民众指引，提倡行动中的绝对民主。^② 奈格里认为，社会工人是一种新的无产阶级，它与前两个阶段的区分是根本性的。在大工业无产阶级时期，似乎只有带薪工人的劳动是生产性的，因而所有其他的劳动看上去都只是再生产的或者是不生产的。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的生产更多地和社会生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汇合在一起，这便是社会资本的含义。随着劳动转移到工厂之外，要保持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作日计算的论断，并进而将生产的时间与再生产的时间，或者工作时间与业余时间严格区分开来就显得十分困难了。在社会资本生产的条件下，社会工人整日都处在普遍性的生产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奈格里的分析重点是从大众工人到社会工人的转型过程，这一转型过程恰恰与当时意大利自治运动的发展是一致的。哈特曾经在《实验室意大利》中将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意大利自治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60年代到70年代初，主要是由工厂内新兴的工人势力发动，其口号是“拒绝工作”

^① See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Massachusetts, Bergin & Garvey publishers, 1984, p. 193.

^② Ibid., pp. 205-206.

(the refusal of work), 即拒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工作; 第二个阶段是从 1973 年到 1979 年之间, 此时斗争的战场从工厂扩展到了社会, 工人自治运动扩散成为更广义的自治运动; 第三个阶段就是自治运动的衰弱阶段。^① 从自治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 事实上就是从大众工人转向社会工人, 从工厂内部转向社会整体。从时间上看, 这恰恰与从福特制生产转向后福特制生产是同步的。在这种转换过程中, 工人阶级的内涵得到了重新的界定, 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自治团体作为“非工厂工人”也开始纳入到革命主体之中。因此, 作为革命主体的社会工人不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高度同质化的无产阶级, 而是那些被资本所控制的各种异质性社会力量的汇集, 这就为后来奈格里的“诸众”概念的出场埋下了伏笔。

仅仅勾勒出从大众工人向社会工人的转型过程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 为什么重新界定后的革命主体是社会工人, 即“社会工人”的提法是否能够成立? 另外, 如果我们将经典马克思主义定位在前福特制的话, 那么马克思的思考又如何为“社会工人”的出场提供依据? 也就是说, 奈格里是如何跨越马克思的原有文本与奈格里自身的时代间距进行思考的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进入到奈格里的《〈大纲〉: 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第七讲以后的部分。在那里, 我们发现, 处于前福特制的马克思的思考与奈格里的社会工人之间的链接点就是《大纲》中的一个片段, 即“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②。这个片段也就是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所津津乐道的“机器论片段”。在奈格里看来, 这个片段可能是马克思所有著作里能找到的最高级的运用矛盾而且建构的辩证法的例子。在他看来, 马克思的这部手稿是以“机器论”完结的, 马克思的论证逻辑节奏在此达到完满。在这个片段之

^① 转引自张历君:《普遍智能与生命政治》,载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知识分子论丛》第4辑),158~1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88~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后的文稿大部分是这些结论的补充。^①

在马克思手稿的原初语境中，马克思虽然处理的是机器体系、劳动和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但是马克思通过将机器体系视为固定资本，将关注点仍然放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上。随着自动机器体系的发展，“代表一般社会劳动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②，“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③。这样一来，“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④这种“社会个人的发展”并没有使马克思思想当然地认为就是人类的解放，相反马克思清醒地看到，“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⑤。“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因此，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⑥

与马克思强调机器体系从属于固定资本不同的是，奈格里更多地强调机器体系作为对象化劳动从而与活劳动相对立。换言之，马克思从客体维度出发，将机器论从属于资本理论之中，最后的解放只能是通过资本突破自身的界限而得以实现；而奈格里从主体维度出发，将机器论则是从属于劳动理论之中，将机器论与知识经济时代的非物质生产直接链接，由此引申出革命主体性理论，进而探寻

① See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Massachusetts, Bergin & Garvey publishers, 1984, p. 13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93页。

③ 同上书，100页。

④ 同上书，100~101页。

⑤ 同上书，103~104页。

⑥ 同上书，104页。

解放的可能性。这是马克思与奈格里之间虽然细小但却值得重视的一个理论差别。

自动机器体系的发展正好与奈格里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具相似性，因此，奈格里就跨越了从自由竞争时期到后福特制的资本主义形态的变迁，径直从马克思的手稿中机器论的片段引申出“社会工人”的概念，由此指认当代革命主体的具体内涵。事实上，奈格里的“社会工人”概念非常类似于马克思后来的“总体工人”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有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①。虽然如此，奈格里的“社会工人”还是要比马克思的“总体工人”更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个理论推进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奈格里的社会工人是与知识经济时代非物质的生产方式相勾连的，而马克思仍然是在物质生产的分工不断细化的前提下讨论“总体工人”；第二，奈格里的“社会工人”事实上是在资本支配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衍生而来的，而马克思的“总体工人”更主要的是强调一般的、直接的物质生产；第三，在马克思那里，“总体工人”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工人，并没有赋予其革命主体的功能和使命，而奈格里却赋予了“社会工人”以具体的物质内容，即具体的社会自治团体和边缘人员，从而成为可以承担起革命和解放使命的物质力量。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奈格里对革命主体的重新界定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资本与劳动的对抗逻辑之外。因为革命主体的重新界定只是在劳动生产形态发生改变的基础上的重新调适，本质上仍然是从属于资本逻辑的再生产过程之中。换言之，革命主体的生产逻辑和革命主体的重新界定这两个问题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奈格里的洞见正在于此：当资本每一次通过扩大固定资本和重组劳动过程的方式来寻求进一步的统治时，不断被生产出来的工人阶级就在斗争的新一轮的循环中在政治上重构了自身，从而需要不断进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5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自我界定，一方面要确认工人阶级外部的劳动条件的变化，另一方面要确认内在于自身的存在样式的变化，在这双重确认中实现主客体的辩证统一，从而上升为主体的自觉意识。如果丧失了这种不断重新界定革命主体的自我意识，那么就极有可能会滑向高兹式的“告别无产阶级”，从而将革命主体空心化，使之丧失革命行动的可能性，从而导致彻底臣服于资本逻辑统治的可悲局面。

四、简要的结语

综上所述，应当说奈格里对马克思《大纲》的解读是富于创造性的，这种创造性就体现在他从政治角度出发，在资本主义社会最新发展的时代语境中重新激活了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奈格里的解读一方面依据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尤其是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出发，在劳动与资本的辩证法中重构了革命主体的生产逻辑；另一方面他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试图重新发现革命主体，用社会工人替代了经典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概念，从而发展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革命理论，这也正是奈格里试图“超越马克思”之所在。但是，这种超越并没有简单地抛弃马克思，相反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手稿的解读（准确地说，是重新建构马克思的手稿）基础之上的，所以最终仍然是“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

奈格里这种在当代语境中力图呈现“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的努力，不仅令他对于马克思手稿的解读别具一格、独树一帜，而且对我们重新思考全球化时代的资本哲学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不无启发意义。首先，奈格里对于劳动与资本二元主体对抗结构的阐发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当前社会中资本的逻辑，尤其是深入思考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从而避免陷入经济决定论的新形式——资本决定论之中；其次，奈格里关于重建革命主体的思考始终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中展开的，这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尤其是将生产和再生产加以必要的理论区分，将再生产理论作为重要一环纳入到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当代生产方式的批判和反思之中；再次，奈格里对“社会工人”

以及非物质劳动的探索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这为奈格里从马克思宏观层面上的资本理论通向福柯意义上的微观权力分析提供了基础，使之与“生命政治”相勾连，这对我们捕捉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方式变化的新特征不无裨益；最后，奈格里对马克思手稿的政治解读和对当代全球化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政治思考体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格，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从来不是抽象地探讨诸如正义、平等、自由等问题，而是具有自己特殊的路径，即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政治思考紧密结合起来。奈格里的政治解读就体现了这种路径，超出了一般西方左派理论就政治谈论政治的狭隘视域，结合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发展，从中生发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

总之，奈格里对马克思手稿的政治解读既没有简单地“回到马克思”，也没有盲目地使“马克思走向当代”，而是用现实问题激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从而使马克思的《大纲》成为一种具有开放性品格的“展望性”著作。至于奈格里是否真正超越了马克思，这是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奈格里之所以能够具有这种理论创造力，或许与他所独有的理论姿态有关：

我对如何去捍卫马克思主义、如何去复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以及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都不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阐释出一套当代的关于生产力、创造性、剥削、劳动和价值生产的新的生物政治的框架，这样一个框架要比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框架更有用。它提示我们，当代的资本主义的生产，不只是在生产剩余价值，或者是在生产劳动产品，它是在生产一种社会形式，在生产一种价值体系，在生产一种社会经验的结构。^①

张梧 王巍
2009年8月

^① [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与“大众”——迈克尔·哈特、安东里奥·奈格里与上海学者座谈会》，载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知识分子论丛》第4辑），60~61页。

第一讲 《大纲》：一个开放的文本

一个文本的自觉诞生：“危机的降临”，这是分析的起点。

对于文本的形式上的描述。

《大纲》和《资本论》的提纲：“方法上的迷惑，还是研究上的闭塞？”

从文献学的领域到更为本质的领域：两种方法；剩余价值的发现，社会资本—主体性—共产主义之间的循环联结。

《大纲》，一个开放的文本：解读中的另一些推测。

马克思的方法中的“多元总体”：研究方法，叙述方法和再现方法。

传统的解释：(1)《大纲》是一种妄语？

(2)《大纲》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复兴？

(3)《大纲》与《资本论》同源一致？

(4)《大纲》是“对上述说法的颠覆”？

在理论上没有代言人。

如同马克思的革命事业一样，在马克思思想的内部历程中，《大纲》是马克思思想中具有能动性的中心。

解读的概要。

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评价《大纲》时曾说《大纲》是“一种知识性的、私人性的、无法辨读的速记”。相关的评价在恩佐·格里罗(Enzo Grillo)的引人注意的意大利语译本的导读中得以重申。毫无疑问，就他们的解读和翻译而言，我们会得出这样的评价：《大纲》构成了一个非常艰涩的文本。但是，我们不必依据这

些文章来夸大马克思这个文本的神秘的特性。事实上，与其说是论证的真正基础造成了这种艰涩，毋宁说更多的是由于手稿这种形式以及令人困惑的阐述造成了这种艰涩。如果我们在一定范围内审视马克思的计划，那么指导线索就会得以清晰的呈现。这条线索只不过因为急躁的写作、论战的并发性特点和思想发展中的一些试验色彩而显得部分混乱。马克思思想中首次伟大的政治性整合的诞生源自一个极端危急的事件：“美国危机妙极了（我们在1850年11月的述评中就已经预言过它一定会在纽约爆发）。”^①在1857年11月13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虽然我自己正遭到经济上的困难，但是从1849年以来，我还没有象在这次危机爆发时感到惬意。”^②“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③（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12月8日）“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工作到早晨四点钟。工作是双重的：（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2）当前的危机。”^④（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12月18日）梁赞诺夫、《大纲》的编辑者罗斯多罗夫斯基、维戈茨基，以及无人能及的塞尔焦·博洛尼亚都分别澄清了《大纲》的起源、它与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工作的关联、与之后著作的关联、1857—1858年危机爆发的政治形势，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期待和希望。对于这些讨论，我没有更好的东西提供给读者了。

我想要强调的是另一个因素：这就是在马克思研究中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整合的基础的问题。危机的紧迫性不仅仅是历史性预见的场景，而且也演变成一种实践意义上的和政治意义上的整合。就政党的可能性而言，即就建立政党的可能性而言，这场灾难的迫近仅仅是资本的灾难。对急迫的危机的阐释同时也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和神秘化的、漫画式的共产主义的论战。这部“遭受责难的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 同上书，198页。

③ 同上书，219页。

④ 同上书，226页。

作”是在理论领域内对发生在实践领域中的衰退的果断拒绝：如果这种实践不是被给定的——这些通信充分再现了《大纲》的痛苦的产生——那么理论分析必须揭示它的产生，只有当这种分析能够生产出那些蕴含在危机中的革命的主体性时才能如此。马克思文本的整合性特征只有在这场“危机”和“预言”之间的关联之中才能被发现：资本的灾难同时也就意味着政党和共产主义者主体性的展开，也就意味着革命意志和组织。危机激活了主体性，也使这种主体性在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各种革命可能性中出现。这种整合意味着三者的联结：一是危机的必然性和灾难性，二是发展的规律，三是主体性的活力。在这些不同方面的联结之处，辩证法就会发挥作用。而且，决非偶然的是，除了针对一家美国报纸的编纂者和诡辩者的活动外，除去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探索外，我们发现黑格尔对于写作《大纲》所具有决定性意义：“不过，我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完全由于偶然的机，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①（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这种“完全由于偶然的机”并不是“偶然”的；正如马克思继续写道，“如果以后再有机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阐述一番，使一般人能够理解。”^②马克思在这里所发现的合理的方法就是革命暴动中的理论与实践。危机的迫近需要这种理性。在很久之前，马克思曾向黑格尔学习过；在这里，马克思用批判的、科学的态度重新返回到黑格尔。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实实在在地获得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而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贡献。

让我们开始审视这个文本或者说文本群，这些是由莫斯科的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在1939和1941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250页。

^② 同上书，250页。

(草稿)1857—1858年》为标题出版的。以下是它的组成部分和日期，这些都来自于格里罗(意大利语译本第一卷的前言，第 x—xi 页)：

1)《导言》，在一个标记为 M 的笔记本中，写于 1857 年 8 月 23 日和 9 月中旬期间。

2)七个笔记本的草稿(也就是《大纲》)，除了第一个笔记本外，全都由马克思自己按照如下的顺序编号和标注日期。

笔记本 I：1857 年 10 月

II：1857 年 11 月期间

III：1857 年 11 月 29 日—12 月中旬左右

IV：1857 年 12 月中旬期间，1858 年 2 月

V：1858 年 1 月 22 日—1858 年 2 月初左右

VI：1858 年 2 月左右

VII：1858 年 2 月底—3 月，5 月底、6 月初

第二个文本群构成了附录，并且与以上的文本相连：

3)《巴师夏和凯里》，写于 1857 年 6 月，在《导言》之前。原初，这个文本占据了《大纲》第三个笔记本的开头七页。

4)《七个笔记本的索引》，写于 1858 年 6 月，插进了含有《导言》的同一个笔记本 M 中。

5)《〈政治经济学。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段和第三章开头部分》，写于 1858 年 8 月至 10 月，这由两个没有标记日期的笔记本组成，前一个标上了 B'，后一个笔记本被分成 B'' 和 B'' II 两部分。

6)《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与笔记本 M(《导言》)、笔记本 II 至 VIII(《大纲》)、《〈政治经济学。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段和第三章开头部分》)的内容相联系；写于 1859 年 2 月期间，并在笔记本 B'' 的最后部分被发现。

7)《资本章计划草稿》，写于 1859 年。

8)关于李嘉图货币理论的一系列短小的摘要，在 1850—1853 年期间 24 本笔记本中第 4 本笔记本中被发现，并标有：伦敦，1850 年

11月至1850年12月。

9) 一个更长的、成体系的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版的摘要，在上述提及笔记本群中第8本中被发现，写于1851年4月至5月。它们在两个简短的文本之前：罗列李嘉图所发现的有关进口种类的单子和有关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内容表。这是恩格斯在1851年标注的笔记本中的一部分，这个笔记本还有被称为《完美的货币制度》的手稿的最后部分，这仍未出版。

在本质上，我的关注点将集中在笔记本M和在1857年11月至1858年春天期间写作的七个笔记本。《巴师夏和凯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因为这关系到马克思与蒲鲁东的论战。我们将会看到，《七个笔记本的索引》和《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将作为注释和摘要也会加入这个文本。

现在，如果我们搁置《导言》，那么《大纲》乍一看就显得是极其不完整和碎片化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笔记本就没有一个中心及其有力的能动作用。这些论证在以下环节中展开：在第一个笔记本中，从货币的分析开始，直到对交换形式（价值）的定义；第二个笔记本强调货币与资本的转化；第三个笔记本的内容就是从剩余价值到社会资本；在第四个笔记本中，剩余价值和利润被加以考察，其中最具基础性的内容是对资本流通过程的批判；在第五个笔记本中，在关于前资本主义各种形式的较长的插入性说明之后（我们将在后面看到插入这段说明的理由），这个分析又一次探寻流通过程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条件；第六个笔记本明确地提出了主题：作为总体暴力的资本和作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总体性对抗的资本；在第七个笔记本中，价值规律的危机和它的转化形式（又一次回到了利润问题）将使我们对资本生产的客体条件和主体条件的危机有一个更为精准的界定。随后我们将看到理论上的向前推进，这种推进贯穿了整个《大纲》，越来越具有驱动力的运动将使我们能够觉察到一个根本环节，这个环节是由总体工人和总体资本家之间的对抗所构成的，而这种对抗又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有两个理论上的基础性

说明：第一，在《大纲》的最初部分有一个对以剩余价值为形式的价值规律的界定，换言之，这是剩余价值规律的第一个成熟的公式；第二，在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原理中有一个对剥削理论（剩余价值的规律）的补充，以及剥削规律转化为危机规律和为共产主义而展开的阶级斗争。

我们将停止这方面的讨论而开始估量《大纲》的特殊重要性。但是这种重要性也是由一个事实体现出来，这就是，我们可以在《大纲》中读出马克思日后著作的提纲，即《资本论》的提纲。我们在此将从罗斯多罗夫斯基那儿转引一个为马克思所预见的提纲列表，以及最重要的修改的草图，这些修改主要是在《大纲》的提纲（罗斯多罗夫斯基称之为“原本的结构”）和《资本论》的提纲（或者说是“修改过的结构”）之间展开（见表一）。

表一：《资本论》的提纲和修改情况

(1)1857年9月	《大纲》p. 108(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50页)
(2)1857年10月	《大纲》pp. 227-228(中译本同上书,180~181页)
(3)1857年11月	《大纲》p. 264(中译本同上书,220~221页)
(4)1857年11月	《大纲》p. 275(中译本同上书,233~234页)
(5)1858年2月	1858年2月22日致拉萨尔的信
(6)1858年4月	1858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
(7)1858年6月	《大纲》德文版 pp. 855-859
(8)1859年1月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p. 19
(9)1859年2-3月	《大纲》德文版 pp. 969-978
(10)1862年12月	1862年12月28日致库格曼的信
(11)1863年1月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 pp. 414-416
(12)1865年7月	1865年7月31日致恩格斯的信
(13)1866年10月	1866年10月13日致库格曼的信
(14)1868年4月	1868年4月30日致恩格斯的信
原初计划	修改后的计划
(六册构想)	《资本论》(三卷本)

续表

一、资本	一、资本的生产过程
1. 资本一般	1. 商品和货币
(1) 生产过程	2. 货币转化为资本
(2) 流通过程	3-5.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6. 工资
	7. 积累过程
	二、资本的流通过程
	三、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3) 利润和利息	1-3. 利润和利润率
2. 竞争	4. 商人资本
3. 信用体系	5. 利息和信用
4. 股份资本	6. 地租
二、土地所有制	4. 各种收入
三、雇佣劳动	

来源：请参看 Rosdolsky,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London, Pluto Pr., 1977, pp. 55-56. 也可以参看 Wygodski, *Die Geschichte einer grossen Entdeckung*, Berlin, Verlag die Wirtschaft, 1968, pp. 129-139.

说明：实线部分表示在六册构想中前三册中被改动的部分，虚线部分表示在《资本论》中被改动的部分。

但是，这种文献学方法是否正确呢？我有些疑问。但是我要把这些疑问搁置一边，我们将看到，只要我们继续研究，这些质疑将会产生某些积极的东西。让我们简单说一个对文献学方法的一个质疑：我问我自己，以此来考察马克思的完成的著作《资本论》是否正确呢？因为这本著作详尽地概括了马克思的所有研究。根据我的分析，我们那些著名的、学识渊博的同志们所告诉我们的有关《资本论》的起源的东西是无效的，这由如下事实所证明：他们预设了《资本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中最成熟的要点。为了看清他们对这一点的迷信，我们只要以罗斯多罗斯基为例，看一下他对马克思所谓“放弃”关于雇佣劳动一册的解释(pp. 61-62)。当然，这一册虽然在《大纲》中被提及，但并不存在，而且部分材料被放置在一章中并被整合进入《资本论》第一卷。但是，这是否就是马克思“放弃”雇佣劳动册的充分证据呢？如果我们再增加其他这类文献上的质疑，更多的实质上的质疑，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棘手。正如《资本论》第一

卷中所呈现的那样，工资一方面是资本的一个维度，另一个方面在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中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为缩短工作日而进行的斗争才是问题的根本。这来自三个观点：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工资的改善作用；国家在工作日问题上的干预作用。我们可以在《大纲》中找到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决定了工资的概念，在工资的概念中，对抗跳回到工人阶级的概念中。在《大纲》中，如果我们搁置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中，工人阶级的概念是一个重要的线索，那么工人阶级的概念同时意味着资本的危机这个概念。关于工资的特别的一册，可以在《大纲》的提纲中被预见到。工资的概念在《大纲》中与工人阶级的概念紧密相连，而且也与革命的主体性概念紧密相连。我们能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发现这些关联吗？我们必须回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说这些著名的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在我们看来并不正确。正如这些预备的提纲所提示的那样，我们能说《资本论》在马克思总体思想中是唯一的基础性的部分吗？没有其他更高的理由，仅仅因为这是唯一充分成熟的著作，就能过高评价《资本论》吗？我们能仅仅出于这些片面的理由就被局限并退回到这种对马克思著作的精神的根本不恰当的解释中吗？拥有马克思全部手稿的考茨基在1903年出版了《大纲》中的《导言》部分（伴随着一些庸俗的错误）（《新时代》，XXI，1），但是他并没有出版《大纲》的其他部分。这是否是偶然呢？或许是吧。革命运动的变迁给出了相反的证明。事实是，《大纲》并不是一个专门被用来从文献学角度研究《资本论》的构思的文本；它同时是一个政治性文本，与革命可能性的高涨相配合，这种革命可能性是由“急迫的危机”和试图综合那些直面危机的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行动的理论诉求共同创造的；《大纲》是由这种关系所推动的理论。对《大纲》的解读促使我们去辨识这个文本与马克思其他文本（尤其是同《资本论》）之间的异质性，而不是同质性。相反地，《资本论》或许也仅仅是马克思理论分析的一个部分而已，当然这并不是说《资本论》是不重要的。不管怎样，它的有效性应当被限制在它自身范畴的陈述之中并在其中被

转化。我们的意大利同志意识到《资本论》中这种“令人迷惑的方法”是薄弱的，并且得出结论，认为这种方法“阻塞了研究”。《资本论》中范畴的客体化阻塞了革命主体性的行动。我们马上将会看到，《大纲》是一个确立革命主体性的文本，情况不正是这样的吗？难道这不能重构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被分离出去的东西吗？这就是说要使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战略计划和组织统一起来。难道这不能使马克思作为一个整体被呈现吗？这种整体性在其他文本中被割裂了并被片面地界定了。

有些解读者通过大量的诸如捕风捉影、信口胡说、闪烁其词等方式来解读《大纲》。按照这样的观点，维戈茨基的论文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的论文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获得了古典的价值理论后，并且在50年代获得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导言》应当与1847年8、9月这段时间相联系），最终在《大纲》（1857年10月到1858年6月的笔记本）中完成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以罗斯多罗斯基为例，他就没看到这点。对他而言，《大纲》仅仅是通向《资本论》的思想持续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已（到1848年，“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他的经济学体系的基石，才被根本确立”，而且这仅仅是得到了理论的一些细节，这是一个可以在他的《大纲》中加以详细考察的过程）。这仅仅是发展过程中第一个重要阶段而已，这个发展过程不断进行调整和修订。但是，即使维戈茨基在理论层面上推进了一步——因为他依靠中断和跳跃的方法而对思想向前运动过程的把握使他深化了马克思思想中理论性的因素——他仍然没有得出具有决定性的结果。这不仅因为维戈茨基拘泥于发现剩余价值，而且也因为他没有充分把握剩余价值的发现的重要性。马克思之所以像发展剩余价值理论那样发展价值理论，之所以指认价值的历史形式就是剩余价值，是为了表明“已经临近应当

制定自己战斗计划的时刻了”^①(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1860年9月15日)。这就意味着, 他发现了蕴含着对抗性在内的资本理论和社会剥削理论中的杠杆, 这个杠杆就是阶级的构成, 这种阶级构成在塑造斗争的主体性。正如伊萨克·鲁宾所指出的, 剩余价值理论会变成能动的中心, 能够动态地综合马克思的思想, 而且会演变成这样一个观点: 只要能将对资本的客体性分析同阶级运动的主体性分析结合在一起, 就能将阶级仇恨渗入到他的科学之中。但是, 即使如此也不够充分。迄今为止, 我们只是明白了发现剥削规律的重要性。我们必须继续挖掘其中丰富的理论暗示, 彻底遵循这种效果和反馈。随后我们必须从剩余价值的发现出发, 在理论上完善生产与再生产之间, 流通与危机之间, 社会资本与工人阶级主体性之间, 发展、危机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各种关联。我们必须看到这个过程的总体性是如何被资本所持续塑造的, 以及这种总体性如何界定剥削。换言之, 剩余价值过程的动态统一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消除两个主体之间(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分离, 反而会将每种调和(价值形式、货币、劳动或交换的形式等)都推向矛盾并且扬弃这些矛盾。危机和阶级斗争是如此深切地连接在一起, 以至于在对抗性的辩证法的范围内, 首先采取灾难的形式, 其次采取共产主义的形式——一种真实的、物质的临界点, 这种临界点是由历史必然性和不可动摇的意志所带来的, 这种意志就是要消灭敌人。历史唯物主义——对阶级构成的特定分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围内被赋予了新内容, 而且危机的规律在阶级斗争中成为中介。在这里还有双重性的空间吗? 对《资本论》的解释还会生产出所有的双重性吗? 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即使是在悖论的形式中也不再有可能性, 把这个进程具体化并固定化为一种总体性, 从而摧毁这个进程的动力。这种总体性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 一个人在其中可能会占有, 或支配或颠覆。不, 这里的支配和颠覆只能由参与到这种对抗性关系中的人去完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5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脱离了这种对抗性，不仅运动无以为继，而且灾难也不复存在。《大纲》的这种原创性、令人兴奋的感觉和新鲜感完全在于它那难以置信的开放性。这种科学所具有的矛盾的非决定性的特征必然是从这样的事实中派生出来的，即其中包含着主体的决断。为什么我们要在解读《大纲》的过程中如此胆怯呢？有关革命可能性和革命意志的指导线索在运动中被发现，从剩余价值到社会资本、危机、主体性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结合，再到对抗在资本主义关系再生产中的作用，这个运动就在其中展开。《大纲》为了分析资本过程中的革命主体性，构建了主体性的路径（“急迫的危机”）。这些笔记本勾勒了马克思对革命意志的分析和想象中最强有力的要点。作为争议的焦点（对资本的理论分析与政治分析相对立、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相对立、客体性与主体性相对立）的一切形式上的二元论，都将会消融在二元论的实现过程中，二元论的实现过程也就是在对抗中构成了资本主义的进程。

以上这些论断都将会在下面具体展开。但是对我而言，立刻展开我对《大纲》作出的这些坦然的、双重的评判和叙述才是合适的和坦诚的。对此，为了表明我将要进行的解读的特色，我将会提纲挈领地勾勒出断裂点；现在我想勾勒出在我看来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围绕着将要展开的分析的其他一些要点。

（1）从货币形式到价值形式。在马克思的《大纲》中，这个关系是基础性的：对货币的分析能够使我们精准地分析价值形式。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将看到，这种神秘化中所蕴含的现实性将以一种比马克思其他文本更为明确的形式得以呈现，在马克思的其他文本中商品形式是主角。与此相反，当使用价值与由货币派生出的货币形式并列的时候，使用价值仍然保留着重要性和巨大的发展空间。因而，使用与“一、价值”相关的“二、货币”作为《大纲》的开端就决非偶然了（虽然没有写出关于价值的第一章，但是我们可以在第七个笔记本中的“价值”标题下面找到这部分的开头部分）。我们必须重视由此带

来的效应：在我看来，一方面这将带来对货币的彻底批判，另一方面也能迅速界定被神秘化的价值。

(2)对劳动的界定。在《大纲》中，劳动直接就是抽象劳动。我们只能在这个层次上理解劳动并将它整合进理论之中。只有当劳动在社会生产关系中被考察，劳动才是抽象的。因而我们就只能在交换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基础上界定劳动。在马克思那里我们就找不到劳动概念，这种劳动概念既不是雇佣劳动，也不是资本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因而也就没有可以恢复、解放和升华的任何劳动概念，而只剩下被压制的概念和实体。

(3)正如克里斯蒂娜·潘那瓦扎(在她为维戈茨基写的简介中)所指出的，所有分析都将指向对抗，正是这种对抗，以至于我们决不能将价值理论视为封闭的理论，也不能在此基础上将再生产理论和流通理论等量齐观。“在《大纲》中，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经济的理论，这种批判拒绝回到政治经济学，然而恰恰相反，科学是一种对抗性的运动。”所有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都是按照对价值规律的理解来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的或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没有共同之处。

(4)这种“体系”，这种能动的、开放的体系是由危机与革命主体性的形成之间的关系问题所决定的。这一关系是如此根本性的，以至于马克思主义被称为关于危机和颠覆的科学。那种将危机视为有待治疗的病症并进行拯救的尝试不仅是对革命运动的背叛，而且也堕落成为戏谑，这种戏谑与马克思的范畴毫无共同之处。为了削弱有待开掘的主体性，就拒绝马克思对主体性的界定，马克思对主体性的界定代表了颠覆和过渡。根据这个观点，《大纲》即使不是马克思唯一重要的文本，或许也是马克思关于过渡问题的最重要的文本。我们注意到，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数以千计有关过渡问题的注释竟然未被考察。

(5)我们在《大纲》中找到的马克思在界定共产主义时所采用的极端彻底的方式，远远超越了一般所理解的各种特征。值得注意的是，

共产主义与阶级构成之间的连接具有根本性作用。在此我们得到一个不同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以往传统政治科学的权力概念。阶级构成与权力的关系、阶级构成与过渡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联结是建立在行为和需要的物质性基础之上，也建立在自我价值稳定过程(self-valorization)的结构的基础之上。在马克思主义中，权力的主题必须服从于批判的炮火；我们通过对不同类型的联结的探讨可以对此提供一个新的基础。我们今天将不再低估这个问题。

(6)最后一个特别要点是对工人阶级的界定，这关系到《大纲》中概念的能动性。我们已经审视了由以下事实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有关雇佣劳动(或者说有关工资)的卷册并没有被写出来，而且其中一些重要因素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被压缩为客体性的说明。然而这并不能积极地解决问题。这是一个遵循文本的问题，这是一个重新返回到工资的批判性界定与共产主义的革命性界定相统一的联结的问题，这是一个有关革命主体性的问题。这关系到如何理解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一册中所预见到的问题，也关系到如何把握上面所提到的联结。

这里是在解读和界定《大纲》论证过程中两个重要时刻(即剩余价值及其实现)的过程中所要持续关注的基本问题。

《大纲》的方法论也决定了《大纲》在马克思思想架构中的重要性。随着《导言》以及它在马克思的《大纲》研究计划中的创造性应用，马克思在方法论层次上实现了他之前在此领域内理论推进的综合。我们将在后文详细分析《导言》；现在还不是展开详尽分析的时候。我将会满足于指出：笔记本 M 明确详尽地分析了特定的抽象方法和描述趋势的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大纲》中的具体研究是首次应用，这种应用将唯物主义的方法与精致的辩证现实相结合。两种辩证性力量的综合在各种意义上都具有开放性。一方面，辩证理性介入到规定性与趋势之间的关系之中，这使抽象和逻辑上具有后发性的中介得以主体化，而且也给它增加了限定条件和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唯物主义的方法，只要它被完全主体化，它就能向未来完

全开放，而且它将会创造，而不是依附于辩证的总体性或逻辑上的统一性。这种规定性始终是各种重要意义、各种紧张和各种趋势的基础。至于这种方法，它被强制注入到总体研究中，而且持续决定着前进的新基础。在此意义上，我们要再一次指出，《大纲》在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虽然这在方法论领域内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证实的假设，但是我们要重申，这就是《大纲》的特色所在。我们同样要强调，对马克思而言，这个阶段是完全幸福的时刻，是一个位于中点的时刻，这个中点既不是折衷，也不是调和：大量的力量还没有削弱到中间水平，灾难也没有完全平复，想象尚未终结。

这些一般意义上的思考虽然是重要的，但还不是完全具体的。它们只能开始显示马克思方法中被我称之为“多元总体”(plural universe)是如何显现的。它们也只能给出一些范例而已，并不能揭示这种“多元总体”方法在马克思的实验室中是如何运作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在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这两个环节上进行了区分：“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①在《大纲》中，我们可以在各个阶段追踪这个逻辑进程，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就在逻辑进程中展开。现在，如果我们考虑到先前的迹象，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个进程既不是线性的，更不是单向的。恰恰相反，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之间的辩证法向所有方面开放：每一个以叙述方法形式或研究方法形式表现出来的结论都将向新的研究和新的叙述开放。这不仅会在研究中所涉及的各种论域中出现，而且也主要会在朝着某种方向的历史运动中出现，在这种运动中，一个新主体的每种规定性都将会揭示出新的对抗，并发起运动。通过这样的方式，新主体起决定作用的进程就会得以呈现。因而，叙述方法必然伴随着“再现”的方法(neue Darstellung)：这是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1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这个过程问题，这个过程构成了实际运动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得到了科学的理解和更新。因而，这里没有线性的连续性，只有观点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不断寻求对抗中的每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有节奏的研究中不断寻求叙述中的每一个跳跃，总是寻求新的叙述。在此意义上，从方法论的观点看（按照唯物主义的方式，这种方法会考虑到历史的、具体的、具有根本性的规定性。同时，按照辩证法的方式，这种方法也会在同一场运动中始终寻找到每一种规定性的动力和趋势，对抗在这场运动中会自我建构、自我解决并自我反馈），《大纲》构成了一个“多元”的总体。每个研究成果在叙述中都试图赋予对抗的内容以新特征，并试图在这种决定论中倾向于洞见到这些新特征；当这种决定论一旦启动，我们将看到一种真切的概念爆炸。在形成一个重新叙述的过程中，我们将进一步花点时间去随意地重新叙述这些内容，并在处于争论前沿的例子中给出一些范例，通过这样的方式，之前的叙述方式自身必须服从于研究过程，而且之前的叙述方式自身会反过来成为新的叙述过程的素材。纯粹为了坚持对我的假设的说明，我才会提及《大纲》的方法的力量，才会提及这种把握概念的能力，把握概念是为了打破这个概念，是为了在每次到了一个新的模糊地带的时候重新更换理论论证从而重新界定并赋予特性，等等。

因而，我们决不是按照方法论拜物教，才以论战和说教的态度来提出《大纲》的方法问题和马克思的方法问题！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总体性的激情，但是这只能在由序列和跃迁组成的多样性的形式中才能看到，而不是在单调感中看到；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中首先找到一种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具有多元性，同样也具有主体的差异性，并且从不封闭。有时候，在有关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是否存在着僵化的客体主义问题的论战中，有些人将这种方法上的变易性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政治性著述的需要，认为这是为了将所谓的“现实性”从堕落为决定论的唯物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但是这并没有解决这个

重大问题；这个问题更多地是指马克思的研究对象的变易性，更多地是指马克思对主体性的阐释的价值，马克思对此有过表述，而且有时候还以此为主题。马克思的方法构成了科学的现实性，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工具去把握现实的多样性和多元能动性。只要阶级斗争能够形成反抗的爆发，那么马克思的方法就具有建构性。理论研究必须要寻找叙述的时机——在叙述中会产生质变，这种质变不仅与特定的理论整合这个独特事实相一致，而且也与特定的理论整合能够界定对抗及其可能性的事实相一致——爆发的潜力、传播的新水平和组织的新形势。当我们的研究从剩余价值理论开始，直到剩余价值的实现理论，将第一种理论运用到第二种理论中去并不是问题。这当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不仅要从资本的视角，也要从阶级的视角去洞察整个资产阶级力量的组织是如何以一种新的形式在社会层面上再生产出剩余价值的能动性。当我们研究世界市场的组织以及它与国内市场的关系的某种修正的时候，我们在此将再一次重温我们的研究（即以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两种形式），从而有一个新的大致了解。特定的抽象、把握趋势的方法、重新叙述和对研究领域的澄清：这种方法的能动性决定了“多元总体”，在这个多元总体中展开运动是需要冒险的，理解是困难的，同时在其中取得进展也是激动人心的。

我们在一开始所提出的关于《大纲》的方法问题上假设的最后一个要素是：这是一个关系到价值规律危机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是马克思研究中的顶点。这个假设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价值规律危机的高级阶段。马克思的方法、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都必须在随之而来的修正中被注意到并且必须作相应的改变。仅仅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提供一个回应。没有什么问题比这个问题更为核心了。

让我们喘口气来插入一个简短的插曲。我们在今天常常被告知：要把人类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同价值的自我稳定、变化和重构的诸多

环节的问题联系起来。这种在方法问题上的敏感同马克思的方法论是对立的。为了超越“马克思”，只要列举出大量重构马克思学说或横向重构马克思方法的实例就足够了吗？然而，超越哪一个马克思呢？是党校里教的那个马克思吗？还是我们在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的实践环节和理论环节中那个马克思？当我们重新阅读《大纲》，有一种感觉将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的确“超越了马克思”，与此同时，我们还超越了所有多元主义和横向的可能的方法论。研究领域是由现实例子的多样性和对抗中爆发出来的二元性之间的持久张力所决定的。正是对抗，赋予了体系化（或者反体系）的框架以统一性，这种对抗是同一种类对抗的自我扩张的源泉，而不是这种总体性的基础。在方法论上，只要阶级斗争与主体的自由相联系，这种阶级斗争必然会更加具有对抗性和破坏性。马克思超越马克思？《大纲》超越《资本论》？或许是吧。我们所能确定的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章节终结了每一个体系化的借口，这些借口想在价值理论中占据核心和主导的位置。剩余价值理论把对抗分解为力量的微观物理学。在需要和自由的多样性层面上进行重构，而不是在统一性层面上进行重构，在这样的视野下，阶级构成理论重新叙述了力量问题。马克思超越马克思，这也是一个重要而又迫切的设想。

最著名的《大纲》解读者们被《大纲》所局限而不能在《大纲》中自由思考。这就是他们（少数情况除外）不是根据《大纲》本身来解读《大纲》，而是试图强迫把《大纲》归结为其他东西的原因所在。单单是这些标题就在讲述一个故事：“一个伟大发现的历程”，或者更明确地，“在资本概念之前”，或者“马克思构思《资本论》过程的一个序言”等。对于《大纲》所说的这些固然不错，但是这始终存在一个问题，即把《大纲》变成另一个文本的起源，而不是就《大纲》本身来理解《大纲》。这些都采用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方法，这种历史编纂学方法仅仅停留在这种起源的连续性和观点的发展过程上，而没有注意到——至少是没有充分注意到——其中的跳跃、断裂、视野的多样

性和实践的紧迫性。

悲剧在于，当我们考虑到这些实质性因素，又会犯下另一个错误，这种错误是由经典化和体系化构成的。是的，有些人会说，《大纲》实际上是一个原创性著作，但是从马克思的信中逐字逐句摘取的词句可以表明：《大纲》是在充满力量的灵感的狂热中写作的，是在对极端孤立的绝望中写作的，是在实践检验的那一刻写作的。马克思在午夜过后亢奋地写作《大纲》。关于这种形式的讨论就到此为止（“出于同情，我们不再关注这些细节：所有的数学计算都是错误的，辩证法混淆了概念和多重定义”）。

就内容而言，《大纲》必须被放置在用来描述马克思“思想”的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方法论上的断裂之前：《大纲》是青年马克思的最后一本著作，概念的表达和分析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依旧是危险的和臆想的——如果说，剩余价值的理论发展过程是有根据的，那么伴随着主体性和灾难的爆发，这个理论的实现是一个完全的失败；唯物主义的表达几乎给形而上学的影响力让路，至少是给社会有机体理论（就像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那样）或者是给人道主义（就像在“机器论片段”^①那样）让路。这个文本被描述为令人敬畏的创造性的成果，但是，这个文本只不过是在重复马克思早年的人道主义中已经提出的观点。《大纲》只是一个散发着唯心主义和个体式伦理臭味的草稿；我们在“机器论片段”中找到的对共产主义定义的描绘只是18世纪客观唯心主义和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姿态的综合。

我必须得说，面对这些批判，我通常无言以对。这促使我用一种“德国式”的严谨去表明，面对文本的具体阅读，这些批判实际上何其错误。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又如何能够表明，《大纲》

^① 这里所谓的“机器论片段”根据原文中“Fragment of Machines”直译而来，这是西方学者自己对马克思的《手稿》中相关片段的命名，而不是马克思本人拟定的标题，这部分内容相当于中译本中“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88~110页。——译者注

不应当被归因为马克思在打造批判工具过程中对物质的狂热(the delirium of the material)呢? 我们是否能在物质出现的地方, 在这些物质所具有的最极端的规定性中, 发现《大纲》的不同寻常的特点呢? 这种特点就是, 马克思的矛盾学说的提出使得对抗变得不可调和。“我们打算揭示这些包含在资本中的矛盾”: 在这种矛盾演变为对抗的学说中, 没有人道主义的位置, 甚至也没有给物质本体论留下位置。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近的解读上, 我们说过这些解读相当重视文本的起源。在我看来, 他们过多地关注马克思理论发展的连续性。在所有这些解读中, 维戈茨基的解读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他对《大纲》所呈现的路径的重要性的强调是无可非议的。这对理论的界定和重构而言是重要的。不过, 维戈茨基的工作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新的外观”的一部分。当它一旦进入到对抗价值规律运行(价值规律的运行现在仅仅表现为单纯的指令, 缺乏“经济合理性”的外观, 甚至是最低限度的外观)的阶级斗争中, 当它一旦进入到针对价值稳定过程(valorization)而逐渐增多的对抗时, 苏联马克思主义就转向了保守; 必须要给陈旧的辩证唯物主义赋予新的面貌。想要削弱苏联意识形态体系的严格但又过于僵硬和不合理的色彩, 运用《大纲》中的辩证法是不是一种更好而且更有效的方式呢? 维戈茨基所从事的解读的重要性在于他超越了这个问题。它的角色和政治底线事实上也超越了这个问题。将《大纲》同苏联对《资本论》的庸俗解释联系起来, 这就给辩证唯物主义赋予了“新的外观”, 这种新的外观是被苏联的阶级斗争所强加的。那种允许权力结构为了统治而更加辩证地利用潜力的做法受到了价值规律和对《资本论》的经济学和苏联式的解读的影响, 而且在世界上一部分地区, 这种解读起到了真正的统治作用。维戈茨基的解读就是这样的别有用心和狡猾: 经常修正这个事实取消了所有负面特征, 同 16 世纪强势的科学实在论一样取消了理论的含糊之处。而且, 如果我们仔细地看, 我们就能看到维戈

茨基的解读——无论它有何种功绩——无法产生断裂，这是就如下被考虑的内容而言：尽管他在解读《大纲》中强调辩证法中的对抗性维度，以及剩余价值理论中实质性的和核心的章节，但是维戈茨基没有把这种分析概括为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总体性。恰恰相反，正如潘那瓦扎所强调的那样，他最终断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封闭的经济学理论”。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断言比指认马克思主义为“经济学理论”或把它界定为“封闭”的断言更荒唐。一种封闭的经济学理论因而也是一种均衡的理论。好吧，维戈茨基将会对此作出回应，他将会把一点点对抗性、甚至一点点自由掺加其中。

我们现在再来看罗斯多罗尔斯基。对这位作者的开创性工作加以苛评，不仅是困难的，也是不公正的。考虑到罗斯多罗尔斯基在将《大纲》和《资本论》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始终寻求其中的中间地带，情况更是如此。他从来没有试图直接地缩减《大纲》和《资本论》二者之间的距离，他更多地是想进行革命性的解读，而且给予《资本论》以原创性和创造性的解读。《大纲》和《资本论》就是这样，对罗斯多罗尔斯基来说，在《大纲》和《资本论》各自内部以及在这两本著作所形成的体系内部——因为这仍然构成了一个体系——而言，完全由一种强劲的对抗性贯穿其中，从而达到马克思和（或）格罗斯曼（Grossman）所接近的顽疾及其加剧和灾难。在我看来，罗斯多罗尔斯基的局限性（这已经超越了混乱和错误，我们已经指出他在分析“雇佣劳动”分册上的地位，我们还将进一步看到并讨论其他要点）是由包围着他的战争期间的共产主义运动左翼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一方面是一种极端的客体主义，另一方面又必然要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来寻找这种客体主义。一个要素服从于其他要素：客体主义允许左派共产主义的少数派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又要使它合法化。从这种视角来看，格罗斯曼是这种必要性的最清晰的例子。罗斯多罗尔斯基以极大的灵活性在客观局限性中移动。他能够进行不同寻常的解读。但他最终要面对这些局限性。在解读《大纲》的过程中，他一直在这个文本的不同寻常的新奇之处与正统的连续

性之间寻求调解，罗斯多罗夫斯基经常要面对由真正的智慧所构成的创造力。但是这无法令我们满意。从理论的视角来看，从解读这个文本的视角来看，我们的不知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稍后就能更深入地看到这点。但是，从政治的视角看，这也无法令我们满足。

我们发现我们正处于为革命运动寻求新的基础的阶段，而且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也不会成为少数派。我们不需要去争夺正统。而且我们将为能够绕开马克思本人而感到欣喜。这个断裂已经形成，这是不可否认的。只要考虑到我们的斗争，价值理论已经陈旧不堪。现在对我们而言，我们要在《大纲》的探索中还原马克思。这是因为《大纲》本身的力量，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忠诚。我们不再为正统而感到荣幸，也没有责任去为正统辩护。我们的话语将使我们分开，他们是矛盾的。而且对我们而言，《大纲》不止在一个方面还原了马克思。首先，他被还原为用价值规律的危机来看待资本大崩溃的理论家。这些分析虽然只是局部性的，而且这些分析也为塞尔吉奥·博洛尼亚所进一步推进，我们已经说过，这些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塞尔吉奥·博洛尼亚分析了《大纲》的历史语境，尤其是他指出了围绕货币的论战、美国与世界的经济危机（这已由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所进一步深化）和理论探索三者之间的关联。即使这些环节的综合不能成为“双重”革命的解放标志，或者也不能成为对由资本主义权力结构所导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的理论回应。但是，《大纲》中的马克思已经清晰地知道，没有理论上可供替代的选择：要么对群众运动起作用，要么对群众运动没有作用。马克思的分析中不同因素的综合建立在界定危机的基础之上，这个危机是作为革命运动寻找新基础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是建立在实践—理论的交织体的连续性的基础上，其中理论必须实现并包含这种连续性。通过对霍布斯鲍姆的颠倒和改写，我们应当说，对马克思而言，《大纲》是理论速记的集合：这体现了理论在实践中并且为了实践的惊人的顽强性。在《大纲》中实现的综合具有其自身的全部意义：《大纲》是马克思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因为它表示这个体系正在形成

过程中，而且它向实践的总体性保持开放的姿态而非封闭的姿态。《大纲》中的方法构成了对抗，范畴的总体性织成了概念网，这张概念网使得阶级对抗在深度上和广度上不断发展。《大纲》中所反复提到的灾难，在其现实性上，必须与政治实践之间的接合联系起来，在这一时刻，工人阶级的力量必须对价值体系加以制裁。

只要是从《大纲》通向《资本论》，我们就会感到高兴。在这种情形下，《资本论》中的概念对于理解这种对抗的发展而言已经足够了。不过，还有几种情况下，《资本论》的概念无法发挥作用：作为结果，我们有时候想，一定程度上加重的客体主义会在对《资本论》的严谨解读中被合法化。这样，从《大纲》通向《资本论》的运动是一个愉快的进程，相反从《资本论》通向《大纲》，我们就不能这么说。《大纲》是马克思革命思想的顶点。伴随这些笔记本而来的是理论—实践层面上的断裂，我们从中能够发现革命行动以及它既不同于意识形态又不同于客体主义之处。《大纲》中的理论分析将会寻求革命实践。让我们在此向汉斯·于尔根·克拉尔这位年轻同志所从事的解读致敬，向他敏捷的才智致敬，他正是运用这种敏捷的才智方能够在《大纲》的范畴演变过程中领悟到阶级斗争的组成环节。我们要清楚：这不是一个对抗资本的抽象争论的问题，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在阶级仇恨的理论意识及其反思中诞生的，我们在研究《资本论》的过程中都体验过这种阶级仇恨。但是，《资本论》同样也是这类文本：它致力于缩短批判与经济学理论之间的距离，致力于在客体性中消灭主观性，致力于让无产阶级的颠覆能力去改组和消灭资产阶级力量。如果我们根据《大纲》的批判来理解《资本论》，如果我们通过《大纲》的概念体系重新阅读《资本论》，而由无产阶级力量领导的绝对意义上的不可克服的对抗贯穿了《大纲》整个概念体系。如果能够这样，我们就能重新恢复对《资本论》的正确解读（不是为了知识分子的勤勉治学，而是为了群众的革命意识）。根据这样的观点，《大纲》就是在现实运动中对资本主义“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批判。同时《大纲》也保证了“自下而上的革命”的信心：它具有最强大的潜力，这种潜力能

够为了脱离现实进程的理论上的或者政治上的每一种自治运动而摧毁一切。这就是作为理解《大纲》(通过《大纲》的范畴)的唯一基础的全部内容。

在第三讲中我们将会重读《导言》并且提出一系列方法论问题，除此之外，我们将会在其他各讲中密切注意《大纲》文本的实质内容。第二讲、第四讲和第五讲将会勾勒出从货币批判导向界定价值规律的进程，而且这也是导向对危机和灾难加以界定的进程，正是在对危机和灾难的界定中形成了第一次通过这些分析的磨合而得出的理论上的结论。我们在第六讲和第七讲中通过对社会资本的实现和流通过程的分析，将会看到社会资本是如何形成的，也将会看到资本的总体形式和对立形式：这是这个阶段的问题，我们要在这个阶段中回溯潜在的“雇佣劳动”分册的思路。第八讲和第九讲得出了第二阶段的结论：从主体性和对共产主义的第一次界定，到这些分析的首次普遍澄清，这些澄清将会有助于对对抗得以产生的一系列条件加以修正。这也就是在灾难和无产阶级的自我价值稳定过程之间对马克思有关共产主义理论进行重新建构的问题。

除了提出这些设想和解释相比，我在这一讲中还能再说些什么呢？看起来我所说的已经够多了！不过，我会忍不住去想象，如果列宁和毛泽东手头上有《大纲》，就好像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逻辑学》一样，他们将会对《大纲》做些什么？我能确定的是，他们将会为了他们的实践而用他们很高的品位从《大纲》中提取特别的养料，就像蜜蜂采蜜一样。这就是我所钟爱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的路径。

第二讲 货币与价值

为什么本章从货币开始？

本章的整体计划。

货币与价值：货币作为价值的直接性。货币作为危机的历史直接性。

对蒲鲁东的货币形式及其神秘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的方法的极端激进性。

作为考察的出发点的倾向。

文本的分析：(a) 货币与危机。“平均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的意义。对蒲鲁东主义的颠倒。以及相反地，货币作为符号。(b) 货币与不平等：政治上的补充讨论。(c) 货币的系统分析：货币作为衡量尺度与一般等价物（以及对劳动的拒斥？）；货币作为一种流通方式；货币作为货币以及资本。(d) 货币—价值—资本。

为了进一步分析过程所作的一个计划。

从货币批判到权力批判：一个预期。

由于我们希望直接进入问题的核心，因此我们是从笔记本 I 以及笔记本 II（“货币”）的一小部分开始对《大纲》进行内在分析，而不是从笔记本 M（“导言”）开始，虽然它在时间上和论题上是在先的。我们将在第三讲处理笔记本 M 以及方法的问题，这样做的好处是：既然已经看到了这种方法的效用，那么就能够让这种系统化的方法去面对其在与事物关联过程中所经历的转变。1857 年夏天，马克思将这种方法界定为“通道”。这种性质，即笔记本 M 所描述的成为“通道”的特质，就会以这样的方式得以更清晰的呈现，而且这或许能确认这种方法的独特的创造性。

之所以要从论述货币的笔记本开始，另一个已经提到而且将会再次提到的原因就是：那些构成《大纲》主轴的线索实际上正是在对货币问题的论战中联结在一起的。这些线索是在对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并对回应“急迫的危机”的理论考察过程中所取得的非同寻常的成就。也正是在这些笔记本的基础上，马克思的研究实现了实质性的飞跃。

组成《货币章》的笔记本是从“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开始的。这个文本看上去似乎仅仅是马克思所做过的诸多笔记本之中的一个普通的批判性和评论性的笔记本而已。其实，这份批判达里蒙及其理论不足之处（然而，我们将会看到，其中隐含有一个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对于整个蒲鲁东主义的论战）的文本仅仅是一个由头。事实上，《货币章》的文本群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A. 《大纲》，pp. 115-151。^① 马克思开始逐一分析并批判达里蒙的著作，但是这个问题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对于达里蒙的劝告也就变成了对于他的理论发展的嘲讽。实际上，我们这里有一份标题为“货币与危机”的手稿的第一部分。危机所直接带来的问题成为了理论研究以及与此同时的各种现象（这些现象推动了分析）的一个基础性要素。

B. 《大纲》，pp. 153-165。^② 随后，在对《经济学家》的简短评论^③之后，马克思在此回到了达里蒙以及“小时券”问题上的争论上来，马克思同圣西门主义者可耻的幻想在小时券问题上展开了交锋。但是，这个问题很快就又变成了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份手稿的第二部分有一个重大的理论补充，也就是关于“作为社会联系的货币”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在之前的“生产”部分也曾出现过，这就将我们导向了马克思批判的核心地带，也给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指出了一个合适的理论起点。我把这个部分称为“货币与不平等”。

① 这对应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59~101页。

② 这对应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02~115页。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01~102页。

C. 《大纲》，pp. 166-213。^① 这里有一个对于货币属性的简短的补充。^② 其实类似的补充在“达里蒙”部分也曾有过。从《货币章》的A部分到B部分，事实上也就是马克思从论战到阐发的这些文字已经提出了一个对象，现在我们可以分析这个对象的体系化的、复杂的各种特性。我们可以将这个部分称之为“对货币的系统分析”。现在我们把这个文本按照体系分成三个部分：

- C1. 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其中插入了对于金属的分析；
- C2. 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
- C3. 作为货币和资本的货币。

D. 第四部分，这些分析又回到了货币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这个问题是货币理论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在B部分里已经触及到了这个问题。《大纲》中涉及了这个问题，但是主要是为了建构笔记本Ⅲ《资本章》的理论前提。我们在第一讲中已经提到了“价值章”在此框架中的最初的梗概，这一点仍需留心。

我们在一开始就要注意，论货币的章节被马克思编号为Ⅱ。论述价值的第一章看起来是在先的。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论述价值的第一章就变成了关于商品的一章，这样就为《资本论》的材料系统化做好了准备。但是，这里却没有关于商品的章节，我们必须去问：这种缺席对于马克思的研究过程是否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在笔记本Ⅰ、Ⅱ中，由于价值是以货币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这构成了从货币直接导向价值的路径。价值因此是与货币一样无用。这不是哲学的“陶醉”，对知识的惊奇、恍惚和期望并不导向理想的认知综合、想象的实体，而是导向批判、斥责、拒绝的实践直接性。而且，我们不是站在价值面前，而是置身于由货币构成的世界之中。货币表现了社会关系的形式；它表现、认可、组织了它们。这种“不

^① 这对应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16~166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15页。

是对价值而是对在货币形式下的价值”的直接进路——仿佛货币讨论了所有可能的价值，是否可能太幼稚了呢？但是这个世界自身表现为一个商品世界，而货币又以其自身完全表现了、决定了商品的定价。对“坦率”的马克思而言，达里蒙代表了有用的、低效的但可理解的进路。另外，如果一个价值理论没有直接地从属于、密切地必然联系于一个货币理论以及其形式——在此形式下社会关系中的资本主义组织被表现为社会交换的日常过程，它能意味着什么？如果一个价值理论被给予，它能够在“一种立即精减为货币的、交换的资本主义组织的以及在交换中剥削的理论”之外被给予吗？我开始意识到(马克思)这种进路的真诚。因为在这种处理材料的方式下，有如此多的阶级仇恨。货币有一种益处：能立即呈现蕴含在价值概念中的社会关系的可怕面孔；它立刻显示了价值在剥削过程中的功能：可以用来交换，并在此基础上价值可以作为指令，由此而形成一种组织。我不需要陷入黑格尔主义来发现商品和价值的两面性：货币只有一面，即作为老板的一面。

这种进路在《大纲》中是典型的，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他突出了在任何范畴基础上的首要实践对立。作为一种范畴综合的理论，价值理论是一种古典的、有资产阶级神秘性的遗产，对此，如果我们不想对此进行革命，我们完全可以等闲视之。以前古典理论看作正确的，就成为《大纲》所表达的抨击；现在能够在理论上显示这依然是适用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必须去反对从辩证唯物主义到斯拉法等人所有的对价值理论的重复。

因此，试图在马克思其他论述货币理论的地方(依罗斯罗多尔斯基，这里有四种，包括《大纲》中的)中寻找相似性是徒劳的。此种相似性直接就体现在价值形式上，因此至少在我们所编号的 A、B、D 这几点，相似性可能分布在这些主题中。也仅在那些我们归集于 C 点的材料，可能对应于马克思在别的文本中所论述的货币理论：无论如何我们将看到那些非同寻常的关注点与不同之处，是不能像罗斯多尔斯基反过来强调的那样，被缩减为简单的文字变化。因此

去寻找精致的连续也是徒劳的，这些不同之处不仅是文字上的，而且是实质的。《大纲》与马克思后期著作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首先，价值规律不仅仅表现为间接的，而且直接就是剥削的规律。从商品的分析，导向价值的分析，以及剩余价值的分析，并不是一条逻辑上一贯的进程：中介并不存在，或者，它是一种文学的虚构，一个纯粹、简单的神秘化的东西，没有包含哪怕一盎司的真理。把货币作为价值形式的代表，意味着认识到货币是价值规律功能的专用形式。由此就会认识到，它限定了批判的直接范围。批判是在直接性的内部进行的批判。

货币被看作是价值规律的一种明显的表现形式，《大纲》中对货币的抨击的重要性在于，这无论如何不能被束缚于仅仅批判这样的直接性特征。所以立即就有另一种观点被考虑；那就是社会关系，在此之下使得价值关系极端化，这不是从统一的观点，而是从对立的观点去设想。如果资本主义关系没有在统一中解决自身，对立将是唯一的存在，因此，如果价值关系是直接关联于社会对立的直观二元论/多元论，如果它没有构成一个媒介的他者，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就必须去考虑那些剧目中诠释不同角色的演员：价值关系将总是虚构，也只能是虚构，它过度强调了社会—政治的阶级冲突的决定性。一个人不能不提到剥削而去说价值，但首要的是，不把决定定价的功能当做阶级斗争具体内容的过度决定，当做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指令(command)与统治——决定每一个的构成。

最后，必须考虑三个因素，以便完全理解《大纲》中论货币的开放性的极端重要性。货币作为价值规律的危机的表现是第一个因素。货币作为过度决定、作为张力去控制两个斗争中的阶级的构成者基础，这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是马克思归属于分析层面的重要性，这是直接的资本社会化的分析。这将不可能在一开始就把货币作为一个专用的价值证明形式——即没有把资本的社会化过程作为一个前提。

我们将在更宽广的范围上返回到这些辩论。目前，似乎我有机

会回应开始阶段所提出的问题，即论商品的一章在事实上是否被丢失了，而分析是从价值开始的，就像它直接在货币中出现，从而在《大纲》中引起了有益的影响。似乎我有必要对这一问题给出积极的回应。在货币的形式下，价值规律被表现为(1)危机，(2)以一种对立的态度，以及(3)有一个社会的维度。这是从根源上来讲的。从这个预设出发，会必然加上：《资本论》看起来几乎是一种对《大纲》的准备：它通过概念详细地恢复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大纲》就把这一历史的结论当做其批判的对象。

这是《大纲》在理论层面上的冲击。但我们必须注意这一事实，这并非是无关紧要的事实：货币——对其历史形态的分析——是为了对危机进行分析。因此，理论进路隐含地在其自身历史性分析中所包含的东西，清晰地被显露出来。在此方面，塞尔吉奥·博洛尼亚已经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证明。具体来说，基于马克思在新闻报道中所用的材料，危机发生于1857—1858年左右，货币方面的危机看起来是核心因素。因此达里蒙是马克思辩论中的初始对象，这毫不意外：在其著作中到处都有的——比如，有关蒲鲁东的**免费信用——资产阶级国家以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来运作的那些历史**，那些段落令人费解。马克思就在此发现了其自己：“现代国家的第一个完整形式，即社会资本的管理；现代货币系统的第一个完整形式，即流动性的集中管理。”所有的这些在危机的形式下得到表现：马克思的路线是从坚持在危机的货币图景(从现在开始，危机总是在货币形式下表现自身)下降到社会关系的危机分析，从流通的危机分析，下降到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关系的危机分析。如果在预期的巨大影响下，危机会塑造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性倾向。而正是在这种历史作用中，危机成为价值规律的危机。在这种生产形式日益社会化的历史作用下，价值的现代功能就被转化成为“必要劳动与积累的社会部分之指令、统治、干预”的功能。这样国家就成为“市民社会的联合体”：这种导言中的定义、阐述，在《大纲》中可以持续发现的证据，已经成长为更完整的定义，即看作国家中总体资本的代表，用

恩格斯的话说，自身就是“总体资本主义”。这一段落是现实的，通过定义危机的必然性而证实之，但同时也指示了解决的方向。因此，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结果下，危机必然会预演，而在这些段落中意识到的运动倾向，即对抗性，应该被强加。要牢记的是，资本主义试图完成的强力综合，即在指令的形式下通过其社会化、组织化而做到的，对此需要有足够的范畴回应。而这种理论不能从其对历史的语境中分离开。货币，即转化成为价值形式的货币，就代表了危机的历史直接性——同时也是趋势的历史直接性。

蒲鲁东写了这一段，但却是为了使它神秘化。那么蒲鲁东和达里蒙实际上是如何回应危机所提出的问题呢？他们这样回应：把货币解释为一个等价物，坚持其特殊性，他们的目的是重新估算一个纯粹的、可控的、充足的流通。但是，马克思注意到，如果货币是一个等价物，如果它有等价物的形式，它首要是**社会不平等的等价物**。那么，危机并不是来自于平等化的社会中流通的不完善，它也不能被平等的社会中流通的改革所纠正。危机是从生产关系的不平等而来的，只能通过克服这种不平等而被克服。货币隐藏了一个内容，即它是最不平等的、剥削的东西。**剥削的关系是货币均价的一个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一内容不能被发现。而马克思揭示了它。但这一揭示并没有结束：依然有必要强调货币所隐藏之内容的形式，有时候最终这是比内容自身更为重要的。因为这种形式是矛盾的、对立的形式，它是货币流通所试图终止、解决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者，就在这里寻找完善——在危机的限度和顺序之外——流通和均价的机制，如此就消解了那些具体的反映，即从所隐藏的内容的对立中而来的形式。资本家寻求改良主义的发展，这提供了保护，以避免来自劳动者这一面的批判；资本家自身的重组，与替代的必要性相关联，总是达到矛盾的最大限度，即流通形式从生产关系的对立而积累的那个限度。因此，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去神秘化，就要揭示改良主义和发展中的资本利益的结合点。这就是说，要坚持剥削功能的形式中心。这还要分析到这一点上：革

命是作为剥削内容的解放而出现的，即是从价值的流通形式中解放出来，这是极简单的价值——没有别的，只是剥削的计算形式。但这还是不够的。如果价值的形式和内容是如此联系到剥削，如果所有的重建形式都是剥削内容的深化，对抗就会有助于一个更加集权的社会的形成：如果没有资产阶级社会、雇佣劳动——作为一个价值的、指令的流通器具的价值、货币的生产者——的毁灭，就没有革命。所有流通形式社会化的过程，都突出了剥削的内容：因此正是这样联系的过程，应该被摧毁，与之相伴随的意识形态(起到了反映和强化作用的意识形态)和组织都应该被摧毁。所以改良主义者对于货币的改革都是毫无用处的。另一方面，“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这种运动和全部脏东西的分解会获得解决”^①。正是这样的深入解读，笔记中论货币的多个部分被结合起来、清晰起来了。

但依然需要更有意识地去分析。反对蒲鲁东主义的辩论就含有三点内容。也就是说，在一方面，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专注于他的理论的、政治的批判，去反对那一时期特别的“社会主义”神秘化，即在论银行和一般等价物的辩论中，以一种毁灭的态度干扰之。另一方面，也在第二位上，马克思把辩论放在这种趋势的尽头，在他看来(也成为所有人都看到的)最最根本的是：有一种“通过彻底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代表”而变革国家的趋势，且在金融领域重建国家。在50年代的危机中，那段时期展开了一种最后导致希法亭和列宁所讲的国家金融资本之代表的那种东西：这正是马克思在论货币时所坚持的趋势因素——下面可以看到。再一次，这个结果是一种假定。那么，通过这两个辩论活动，这时期论货币的写作中，价值理论的精致轮廓被划定了——作为第三个基础性因素：价值是作为一种不平等的社会与均价的媒介，价值理论作为剩余价值理论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社会剥削之社会角色的一部分。最后的层面在于提出辩论(货币，在国家形式中市民社会的综合，剥削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社会形态的深化)，以要求价值理论之特色以及其定义，这是以剩余价值和剥削社会化的专用术语来说的——在《大纲》中明显可以看到的术语。这样有人就能似是而非地说：在《资本论》中范畴主要被塑造为私有的、竞争的资本，而在《大纲》中被塑造为社会资本的趋势性计划。这就是反对货币的方式，就像在反对蒲鲁东主义的辩论中所定义的那样。

现在让我们再对笔记本 I、II 中论货币的部分进行一次逐字逐句的阅读。第一部分，我们已经标题为“货币与危机”，是完全激烈的关于两个术语的交叉点的运动：危机显示了货币是什么。至于达里蒙，他的论述——如果顺着文本——没有任何东西，除了在统计和计算层面的错误连续。但不能仅仅局限在文本中；所以蒲鲁东主义者的一般论述所导致的政治结局，必须被考虑，也直接被谴责。

在这里，我们涉及基本问题，它同起点已经不再有联系。这个问题一般说来就是：是否能够通过改变流通工具——改变流通组织——而使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发生革命？进一步要问的是：如果不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是否能够对流通进行这样的改造？如果流通的每一次这样的改造本身，又是以其他生产条件的改变和社会变革为前提的，那么，下面这种学说自然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学说提出一套流通把戏，以图一方面避免这些改变的暴力性质，另一方面要让这些改变本身不是成为改造流通的前提，而相反地成为改造流通的逐步产生的结果。这一基本前提的荒谬足以证明，这种学说同样不了解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流通关系之间的内部联系。^①

简言之，那些绅士想要改善资本主义，货币的流通“不消灭在货币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69 页。

畴上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本身”^①。但这是一种自行取消的要求：这是不同的，实际上，“想通过一种关系的形式上的改变而摆脱这种关系的重要条件……货币的不同形式可能更好地适应不同阶段的社会生产；一种货币形式可能消除另一种货币形式无法克服的缺点；但是，只要它们仍然是货币形式，只要货币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那么，任何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任何雇佣劳动的形式，即使一种形式能够消除另一种形式的缺点，也不能消除雇佣劳动本身的缺点。”^②

的确，蒲鲁东主义先生们的工作，试图神秘化事物的实际内容；但是当有些东西，诸如危机，重新提出了这些问题后，这如何可能呢？货币是社会对立的媒介范畴，其定义稳固了危机的可能性，而在活动中实现了它的证明。

但是，在这一点上有充分的展开：如果货币和危机的交叉摧毁了蒲鲁东主义的神秘化，它也能产生更重要的效果。特别地，它揭示了价值是什么。价值的定义完全被带回到货币的一般性，在危机中它揭示了货币的特有功能，即隐藏或表现对立的社会关系。正是因为货币在危机中所具有的这种功能，价值规律必须被重新思考。货币的属性必须要预设价值的属性。已经存在的那些价值理论，只是简单地间接提到货币，这种货币作为对立的社会关系的具体表现。价值将通过平均劳动而定义，通过社会必要劳动而定义，就在此意义上货币被定义。“决定价值的，不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而是现在必要的劳动时间。”^③但是，如果看起来更密切，必要劳动的定义是一种已经社会化的定义。所以，“商品的市场价值总是不同于商品的这个平均价值，总是或者高于或者低于它”^④。“作为价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69页。

② 同上书，69~70页。

③ 同上书，83页。

④ 同上书，85页。



一切商品在质上等同而只在量上不同。”^①这里蒲鲁东主义的假说又一次被倒转了：改良主义者所认为的解决对立的方式，已经包含了这种对立，并以此对立为基础。正是在社会关系的媒介的层面上，货币作为价值的突出形式，构成了领域，价值理论要么在此领域之内，要么在此领域之外。此领域可以是任何东西，但不是价值的形上学！马克思将此留给了他的后来者，当然也留给了那些追随他的人。价值是货币，是无用的，注定要消灭而无法用另一种形式去替代。这就是货币的压迫。让我们研究它，从而毁灭它。

现在我们来考察价值—货币—危机的等式。作为一个持续的波动：

商品的市场价值总是不同于商品的这个平均价值，总是或者高于或者低于它。市场价值平均化为实际价值，是由于它不断波动，决不是由于和实际价值这个第三物相等，而是由于和它自身经常不相等（要是黑格尔的话，就会这样说：不是由于抽象的同一性，而是由于不断的否定的否定，也就是说，是由于对作为实际价值的否定的它自身的否定）。^②

这种波动同时是危机的活动与可能性的规律。这种波动是价值的存在形式，是价值的持续交换与实质的二元性。这种波动是社会关系的显露，实际上扩展了自身，这是一种作为专用的社会关系而加强的交换模式。因此这种波动依然是，也总是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危机是什么？构成概念的危机，指向了作为对立和危机之现实的定义。

生产越是发展到使每一个生产者依赖于自己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说，产品越是在实际上成为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越是成为生产的直接对象，那么，货币关系以及货币关系的内在矛盾，即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89页。

^② 同上书，85页。

品同作为货币的自身的关系的内在矛盾就必然越是发展。交换的需要和产品向纯交换价值的转化，是同分工按同一程度发展的，也就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而发展的。但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生产者在什么程度上依赖于交换，看来，交换也在什么程度上不依赖于生产者，作为产品的产品和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之间的鸿沟也在什么程度上加深。货币没有造成这些对立和矛盾；而是这些矛盾和对立的发展造成了货币的似乎先验的权力。^①

总结一下，作为货币形态的价值，被矛盾地给出，被看作“商品的这两个分离的存在形式不能互相转换的可能性”^②。这种对立的性质（“而等同本身取决于外部条件，也就是说，是偶然的”^③）被显示为空间性的（商业的危机）和时间性的（循环的危机）；但是其基础是社会关系，在此发现交换价值、货币等形式的必要性。这里危机的可能性就转变为其现实性：

被强制分离的而本质上是同属一体的东西的各要素，绝对必须通过暴力的爆发，来证明自己是一种本质上同属一体的东西的分离。统一是通过暴力恢复的。一旦对立的分裂导致了爆发，经济学家就指出本质上的统一，而把异化抽象掉。^④

所以，这种对“货币与危机”的论述，准备了一段对现实性的分析。一方面，马克思运用了蒲鲁东主义的假说（马克思认为这种假设是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95～96页。

② 同上书，96页。

③ 同上书，97页。

④ 同上书，99页。

种神秘化，这是在危机中所发展的从价值的形式到货币的形式)；另一方面，转变了这种假设，显示它是虚假的，试图去假设一个真实的对立。因此危机必须使自身政治化，必须攻击对立的社会条件。而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遵循的路子。“论货币的笔记”第二段就从此领域开始。至于我们已经考察的第一段，看起来好像在准备跳跃，进入唯物论批判应该考虑的事物中。

但是在我们也进入上述领域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因素——这个因素时常被隐藏着——在我们已经考察的这些文本中，这是我们还没有考虑到的。正是出于这样的关注，货币才被当作符号。这等于说，马克思就在此考虑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货币(价值)功能从构成它的对立中断开的必然性，他还考虑了这种分离的影响。断裂、分裂等同于阶级对立的深化，这在货币关系之下。但是对立的因素，如果它们不被调停，会在所有其对手的权力中重新出现。在《大纲》中，马克思将更注重在分裂层面上强调劳动阶级的构成。这里他实际上坚持把货币的政治功能作为一个符号，作为一个指令功能。货币只作为一个符号，作为社会符号，作为先天观念——简言之就是货币主体——既是目前危机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危机的一种解决。让我们更密切地关注这一观点。马克思揭示了他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不是黑格尔式的中介，不是蒲鲁东主义的价值规律，而是对立、危险和开放的逻辑。这种符号能成为主体，价值成为指令，过度的决定性能中断这种辩证法，而被权力和指令这种暴力限制。法西斯主义、野蛮状态和衰退不是不可能的。这种符号能比真实者更强，因为他是从现实的有意分裂中来的。我们以后将会看到这种马克思主义者的洞察力的极端重要性(罗斯罗多尔斯基的解读太枯燥了。当他正当地坚持基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本质因素，而获取剩余价值力量的可能性时，罗斯罗多尔斯基低估了在这个问题上一种再现的可能性，罗斯罗多尔斯基没有认识到这一逻辑的、理论的段落也是一个历史的、政治的段落)。

“货币与不平等。”又一次学究式的开始：批判格雷和圣西门的银

行。马克思自己重申：生产的一般条件，从货币到交换，到个体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最大的交换，不是商品的交换，而是劳动同商品的交换。”^①就在此处爆发了！《大纲》的第一个大飞跃，第一次从政治角度加以讨论。

让我们开始更简单的一点：货币，即价值的形式，是不平等的关系——财产关系的一般代表，权力关系的实质性代表。

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切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另一方面，每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②

那么，交换力量越少，把个体联系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越大：这是古代社会的形式。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③

这是一种历史哲学？这样说不正确：因为实际上所描述的历史马上被转化为一个活动的、建设性的关系，同时也转化为辩证关系，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05页。

② 同上书，106页。

③ 同上书，107~108页。

是如此极端以至于不能不被解决。一方面，因此“交换和分工互为条件”^①。所以，就在劳动的身体中，已经被植入了完全从其中抽取的交换和货币的虚伪面孔。这就是“具体化，具体的关系，具体的交换价值”。但是另一方面，所有这些意识、意志、理性都变成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摧毁：“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不是自然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②如果看得更近一点：这种发展是斗争，是断裂，也是创造。一个原初本质的保存是毫无意义的。这里，人文主义没有位置。“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为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着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③确实，这两个要素的辩证是必要的：“普遍的卖淫现象，表现为人的素质、能力、才能、活动的社会性质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④但甚至更必要的（历史的和意识的）是这种卖淫的崩溃。

这种理论的和政治的爆炸没有什么内容，但是却影响深远。到这时，这正是一个预期，等待着栽种的种子成熟，从而作为主角来表现自己。那么让我们培育这些种子，转向货币的分析。

“货币作为衡量尺度、作为一般等价物。”我们知道问题以及其解决方式。“货币是这样一种物质中介：交换价值隐藏在其中，从而取得了一种符合自己一般规定的形态。”^⑤但是只有劳动时间能使货币具有这种“一般性”：“货币是作为一般对象的劳动时间。”^⑥随之而来的是亚当·斯密的批判，它假定劳动的两种决定——生产的与为了货币而生产的——是并列的。现在，为货币而生产，与此同时存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08页。

② 同上书，112页。

③ 同上书，112页。

④ 同上书，113页。

⑤ 同上书，117页。

⑥ 同上书，119页。

的是剥削的一个环节、社会化的一个环节。资本主义社会化提升了货币作为剥削的社会性，当共产主义社会化摧毁货币，确认劳动的直接社会性。“在第二种情况下，前提本身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共同生产，作为生产的基础的共同性是前提。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被设定为社会劳动。”^①马克思一会儿又接着说：“他的产品不是交换价值。”^②

现在，值得去重新考虑这个推理的某些因素，而且是那些我们已经面对过的因素。那不断冲击我的，正是马克思把货币(价值)具体化的一般性，转变为联合劳动的生产一般性，这种转换是基础性的。这种转变意味着没有同质性：范畴的、马克思方法的对立特色排除了它。价值的表现越是依赖货币的形态，价值的拒斥、转变的激进就越具有基础性。共产主义不是交换价值的实现，而是货币力量成为真实尺度的实现。共产主义是所有尺度的反面，是最暴烈的多数性——创造性的确认。

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然而，这同用劳动时间计量交换价值(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本质区别。^③

时间的经济和自由计划的活动：让我们注意这两个表征共产主义的要素。这是对劳动的拒绝吗？再一次(像我们将要做的)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完全没必要的。

“货币作为流通度量。”我们是在货币的宏观层面上确认货币及其运动创造了社会化和危机。在(贵金属作为货币关系的承担者的)文本中，马克思又展现了他的理论锋芒。现在“首先必须确定流通的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22页。

② 同上书，122页。

③ 同上书，123页。

般概念”^①。这是《大纲》的另一个中心点：在这个基础上，实际将会有分析的第二个重大线索。即必须处理此层面的社会资本和对抗性的问题。而且这条线索像我们之前解读过的内容那样具有非常深刻的结构，并且能够发展出丰富的理论预见。但是让我们一个一个地看这些文本。在第一个地方，货币被表现为运动中的普遍，作为“永动机”，作为“川流不息的、或多或少发生在社会整个表面上的交换总和，交换总体，即交换行为的体系”^②。但是，在第二个地方，在这种作为流通发动机、市场联合体的内在活动者的角色，货币也是一般等价物的具体化和自主化。“商品的流通条件是：商品是作为交换价值来生产，即不是作为直接的使用价值，而是作为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使用价值来生产。通过转让和让渡并以它们为中介而实行占有，是基本的前提。”^③而且：“流通是这样一种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普遍转让表现为普遍占有，普遍占有表现为普遍转让。”^④货币被表现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权力”。从这里引出具有基础性的推论：也就是说，对立隐含在流通中货币的二元范畴中，这产生了作为恶的无限的流通。实际上，这个过程与所有看到的观点相冲突；其中表现的活动是彼此无关的，远离于空间和时间。包含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自身之内的危机的可能性，在流通的层面上得以表现。

既然买和卖这两个流通的本质的要素彼此无关，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分离，它们也就没有必要合而为一。它们的彼此无关，可以导致一方对一方的固定化和彼此表面上的独立。但是，既然它们构成一个整体的两个本质的要素，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刻，这时独立形态遭到暴力的破坏，内部的统一通过暴力的爆发在外部恢复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37页。

② 同上书，138页。

③ 同上书，147页。

④ 同上书，147页。

来。这样，在货币作为中介的规定中，在交换分成两种行为的分裂中，已经蕴藏着危机的萌芽，至少是危机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只有当取得典型发展的、与自身概念相符合的流通的各种基本条件已经存在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现实。^①

但需要再一次声明，这还是不够的。在《大纲》中，论述中所有的转变是围绕着流通的对立而展开的，其空间和时间上的规定性，立即被转移到劳动的区分，转移到对立的社会条件。这也是这里所发生的。但也存在相应的段落，即转变、收集流通中资本过程的积累以便否定之，这不是为了继续发展，而是以毁灭和共产主义的出场来说的。这系列的段落是基础性的，因为它证明了危机的可能性内在于货币的概念，它也证明了马克思范畴流程的性质。这实际上并不是危机的辩证可能性，而是经过转化的对抗性暴力。这就是证据，说明范畴的使用是变化的：范畴无止境地返回对立的主体；他们只能在此光线下来精确理解，他们只能在此方式下起作用。

让我们继续。就在这点上，货币“在这里首先表现为目的本身，商品交易和交换只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服务的”^②。“因此，我们必须从货币的第三种规定上来考察货币。货币在这个规定上包含了前两种规定，就是说，既包含充当尺度的规定，又包含充当一般交换手段并从而实现商品价格的规定。”^③剥削的辩证方案包括：综合证明“货币作为货币和资本”，作为这个过程的总体实现。这样有一些东西，像马克思流程中的暂停：对立的转变实际上不放在最优先的层面。在一个长期的、综合性的货币现象学中，这种分析会使自身感到满意。这种现象学实际上要去证明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关于资本部分的主体。货币的力量作为流通的代表，其整体性和对实现的整体控制就极大增强了。货币的控制有其表现，而且与活动性和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49页。

② 同上书，154页。

③ 同上书，154页。

动性无关：货币在逐渐幻灭的荒谬形式下，演练其控制。在所有地方，它在坚持中淡化了自身，但同时它又作为整体的符号而复活自己。它的调停，就像它既是刚性的又是弹性的一样。然而悖论正是这样被物化的：货币逐渐幻灭的权力攻击了事物，以自己的图像和形似物而转变了他们。这是造物的力量，通过一个符号而修改了现实。很明显，在马克思那里，货币是权力的同语反复。权力扩张到任何地方。而实际上：货币被表现为生产关系（“如果从生产的总体上来考察生产，货币关系本身就是生产关系”^①）；被表现为生产工具（“因为流通已不再表现为流通的最初的简单性，即量的交换，而是表现为生产过程，即实在的物质交换。于是，货币本身就被规定为这种生产过程的特殊要素”^②）。作为权力（“在商品世界中的扩散和分散”^③）；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个体化”行使了（“对于社会，对于整个享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④），尤其是表现为雇佣劳动之上的权力（“货币的简单规定本身就包含着这样一点：货币作为发达的生产要素，只能存在于雇佣劳动存在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能存在于这样的地方，在那里，货币不但决不会使社会形式瓦解，反而是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⑤）；“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必须直接是一般劳动的即一切个人劳动的对象、目的和产物。劳动必须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必须直接生产货币。因此，劳动必须是雇佣劳动。”^⑥作为一个生产的权力（“作为目的的货币在这里成了普遍勤劳的手段”^⑦：“因此，很清楚，在以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67页。

② 同上书，171页。

③ 同上书，172页。

④ 同上书，174页。

⑤ 同上书，175~176页。

⑥ 同上书，176页。

⑦ 同上书，176页。

佣劳动为基础的地方，货币不是起瓦解的作用，而是起生产的作用”^①），作为一种普遍权力（“引起新的需要”，“使财富扩大到具有普遍性”，“创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一般性”^②）。最后，货币被表现为“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真正普遍的实质”。

在我们已经讨论的文本中，货币代表着“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真正本质”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在其他分析货币的文章中，作为资本的量化的货币，所包含的这一特定辩证过程，或者说，货币的逆转过程，在论证“货币作为货币”的篇章中是不会出现的。这是货币主观性发生作用的结果：它通过对它的一方面的确证而被着重强调。重新使用我们在 B 处总结出的主题是可行的，由于在那些篇章中我们已经充分论证了逆转带来的压力。但是，这会更好，如果我们更加注意笔记本 I 结尾和笔记本 II 开篇中所强调的新主题。尽管这些文章文字冗长，但正是在这一主题中，逆转运动被充分阐发，并且主题鲜明。

这里，马克思坚持三个主题：货币和世界市场，货币和生产流通，社会再生产的政治和组织形式。

这是三个密切关联的主题。事实上，在这三个领域，逆转运动都带有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是从马克思这部分研究的尾声部分衍生出来的。我们可以指出，与 B 处的情况不同，这里更强调比较的广度，而不是比较的深度。

世界市场是一个特别的领域。这里危机决定着“普遍指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态”^③。世界市场通过市场流通作用放大了货币的矛盾。在这个整体领域中，矛盾双方的差异被最大化，并且还不断积累着更多的差异。世界市场是一种趋势，而货币作为一项基础权力，对于它的建立起到了决定性的导向作用。但在这一导向过程中，货币也凸显出构成自身的这一对矛盾。这种向世界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176 页。

② 同上书，178 页。

③ 同上书，181 页。

场的质的飞跃，体现出整体矛盾中的对抗性。我们一会儿将回到这一点上，同时也要指出对马克思所论述的“世界—货币—危机”的批评意见因何而来。也可以指出，事实上，这种研究的深度，倾向于否认研究的广度。另外，不断积累的矛盾与对抗性的再现之间的“关系”，更类似一种逻辑上的跳跃，而不是一种演绎。但是我们不久将回到这一点。我们将继续第二重关系，即货币与货币流通之间，以及货币和再生产之间的讨论。在货币流通中，货币作为再生产的力量(potency)，以生产为条件，完成了对自己的再生产。货币“在货币流通中作为与自身的关系”的形式而存在，但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

流通过程同样必须表现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过程。因此，这一方面是交换价值回归为劳动，另一方面是货币回归为交换价值；不过这个交换价值现在被设定在更深的规定上。对于流通来说，一定的价格是前提，作为货币的流通只是在形式上设定这个价格。交换价值本身的规定性，或价格的尺度，现在又必须表现为流通行为。这样被设定的交换价值就是资本，而流通同时被设定为生产行为。^①

作为一种生产行为的货币流通，逆转过程因此也必然发生在生产流通过程中。它包含对资本全体过程的合成，在其中，“货币在其最后的完成的规定上，从所有方面来看都表现为自我消灭的矛盾，导致货币自身消灭的矛盾”。同时在这样的例子中，准确地说在世界市场的例子中，货币的这种总体流通和生产过程决定了“对抗性的爆炸”。最后，要考虑的第三点，是货币—制度形式。在这一语境下，“货币关系的规定性的特点就在于：在从简单意义上来理解的货币关系中，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内在的对立在表面上看不见了，因此，资产阶级民主派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后者至少是前后一贯的，以致他们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89~190页。

后退到交换价值和交换的更简单的规定上去)更多地求助于这种简单的货币关系,来为现存的经济关系辩护”^①。“货币制度实际上只能是这种自由和平等制度的实现。”^②现代人的民主是对其交换价值的彻底实现。所有的民主组织形式仅仅是体现。但是在这里,对立矛盾同样贯穿于交换价值的积累过程始终,贯穿于以期实现对立主体性条件的货币积累过程始终。“在交换价值和货币的简单规定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工资和资本的对立等等。”^③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结果就是:

……必须这样回答:交换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而在这个制度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对平等和自由起干扰作用的,是这个制度固有的干扰,这正好是平等和自由的实现,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认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成为资本,或者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成为雇佣劳动,这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愿望。^④

应当指出,马克思从货币到世界市场到危机的论述,在论证深度和概要性作用上不如其他那些总结性论证货币作用的章节。但是,姑且不论马克思的论证局限,这里加上一系列特定注解是必要的。对马克思而言,《大纲》中关于世界市场的论述,还是一个未完成的部分。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笔记本 M 和包括其他笔记的许多地方。在所有与世界市场相关的案例中,都体现着马克思的一个著作计划:一部由多章节组成的,拟将包含所有对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理论进行论述的著作。**世界市场与危机对抗**。如果我们仔细甄别,当马克思开始撰写关于世界市场与危机的著作时,他并没有将其笼统地与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195 页。

② 同上书,201 页。

③ 同上书,203 页。

④ 同上书,204 页。

球化，与资本的共时性、同质性混为一谈。相反，他清晰地对他们进行了区分。世界市场被理解为一种特别的理论范畴。我们将继续在第三讲的方法论中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如何与不同的理论范畴清晰对应：值得强调的是，具体要素的累积，决定了一个新范畴的水平。分析在置换与解构中不断推进。当然，我们可以要求，在新的水平上，关于对抗性分析的深度与广度要相匹配。这往往是一个视觉效应，特别是马克思对世界市场一危机问题中所得出的结论与理论分析之间的不平衡，会让我们感到不快。但假如从马克思的论述出发，我们用关于几个世纪以来世界阶级斗争不断积累的理论作为分析基础，那么我们会发现这种结论的无力。另外一种解释是，马克思论述所强调的，并不是对理论范畴的强调，而仅仅是基于对货币中对抗性内容的偏见。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有过论述。

本章对货币的论述已接近尾声。对我而言，我们已经初步回答了最初提出的问题，而且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尤其是，我们似乎已经可以去证实本章开始时在货币问题上所作出的判断。现在，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这种货币分析理论的优势体现在哪里？我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阐述。

首先，从初步解读来看，对我而言，价值—货币难题立即指向对价值的具体化，这一点从未出现在马克思著作的其他地方。从货币—形式到商品—形式，从《大纲》到《资本论》的各种文本，只增加了问题的抽象性与迷惑性。尽管所有意图和指向都指向相反方向，同时也是对决定商品的因素的另一种见解，也包含了对黑格尔的方法论的进一步的理想化。其次，对货币理论的强调，并不会直接导致或分裂价值规律。我们将在第四讲中看到，我们如何将价值规律理解为剩余价值理论的一部分：价值缩减为货币，同时它也驱除了由自动化形成价值规律的预期，它反而介绍了研究的结果，而且开启了良好的研究路径。货币本身就是一个具体的、包含所有动态和对立矛盾的价值概念，除去那些无用的、抽象的对价值的论述，无

论是从表面的还是从实在的观点出发，都是如此。

其次，从表面的观点来看。这里，货币可以被表述为拥有一种强大的权力，一种拥有强大能动性和对抗性倾向的权力。一方面，从趋势的角度出发，马克思确实曾经强调指出，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但是，这要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①。我们同时也可以想到，“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地方，货币不是起瓦解的作用，而是起生产的作用”^②。

尽管如此，对抗性的基础依旧存在。货币和劳动分工、货币和剥削、作为其结果的不断加深的分裂，这些来自货币的直接作用，发展出货币作用的基本准则。从表面的观点出发，价值规律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我们，货币理论在这里也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加有效和丰富多彩的形式。

这些都只能在更为深入的研究中得以实现。在这里，货币作为一种特别的动力机制，向我们直接展现出作为危机的价值规律。货币告诉我们，价值运动是完全偶然的，以至于它的稳定性只是一种偏见，而且只能决定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和它的必要过分劳动的交替中。坚持这些构成剩余价值理论基础和成立前提的动机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只有当剩余价值规律成为一种视域，而不是一个自足性的理论范畴，它才构成了阶级斗争理论的一部分。而且，只有在此视域中，货币完美地表现出价值规律的衰减过程。从货币理论出发，实际上，一方面我们有可能消除价值理论的残渣，发现价值—价格之间的关系。是货币直接构成了这种关系，诠释出社会劳动平均价值和过分决定价格之间的波动关系。货币自身便展现出这种波动关系，除了这种波动关系外，货币只是一种建构的波动，它调节并展现着由社会劳动创造的完整价值。另一方面，货币也展现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75页。

② 同上书，176页。

从它作为货币的一面来看，它也是一种“抽象的感官”，即资本的需求超越社会运行，以期获得过分要求的剥削波动。货币使得我们能够理解剩余价值如何在社会需求中得到巩固，如何在资本主义正常社会条件下控制危机。以货币分析为中心使得马克思能够实现基于古典经济学的激进创新。这种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发现价值规律是基于社会平均劳动，发现价值的波动性和对抗性，以及它潜在的对抗性。

但是现在有必要来探讨这种对抗性的决定因素。毫无疑问，分析将从对货币的批评转移到对权力的阐述。目前这一领域以剩余价值理论作为基础理论，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当它不再总是以社会劳动带来的冲突、波动、危机和对抗性为基础时，即不再以财富转而是以指令为基础时，价值规律将如何不再成立。一种持续的指令性尝试是一种政治上过分要求的体现。所以，《大纲》中对货币的抨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视角，我们将从对货币的批判转入到对权力的批判。

第三讲 对抗性趋势的方法

解读《导言》(笔记本 M)的设想

唯物主义的方法和生产的观念。

一般生产观念的方法和辩证法。

辩证法和唯物论方法中生产的综合—分离和凝结的特殊形式。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三个首要环节：(a)一定的抽象；

(b)趋势；(c)实践准则。

方法论研究发展中自我批判的停滞及其问题。

深化方法论的一些补充部分：1. 价值的梗概；2. 巴师夏和凯里。

然而，这仍没法说明处于“趋势”和“预测”之间的方法。

方法综合的第四个环节：(d)替换和建构。

结论的批判性和开放性。

笔记本 M 写于 1857 年 8 月 23 日和 9 月中旬之间。如上文所言，它最初由考茨基出版，后出于哲学原因，并为了纠正考茨基的版本，它和《大纲》放在一起再版于莫斯科。对于我而言，把《导言》和《大纲》放在一起没有什么不恰当，这不单单因为哲学方面的原因，更是因为它们的核心观点上的关联。将《导言》和《大纲》放在一起阅读可以使更好地相互理解这两个文本。无论这两个文本经过了怎样的修改，两者之间都存在着连续性，这已经通过再现两个文本之间的同质性而得到证明。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连续性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暂时性连续，而是它触及到了主题的最本质之处。也有人否认全部关于《导言》和《大纲》的真实连续性。比如维戈茨基就坚持《资本论》的辩证法，而完全低估《导言》方法论的重要性：根据他的思路，《导言》仅仅是马克思学习和 40 年代到 50 年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

一个摘要；它没有打上辩证唯物主义（这导向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印记，而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决定了独创性，决定了对其他笔记本的真实超越。至于法国和意大利的一些学院派，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过度地阐释了《导言》中的方法论。他们并没有直接面对《导言》和《大纲》之间的关系，这给我带来了冲击。实际上，由于《大纲》的“妄想”，这些学院派学者更愿意回避这一问题，并将《导言》和《资本论》直接联系在一起。然后他们做出结论：1857年的方法论就是《资本论》中的唯物主义方法论，所以《导言》一定从属于后者。他们都有根据唯物主义方法论去理解1857年的方法论的局限性。这两个观点没有一个令我满意。毫无疑问，笔记本M是由政治的内在辩证张力而引发的，而这种张力贯穿于其他笔记本。固然《导言》中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是，相对于维戈茨基的其他论文，我认为《导言》已经完全包含着理论上的飞跃，这恰恰是《大纲》所主导的；同时，这两个文本源于同一个创造性进程，而且，两者可以相互参看；对于意大利和法国的那些学院的观点，我认为，应该否定他们，而且存在于《导言》和《资本论》中的关系是对那些持《大纲》和《资本论》之间完全断裂的态度的否定。所以，我计划转向目前我们应该如何阅读文本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将努力证明扩充我的假设是有充分理由的。不过，因为第二讲已经涉及了核心问题，我仅在第三讲坚持做这种解读的有效性。在本讲，我将继续推动一个文本的解读走向另一个文本的解读，而且也将贯穿从今以后的分析。

“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①但什么是生产的概念？再没有比这个问题更加经典的哲学问题了：数百年间哲学家们在唯名论和实在论之间的争论。但是，名称往往会支配实在：问题在于，名称所指称的对象并不神秘。对于名称和实在的研究中，比如有些哲学家，似乎陷入了“仅仅美学的类似，大和小”的困难中：实际上，他们仅仅通过引入假设而使生产变得神秘，通过“发明”生产作为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2页。

产阶级社会未来进程中的政治公式。如何使名称和实在正确地统一？避免神秘主义并不意味着避免政治预测，但是必须将政治预测和现实联系起来。现实就是政治的；但是因为是政治的，因而始终是正确的。因此真实必须作为一个目标为政治服务：只有一个真实性和真正的政治。18世纪的“哲学家们”将真实神秘化，这是因为他们以个人主义抹平生产的观念，从而使他们自己沦为资产阶级社会政治规划的回音，然而这是错误的。我们只有把作为其基础的18世纪的普遍化概念抛诸脑后才能开始讨论生产的观念。但是一旦这样做了，一旦这种普遍的冲动完成了，也就是对人的生产活动的共性的界定完成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名和实之间仍是咫尺天涯，而且，这仍然是制造一个关于生产的普遍性定义。当然，“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但是这个“生产在历史阶段的特定特征”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帮助。如果“生产是一个抽象概念”，这又另当别论。

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对生产一般使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6页。

这篇《导言》包含了几乎所有的东西：普遍抽象概念的建构，在本质上只是特殊规定性，即使对于所有概念的论证都建立在唯物主义之上，这只不过试图使概念具有普遍永久性而已（和以前一样，反对经济学家，反对哲学家和他们简单的空论）。

根据这个观点，我们仍然不能说这样就能界定概念。任何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作家（甚至是在 18 世纪）可能都已经说过同样的东西。所以，深入追求事物是必须的。那么能否用辩证法的方式去追求事物本身？但是为了使辩证法存在，必须要有一个主语。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需要加以彻底思考的。

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生产是总体。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留待别处（后面）再说。最后，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的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①

这里浮现了“总体”这个概念，总体是作为关系的差异的集合。这里有必要在总体—主体性的关系中插入一个括号（但是我们仅可以说明当下的情况）。太多的作家用总体这个概念来清理，他们通过这个概念降低唯心主义的成分。相反地，总体性在这里很明显是一个承载对象的结构。在马克思方法论的视野中，总体性的观念从来都不强烈。总体性的观点会被抽象的规定性所扩展，并由抽象的规定性来组成，以至于在抽象的规定性中终结自身。马克思方法论的视野从未有抽象的总体性；更不用说总体性是被现实的、革命的唯物主义赋予规定性的。这篇导言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规定。当然，主体性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27 页。

予物质结构的辩证法以极其重要的能动性。马克思给出的例子(一个老的、但却是绝对适当的例子),是贫困的立刻降低和相对于社会结构而言的普遍社会组织的司法形式。总而言之,唯物主义使辩证法从属于它自身,用它来赋予结构的总体性以主体性。但是这还不够:辩证法在定义革命的途径上和朴素唯物主义一样无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已经给我们指出了能动地连接总体性和异质性的结构。但是这仍然不够。只要这种结构和总体性不是内在分离的,只要我们还没有成功把握住以辩证法的生成结构(辩证法与结构之间存在着张力)的主体性,而非结构性的(资本主义的)主体性,这就仍然是不够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①但是如果这些要素构成三段论,这就有必要定义具体、特殊以及在三段论中各个要素的不同之处。生产范畴,在本质上区别于它的名词,以及刻画真实社会结合的这种总体性仅仅可以用来构造一个不同的范畴,作为条目、区别和对抗的总体性。这条道路是我们应该前进的。为了接受这种总体性,而不再坚持对抗性,这种对抗是“没有把这些要素放在其统一中来考察。好像这种割裂不是从现实到教科书中去的,而相反地是从教科书到现实中去的,好像这里的问题是要对概念作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②

在有关范畴如何产生的(在这个特殊例子中这个范畴就是生产)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唯物主义(相对于18世纪的唯心主义)和辩证法(相对于政治经济学)所坚持并以其为基础的在规定关键要素(相对于修正主义者和法理学家)时的主体性。这个基础是可靠的,但却是不足的。因此,让我们通过理解生产—消费的关系来深入并且扩展生产的差异性,这种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这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0页。

② 同上书，31页。

关系在形式上是循环的：“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①，“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中介的方式来消费的”^②；“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③。但是这种关系的循环性必须被打破。“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④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并不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迅速地将概念的分类留给了社会主义文人和通俗的经济学家。马克思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辩证论者（我们已经看到他是怎样的一个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论者），但更加重要的是，他是一个革命者。这个关系必须包含在分裂的可能性之中；并没有任何一个范畴能被定义在分裂的可能性之外。“但是，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人的关系。”^⑤

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产上来谈，把地租放在分配上来谈，等等，这完全是幻觉。^⑥

生产要素：从任何角度来看我们都需要对其作重点分析。一般生产概念打破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界定主体性和对抗性关系问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3页。

② 同上书，33页。

③ 同上书，33页。

④ 同上书，35页。

⑤ 同上书，35页。

⑥ 同上书，36页。

上的局限性。这种对抗性关系涵盖了总体性概念。

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相反，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①

所以，“这种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产处于怎样的关系，这显然是属于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②，这也是下面这句话所包含的意思，“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③我们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对于生产和消费的关注指向我们是否考虑其他的联系(经济学家的三段论)：生产和循环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地，个体和特殊被分裂成差别性，这个差别性被对抗所承认。“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④

差异、不同、对抗。然而，我们还没有看到该如何阅读马克思的文本。生产范畴(如同价值范畴那样)在它的普遍性和复杂性之中存在着本质的分离的可能性。辩证的方法被加到唯物的方法上去，并不是为了得到对确定性的极权主义解决方法的关键，而是为了确证作为分离可能性的结构总体性。辩证法和唯物论的结合已经在《导言》中开始，这个开始是在特殊的分离形式之下进行的。在其他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7页。

② 同上书，38页。

③ 同上书，38页。

④ 同上书，40页。

物，我们一定不能低估将范畴选作方法的一个例子的重要性：生产的范畴。不管术语如何设防，一旦关系到生产和工厂时，我们有可能设想马克思并不站在任何一边吗？工人的那一边？我们可以从生产范畴中透视到分裂及其由这种分裂所爆发的危机吗？除非我们想指控马克思为蒲鲁东主义者！

由此，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也就是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这点上，马克思确立了几个基本的准则。第一个准则是“一定的抽象”。我们无法天真地以实在性和具体性作为开端来得到范畴，而只能通过对给定的直觉和表述的“过程性合成”的发展才能得到，这一有秩序的论断构成了这个准则。这些天真的方法论将具体作为前提；马克思的方法论则将具体作为结果。“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①通过这一方法，与其说我们将具体的表象蒸发进入一个抽象的规定，相反地，我们成功建构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发现”^②。所以，这是从抽象到具体，到规定性。认识过程并不盲目地停留在抽象的规定性上，恰恰相反，规定性是利用抽象的普遍性、两分法构成的接近理论的产物。事实是客观的。没有任何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会认为：“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③但是相反，没有任何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者会破坏对具体事物的盲目崇拜。唯物主义和辩证主义在理论上的结合在这里就显得至关重要。我们已经在实在之中，我们努力、试图、冒着穿过抽象的风险接近实在的具体性和单一规定性。在第一条方法论准则中，还有意志和智慧，也就是一个日常的人类实践活动。但是，这仍然无法令我信服：根据具体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来改造知识的需要仍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2页。

② 同上书，42页。

③ 同上书，43页。

存在。总而言之，这个一定的抽象的方法以一种笛卡儿式的方法将“我思”扔进了水中，这也帮助我们发现和创造实在。但是，我认为精神这个元素并没有有效地在历史解释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发挥效应：一定的抽象、并用抽象统摄具体的过程是一个普遍化的过程，这也就是普遍知识。“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的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那么，一定的抽象的进程是内在于无产阶级集体的光芒：因此，这也是一个批判的元素和斗争的形式。

一定的抽象是一个动态的真实。实际上，在简单和复杂之间，在被给定和建构之间，在现实基础和构想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对于认识论而言是合适的。马克思方法论的第二个组成元素是由对以下关系的说明组成的：趋势的方法。马克思认为交换价值是一个极其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范畴。让我们仔细分析以下论述：“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可见，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②这些是什么意思？这是说简单和复杂的关系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关系，所以活力是由历史主观地赋予生命，是由动态的总体性赋予生命的，动态总体性也是活力的标志。这也就是说，抽象存在着程度上的不同：一方面，抽象在具体中寻求实在（一定的抽象）；另一方面，具体在抽象中寻其决定性（趋势的过程）。这是一个由生产和阶级斗争所决定的历史运动：从本性到第二天性，立刻从本性建构的真实到具体的真实。“所以，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8页。

② 同上书，44页。

一般的抽象总只是生产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①

这是方法论上的共产主义；这个理论上的方法也可以被定义为共产主义：《大纲》将向我们展示这一方法论意义上对共产主义革命定义的接近是如何具体进行的。想要将《导言》从马克思学说的发展的本质中剥离的做法是多么空洞！

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②

又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③所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趋势性方法以决定性的方式成为贯穿于马克思的认识论的系统性方法，这是很清晰的。我们稍后再回到这一点。当下和在这个层面上更加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允许现实组织加入到历史进程中（在现实组织中，规定性不能被归结为一个简单的个体文本）。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思的方法论也是一个共同的探索。趋势并不仅仅是那些基于历史经验的范畴的消极总结；这首要的是那些允许我们以未来的视角来观照当下，这是为了使这些趋势阐明未来。冒险吧，斗争吧。科学应该如此坚持这样做。如果一个人偶然地成为了一只猿猴，这仅仅是为了更加灵巧。

抽象和规定之间的关系，实证抽象和被规定的抽象之间的关系
的伟大意义找到了一个科学证实的机遇：这是《导言》里的方法论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5页。

② 同上书，49页。

③ 同上书，47页。

第三个元素，这是“实际上真实”。为了定义方法的第三准则，马克思将一定的抽象的方法结合到趋势中，有关劳动的范畴成为了马克思所有研究的中心。好，“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①。然而——这就是一定的抽象在起作用——“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②。这种范畴的普遍性使得劳动范畴的现代性变得很明显，同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关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缠结在一起的东西，是一个历史主体努力的结果。劳动的观念从历史实在朝更高形式的复杂转移：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转移。通过这样的方式，慢慢地——这里又是趋势起作用——范畴扩宽了，“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为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③好，如果有人注意到，“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④。因而，“实际上真实”是范畴扩展的环节，在这个范畴中抽象找到了聚焦的核心，并且将它所联系的丰富性与历史真实相联系。没有趋势和抽象的这种结合，没有向实践真实和历史的血肉开放的这种移动，它将没有可能科学地进行下去。“实际上真实”是一种科学，这个科学变成了变化和变化得以可能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在这种混沌中得以形成，当概念的材料完全由这三个准则建构，形成的概念的机制才可以起作用。“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4页。

② 同上书，44~45页。

③ 同上书，45~46页。

④ 同上书，46页。

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①范畴在这个阶段被显示为“产品和效果”，更确切地说是真正的解释和科学的界限。我们把“劳动”概念的阐述看作是生产的概念，“当作社会必要时间”。这个概念是由历史产生这一论述是很明显的，但是这定义了概念得以发展的界限和后来所有发展的范畴。我们将会劳动概念上看得更远，一旦这种对必然性的阐释以确定性的方式找到了它的轮廓，一旦趋势的必然性向所有辩证的结合显示出它的运动发生作用，最后，当它显现为“实际上的真实”时，在斗争的核心，我们将看到主体性的概念如何再一次被替代，也将看到这种替代将如何决定更远的连续性。这一系列的方法论文章并没有涉及劳动范畴（即使它有时呈现为个别有用的例子）：它涉及所有马克思对范畴的分析。因而，在文本以下这页中，对材料的第一种分篇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这种分篇是和方法派生相关联的。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农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6页。

^② 同上书，50页。

因而，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方法和历史方法上相结合的特异性是：这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然后，考虑到这种规定性形成的历史以及发展趋势，又再次从抽象到具体，到越来越复杂的过程。因而，“世界市场和危机”达到了决定性的顶点，在这个顶点上作为全部整体的基本对抗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被社会主义化了。“实际上真实”的准则、实践关系的动力论的准则以及这个运动的历史主体性的准则在这里都成为权威性的和有差别的元素。“实际上真实”的准则重建了唯物主义和辩证主义的方法论，包括了我们已经强调的关于“差异”概念的所有主观的、开放的和本质的部分。

如果我们现在考虑在《导言》中被认为达到上述顶点的全部的方法，我们应该强调那个被认为有极大重要性的观点。为了使用其他元素，研究方式(Forschung)、叙述方式(Darstellung)和再现方式(neue Darstellung)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被完美地界定，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实的运动”(die wirkliche Bewegung)实际上成为了科学的主题。然而，仍缺乏一些东西。将客体视为科学精神之外的唯物主义的方法被趋势所强调的远景赋予了生命力，也被“实际上真实”的准则所主体化。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承认从实在到理想主义改组的不可还原性；实在、准则和结合的动力仅仅被“差异”、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所确信，差不多后者可以被赋予活力和被主体化。相反地，在《导言》中，运动被对抗和范畴建构中的直接重要性所确证：差异被转化成对抗，方法的框架在很多方面是被打散的和极度松散的。所以，《导言》和《大纲》成熟的思想没有联系吗？可能并不是这样；然而，它为作为所有范畴基础的准则的对抗性原则预备了一切条件。另外，《导言》和与之并列的文本提及到了这个最后的远景，并且经常公开地谈论它。我们应该考察一下这个远景是如何出场的。我们不要做任何期望。在《导言》的结论中，马克思自己也似乎对这

种困难有所警惕。“希腊艺术和现代社会”这两篇文章^①有一个断裂，同时也和其他前面的笔记相联系。他们给出了一个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并且在不同层次上强调解答的困难性。因而，带着这个在《导言》中为解答问题而作的断裂，马克思似乎感觉到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局限性，感觉到在这里（在《大纲》中），所讨论的观点会引导他对《导言》的假设给出一个创造性的解释，以便通过这种一般的方式，到达方法论中的最高阶段。

但是，为了让马克思的方法论成功地表现为结论的形式，某些元素的成熟以及一些条件的发展是很必要的。好，在笔记本Ⅶ的结尾处，我们以“价值部分”作为开始，这部分对于我们而言似乎十分重要（暂且不理睬这部分应该放在何处的哲学争论）。我们把它考虑进来是恰当的，因为价值这一主题对方法论的结合以及对基本范畴有着直接的影响，对基本范畴的描述也有直接的影响，而这恰恰是我们的问题之所在。马克思为了结合“价值”范畴，于是将方法论应用到实践中：他在定义价值时坚持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辩证法。与价值相区分的是使用价值。但是“使用价值—被现代生产关系修改就降低到政治经济学中”，所以，它会降低过程的同一性。重复马克思逻辑的一般进程和考察形式、强度和差异的效力一样，是十分有趣的。这种将差别视为对抗性的做法是正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坚持：“实际上，无论如何，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一个给定的预设——建构在一个精确的经济学关系上的物质基础会自我显示。”所以，马克思坚决主张，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虽然在商品中直接结合在一起，同样它们又是直接分开的。交换价值不仅表现为不是由使用价值决定，而且正好相反，商品只有当它的所有者不把它当做使用价值来对待时，才成为商品，才实现为交换价值。只有通过商品的转让，通过商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52~53页。

同别的商品相交换，商品的所有者才能占有各使用价值。通过转让而进行占有，这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制度的基本形式，这种社会生产制度的最简单、最抽象的表现就是交换价值。^①

客观前提——独立的预设：这篇文章中差异变成了对抗。

这并非进入马克思思想中关于使用价值的讨论的入口(然而这是一个我们将会逐渐深入的话题。当下，我建议回顾一下罗斯多罗斯基的文章，pp. 112-140，以及赫勒和她布达佩斯同事的著作)。我们目前都在谈论方法论，我们感兴趣的是形式上的机械论、差异性是如何以及通过什么转变成对抗性的。好，这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只有将客观前提转变为独立假设，或者说给它以活力特征的资本主义方面，才会不断回到它并且定义它。使用价值只是作为一个“独立假设”而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范畴，即当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辩证自我运时，并且不断重新开启运动时，才无限地暴露出价值。当使用价值通过异化，通过不断变化的异化阶段——但这并不缺乏真实性——夺回它预设的独立性时，它就变成了“实际上真实”的。

在这一思考方向的框架内，我们同样来考察这个题为“巴师夏和凯里”的文本。这个文本是笔记本Ⅲ的开头，写于1857年7月，即在《导言》之前，但却是在构成《导言》和《大纲》的论证框架内写作的。它包含一个对巴师夏《经济和谐》(第二版，巴黎，1851)的评论：这是马克思一个很典型的评论，即揭露某些经济学家精心准备一个借口，而这些经济学家，我们已经在货币章的笔记中找到了一部分。通过近距离直面法国(巴师夏)和美国(凯里)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情境，马克思在这里阐述某些批判的原则——这正是我乐意强调的形式和方法论特征。马克思想要解答的第一条原则涉及一个资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293~294页。

阶级社会(比如美国)的趋势,关涉独立发展的自行发展,而不考虑前面一百年的变迁。然后,在这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对立仅仅表现为隐约不明的因素”^①,而且,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即时综合:资本马上成为社会资本。马克思认为他能释放的第二个准则是在资本集中和国家集权之间建立一种平行关系。这是指,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化和集中——无论是一个像美国那样开放的社会,还是像欧洲大陆那样封闭的社会——决定了不断扩张和国家力量集中的必要性。这个进程是直接由生产和因资本集中导致的流通所直接引发的。结果是“国家成了‘经济和谐’的最后避难所,而它最初被斥之为这些和谐唯一的破坏者”^②。第三条准则被描述为,由于世界市场和国家之间的不断深化的矛盾所导致的对抗,(外在地或直接地)变成了资本的集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关系“一旦它们以其最发展的形式,以其世界市场的形式出现,就变成了不和谐……这些世界市场不和谐”。马克思总结道,“这种世界市场的不和谐只是那种作为抽象关系在经济范畴中被确定下来,或者在最小的规模上取得某种局部存在的不和谐的最后的、恰如其分的表现”^③。

为了考察马克思的方法论,坚持这点就足够了。马克思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是成熟的,他将具有能动作用的对抗性视为整个体系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中,对抗是社会体系发展的动力,这个基础意味着对抗在资本的历史进程中的不断重复出现。所有客观唯物主义也都消逝了:这种关系对于构建对抗的界限而言是开放的。我们应该能够合理地反对,尽管这种矛盾的发展——和对抗的深入——仍然停留在资本的水平,停留在资本和发展范畴的水平;而且我们也应该能够合理反对,尽管这种矛盾被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低估了。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页。

② 同上书,8页。

③ 同上书,9页。

是马克思的评论还涉及巴师夏的工资理论。在这里，我们应该对该章和“论工资”的内容有一个认识。相对于巴师夏的愚蠢，马克思坚持将工资（雇佣劳动，工人阶级）看作一个立刻革命的动力，看作所有发展可能性的动力。“在所有这些现实的历史过渡中，雇佣劳动表现为一些关系的解体、消灭，在这些关系中，劳动从它的收入、它的内容、它的场所和它的规模等等所有方面来说都是固定的。所以，雇佣劳动表现为劳动和它的报酬的固定性的否定。”^①这种基于主体性的否定（主体性在此表现为消融、破坏、流动性和独立性）给予资本范畴的对抗一个新的基础意义，将其引入了一条新路，将其引入到《导言》中所准确意识到的剩余价值这个概念的张力和矛盾。即使这个方法尚不能有助于价值理论的最后形成，然而这些要素通过这种方法从而整合在一起却是非常必要的。

马克思在《大纲》中对方法论的呈现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是线性地从《导言》到《大纲》，而且也不局限于《大纲》。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到那些我们已经在第二讲中读过的章节——《货币章》，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克思之前的学者在方法论上的混乱和滞后。这在以下的这些篇章中尤其明显（请看《货币章》从B到D组成的文本），趋向定义对抗的努力正处于这一极点上。这些文本实际上是如何展开的？实际情况是这样：范畴之间对抗的加剧使得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危机之间的关联得以呈现，而且这种关联会成为迈向共产主义的根基。好，这种关联并没有跨过批判的范围，在批判的范围内，这种进程具有主体性。如我们所言，对抗性是十分强的：但是我们仍然将它看作构想的结果，而不是新发明的特征，抑或作为自由革命的特征。在共产主义的论述中，趋势是与“构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趋势与“构想”之间的紧密联系仅仅标志着我们的分析还不够深入的话，我们就无须坚持趋势与“构想”之间的紧密联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5页。

但是由于马克思的方法论，我们发现在《大纲》中，这种趋势与“构想”之间的紧密联系总是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出现，尤其是当具有基础性地位的对抗性同历史趋势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时，这种趋势与“构想”之间的紧密联系仍会出现。不过，即使这样，我们似乎也不能满足于此。如果所谓的“构想”只是机械地跟随着这种趋势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就有沦为空想的风险。但是，相反地，强调我们可以用“实际上真实”和主体性来印证历史趋势则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允许文字游戏，那我们可以说《大纲》中的趋势是被提升了。随着我们的不断深入，趋势是作为实践的实现，作为主体性的批判，而不再是一种设想。再一次，补充下面这一点是必要的：对剩余价值理论进行详细阐述将恢复马克思方法论的最大张力；而且这也是必要的：共产主义不可能仅仅是对资本不和谐的修正。

第四讲 剩余价值和剥削

我们正在着手研究剩余价值：这是我们阅读《第二笔记》和《第三笔记》的计划。

□从货币到剩余价值；政治学的方法。作为对资本论的分析和计划的基础的趋势（涉及一个可能的矛盾：生产力的概念）。

□逻辑的方法：货币—资本—货币'，从货币到资本的发展。

□资本和劳动的自动化的唯物主义定义。劳动作为价值的源泉：主体性与抽象性。关于工资的可能的篇章：使用价值，必要劳动和“工人总体”。资本家侵占的矛盾特征。

□作为剥削理论的剩余理论。剩余价值的量化：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资本家总体”和价值稳定过程。

□剩余价值理论的概念和清晰度的定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新问题。剩余价值和利润：趋向一种对危机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关的内容。

在《第二笔记》和《第三笔记》中（我们特别参考了《大纲》中第 251 到 305 页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发展成形。因此我们应该重新拾起在第二课结尾被搁置的讨论，这就是作为雇佣劳动和资本的一般形式的货币。货币的一般支配是在流通中进行的，一方面，货币表现为支配的总体，表现为在生产之中以及凌驾于生产之上的力量；另一方面，货币表现为普遍性和无差别性，在一个适当的意义上表现为价值（或者叫做交换价值，这是货币的绰号或别称）。在价值和货币两个层面之间发展出了一种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将此过程中的质

变归因为量变。货币将自身力量扩展到超越了这种关系并且将这种关系强加到其自身运行的规则之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货币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一般形式。但在此有必要更进一步。《第三笔记，资本》：《大纲》的意大利编辑给出了这一标题。实际上马克思只给出了“作为资本的货币”这一标题：这对他来说不是飞跃，而是前进了一步。罗斯多罗斯基认为，标题的变动具有引起疑惑的危险，因为这样的变动将强调范畴(货币和资本)之间的差异和它们的静态层面，而不是像马克思希望的那样强调问题的动态元素(作为资本的货币)。货币实际上代表着资本的流动性及其指令的自由，并且以一种实际的方式(也就是说，或者是作为实体，或者是作为代理)指向资本变化的整个过程。因此，人们必须承认在没有将货币和资本拜物化的情况下走向剩余价值理论是一种前进。在这一文本中货币的向心性基础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我将仔细地阅读第一部分，并且我将尝试着在这里用政治性路径分析货币，并指出这种分析路径所具有的核心作用。在此之后我将要把我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分五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二，我会将这种政治性路径上升为一种理论化了的方法，并以此方法来对待文本。第三，我将要尝试着定义工人总体的概念。第四，我将要尝试着定义资本家总体的概念，只有在第五部分里，被这些定义的一致性武装起来之后，作为剥削理论和总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心的理论定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才能获得更为完整的清晰度。我一方面将要引申出一系列保持开放的理论问题(从剩余价值理论到利润理论和危机理论)，另一方面将要引申出一系列我们必须在这个文本的阅读中加以审视的政治学问题(社会主义的问题和共产主义的问题)，并以这些问题作为以上分析的总结。在这里只需补充指出一点：在计划的这一阶段的过程中，就像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定义的那样，我们看到马克思的方法论的元素发展得更为完整和广泛。从而这种呈现新的产物的机制将变得具有生产效能。因此，我们应该对其加以注意并强调这一方法论的生产性的物化。

我们不能像罗斯多罗斯基那样，认为我们以上提到的马克思

提出“货币作为资本”的问题只是对之前关于“简单贸易经济的侵占规律”的篇章的简单延伸。从主题的角度来看，它必定与关于“货币作为货币”（见第二章）的系统化的揭发的恢复相关：实际上，我们在此见证了一个使即将集中所有理论注意的分析领域浮上水面的操作。它的主题是什么？是作为普遍形式的货币及其隐藏了自身实在性的意识形态。这就是，对立地既被支配又起控制作用的货币，或者说作为政治的实在性以及作为剥削指令的货币。因此，分析的领域是政治学。我们只能从剥削构造了政治社会，也就是说剥削组成了社会的基石这一事实开始来发现剩余价值理论。通过直面货币作为资本这一主题，由此通过开始对生产过程的分析，马克思对作为物质的货币做出了指令。这是一种攻击和颠倒我们通常看待马克思思想发展方式的解释模式——依据我们的传统，政治学和指令被置于对生产过程的分析的末尾，或者，依据最近的模式，政治学甚至被视为与“经济的”马克思的利益相异的东西。恰恰相反！在这里，在所有政治的一般运行过程中的强制性规定恰恰是基础性的。难道有人会对感到奇怪吗？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所有在《大纲》的原文中关于动因和煽动及其方法论基础的内容都是为了使政治因素成为分析的核心。还不止如此：揭露逐渐被越来越多地集中到政治的特性上。与其说反对“社会主义者”的论战玩笑证实了这一点，不如说对危机和进行中的财务重组的分析以及对“剥削—国家—世界市场”的清晰度的分析不断地强调了这一点。方向是从一般剥削，从指令到剩余价值：这是一个经典的批判逻辑。我们从有关货币的篇章中见证了其结果被利用了的一个逻辑的、倾向性的位移，这一位移因此引出了剩余价值的主题和对在由“指令—国家—世界市场”作为中介被简化成两个阶级的关系的领域的生产的批判。正如我们将反复看到的那样，如果世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霸权的实现，那么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对阶级关系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追求的目标）：从这一事实中孕育出来的政治学。因此，从货币到剩余价值——这就是提供阶级武器的政治学途径。

有必要注意到把货币作为开端并且把货币作为对剥削的分析的核心思想，这种思想以不同的方式应用于工人的斗争。在这里，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那样，货币被当成资产阶级霸权的形式，被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希法亭到列宁）看做是强制性的命令而闻名。每次当资本要重构其对危机的指令以及对工人的使用价值的叛乱的指令的时候，我们都发现了金钱居于资产阶级统治中心的这一地位。货币的这种在指令中的永久性张力与处于世界市场水平上的工人的叛乱并肩而行，构成了一种重组支配形式的尝试。因为货币不只是使资本变质的形式之一，也是指令及其发展的一般形式，是价值行使其主权的连续性的杰出形式以及指令的连续性的一般形式。马克思正是在此基础上孕育出了剩余价值的理论：从支配的一般形式到其生产特性——指令的特征是一般的、社会的和全球的支配形式，指令的生产特性证实了对抗的地位。十分清楚的是，如果向外的行程是如此广泛，那么往回的行程将会更加广泛和深远：从解开对抗的剩余价值的面纱到指令视界的破坏，再到媒介和政治学。

在之后的一些章节^①关于剩余价值的开始部分中，马克思再次致力于研究资本的计划，这是一个继导言^②和关于货币章的笔记^③之后的一个新的计划。计划如下：

I. (1)资本的一般概念。(2)资本的特殊性：流动资本，固定资本(作为生活必需品、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的资本)。(3)作为货币的资本。

II. (1)资本的量。积累。(2)资本自我衡量。利润。利息。资本的价值：比如资本作为与自身不同的利息和利润。(3)资本的流通。(a)资本的交换和资本。产生利润的资本交换。资本和价格。(b)资本的竞争。(c)资本的集中。

III. 作为信贷的资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20~221页。

② 同上书，3~11页。

③ 同上书，192页。

IV. 作为股份资本的资本。

V. 作为货币市场的资本。

VI. 作为财富源泉的资本。

资本家。在资本之后，将会讨论到地租。在地租之后，将会讨论到雇佣劳动。这三项预先假定了价格的变动，就像流通在自身内在总体中所定义的那样。另一方面，生产在其三个基本形式上预设了这三类并且对流通进行了预设。然后是国家（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国家对外：殖民地。对外贸易。汇率。货币作为国际铸币。——最后，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个人劳动实际成为社会劳动以及相反的情况）。^①

为什么这一计划如此重要？因为（正如在导言中一样）从生产到国家再到世界市场的趋势，不仅以一种优先的、形式上的方式（此处有别于导言），而且以一种实际的方式（就像第 279 页已经指出的那样：“世界市场是一切的预设以及对一切证明”）再一次作为分析的条件。因此，这一新计划将我们置于唯一能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领域的核心：通过货币，我们将这一领域定义为指令的领域。国家是对生产矛盾进行综合的第一等级；世界市场是矛盾的综合的第二等级，但它也是危机和退化的领域。所有的分析都必须考虑到这种趋势，并且持续地跟着这一趋势的节奏进行位移。如果基础性的对抗在其纯形式上（两大阶级间的对抗）以及在其社会形式上（从生产到流通的社会化和对抗的扩散）发生在世界市场的水平之中，那么作为“生产和流通形式的前提”的三类将被置于作为过渡的发展机制之中。还有，“价格的变动”是在全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出来的价值的基础上，也就是在聚集起来的剩余价值及其包含的指令的基础上构思出来的：货币再一次使得对抗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想要在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221 页。

势的这一发展阶段上定义对抗；所有的剩余价值理论都达到了货币理论和指令理论所具有的水平。对抗的定义都达到了激进的水平。其后果包括最初的计划、工作过程以及对马克思的再次确认，这种确认不仅存在于每个特定篇章的分析的相关性之中，而且存在于其最初和最后的首尾一贯之中，因此结果也应当被作为预设。这一结果（在世界市场水平上的危机和退化）应当被作为预设（在生产关系水平上的对抗和斗争）。货币是联结整个资本主义指令弧的黑线；剩余价值理论是代表工人的立场并与之相对立的一条红线。

“因此，能够成为资本的对立面的唯一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而且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即生产劳动。）”^①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概念的一系列篇章包括一系列理论的和论战的观点，这些我们在关于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的篇章里还会再次遇到。当我们想要坚持阐明剩余价值理论发展的规模、领域和视界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把这一页拿出来讨论呢？因为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分析看上去与我们的解释和划分相矛盾：这个矛盾还是现在讨论比较好。马克思在这里指出（在《大纲》的笔记中甚至更多，第305～306页；第212页）“只有生产性的劳动创造资本”，“生产性的劳动是资本的直接自变量”。因此，把生产性的劳动只看成包含流通或积累的交换是愚蠢的。

亚当·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见解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其他的经济学家对这个见解提出的反驳，要么纯属胡说八道（如施托尔希，更卑鄙的是西尼耳，等等），他们硬说，任何行动总会产生某种结果，这样他们就把自然意义上的产品同经济意义上的产品混为一谈了；照这样说，小偷也是生产劳动者了，因为他间接地生产出刑事法典；（至少这种推论和下面的说法是同样正确的：法官也可以叫作生产劳动者，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30页。

为他防止偷盗)。要么就是现代经济学家向资产者大献殷勤，他们要资产者确信，谁要是替他去捉头上的虱子或者抚摸他的下身，那都是生产劳动，因为例如后一动作会使他的笨脑袋瓜第二天跟在账房里工作起来愉快些。^①

但是马克思关于作为直接与资本相关联的劳动的生产劳动这一极为神圣的强调，如果它有人们可以否认的产生歧义后果的直接的政治学功能：剩余价值的观念看起来完全与生产的内在水平密切相关，并且整个理论看起来都紧紧围绕价值的迷雾，围绕着价值的关系，这一点从19世纪末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批判已经具有了科学论战的目标并且他们试图在政治上摧毁他以来就是如此。我们已经指出价值的功能只有在一般的水平，即货币的一般水平上才能存在这一事实：这一点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趋势的发展进程中（在其他方面的趋势今天才被广泛认识到）。我们只能依据我们最初在《大纲》的这些篇章里找到的并且在其他著作中从文字上被简化了的定义来推测生产劳动的定义。我们在文字形式上拒绝它，因为客观主义者、原子论者和拜物教的信奉者将价值理论判定为无效：他们认为只有想把马克思变成一个18世纪旧唯物主义者的人才会将价值理论归功于他。马克思关于价值定义的文字形式上的唯一功绩是提出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的工人的立场、工人阶级力量在政治上的不可妥协的特性以及无产阶级革命。

好吧，但是让我们先暂时离开这里，看看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解释的一般框架内来理解允许我们前进并且将生产劳动的定义带到抽象的、对抗的、看起来对于建构剩余价值理论是必不可少的特定的术语当中去。我可以马上说我并不认为解放马克思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从引领他的历史条件来看，为了赞扬工人的劳动，他以一种可悲的方式限制了生产劳动的概念。结果是，我们总是看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31页。

这些篇章，牢牢地记着这些我们打开了圆括弧的篇章，在这些篇章里，生产劳动在另一个层面上被解释为：工人的“使用价值”，交换的契约当事人的工作，这些人就是“与他人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劳动只有在生产出其对立面的情况下才是生产劳动”：但是，人们也是这么说剩余价值概念的！关于使用价值的作为内容的即不同于它们的形式的那种经济规定，只有在寻找到这一内容的对立面时，才能谈到。在抽象劳动的水平上，再次拾起这个概念是有必要的：“其实，这个‘生产的’工人对他所必须制造的没用的东西的关心程度，完全同雇用他的资本家本人一样，资本家对这种废物也是毫不关心的。”^①生产中的资本的发展的方向、生产流通和资本社会化的水平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建构的水平。以这种方式来看，以剩余价值理论和生产劳动为核心概念的理论领域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要分析的重点。

现在到了我们对马克思的功绩进行评判的时候了：“第一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作为资本的货币是超出了作为货币的货币的简单规定的一种货币规定。”^②但是在简单流通中货币的测定从未超越过：“在纯粹流通中进行的交换价值的简单运动，决不能实现资本。”^③

从货币或商品这两个点上开始的过程的反复进行，并不是交换本身的条件造成的。这一行为只能反复到交换完成时为止，也就是交换价值总额完成交换时为止。它不能由它自己重新发动起来。因此，流通本身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理。流通的要素先于流通而存在，而不是由流通本身创造出来的。商品必须不断地从外面重新投入流通，就像燃料被投入火中一样。否则，流通就会无所作为而消失。^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31~232页。

② 同上书，206页。

③ 同上书，209页。

④ 同上书，210页。

“因而流通的直接存在是纯粹的假象。流通是在流通背后进行的一种过程的表面现象。”^①隐藏在流通背后的过程是生产。

流通的前提是商品(不管是特殊形式的商品,还是货币这种一般形式的商品),而商品是一定劳动时间的体现,它作为这种体现是价值;因而流通的前提既是通过劳动进行的商品的生产,又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生产。这是流通的出发点,流通通过本身的运动返回到创造交换价值的生产,返回到它的结果。这样,我们又到达出发点,到达设定即创造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这一次是这样的生产:它的前提是作为发展了的要素的流通,并且表现为引起流通又不断地从流通返回到自身以便重新引起流通的不断的过程。^②

通过劳动的过程,从等价物的交换到达价值稳定过程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从劳动到资本,也就意味着货币—资本—货币¹。但是价值稳定过程所包含的东西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看到它们在流通领域大量地涌现。但是货币并没有给我们作出解释。当然,货币已经成为超越了自身基础的繁殖的行动者。但是这一点并没有说明什么。我们不能以类比的方式推论出劳动是这种繁殖的基础:“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而是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是不可能的,正像不可能从不同的人种直接过渡到银行家,或者从自然直接过渡到蒸汽机一样。”^③总的来说,逻辑的方法向我们展示了向概念的定义更进一步的必要性。

我们有能力而且也应当将资本看作对象化的劳动。但是这就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10~211页。

② 同上书,211页。

③ 同上书,215页。

限制我们对价值稳定过程(valorization)^①的理解吗？价值理论可以定义价值稳定过程的机制吗？不，无论如何不可以。当人们踏上这片领域，就会发现“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过程，资本在这个过程的各种不同的要素上始终是资本。”^②因此，这既不是线性逻辑也不是简单的假设的概念延伸。但如果不是简单的流通，那么这种关系到底是什么呢？不仅在结果上大量地繁殖自身而且在生产中平等地遗传自身的资本的关系是什么？价值稳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模糊地意味着以生产的方式形成价值流通的交换行为的领域吗？我们现在大概可以再次提出劳动的问题，并且开始将其看作是为流通做准备的生产的价值基础。但是只有在使劳动服从于交换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

换一种说法就是：交换价值按其内容来说，本来是劳动或劳动时间的对象化的一定量；它作为这样的东西，通过流通在自己的客体化进程中达到了作为货币的存在，作为可以捉摸的货币的存在。现在交换价值本身必须重新设定流通的这样一个出发点，这个出发点曾处于流通之外，是流通的前提，从而流通本身对它来说曾表现为一种从外部抓住它并在流通内部使它发生变形的运动，也就是说，现在交换价值本身必须重新设定劳动；但交换价值现在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等价物或劳动的简单的对象化，而是对象化了的并且独立化了的这样的交换价值：它只是为了更新自己并从自己出发重新开始流通，才把自己提供给劳动，变成劳动的材料。因此，这也不再像自爱流通中那样是单纯的相等即保持交换价值的同一性，而是自行倍增。交换价值只有增殖，即增大其价值的时候才能使自己成为交换价值。货币(作为从流通中复归于自身的东西)作为资本丢掉了自

① 所谓价值稳定过程(valorization)，是奈格里从马克思的《大纲》中提取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即指资本通过确定价值的机制，从而在劳动过程中抽取剩余价值的过程。——译者注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14页。

己的僵硬性，从一个可以捉摸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劳动也改变了它对自己的对象性的关系：劳动也复归于自身了。但这是这样一种复归：对象化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把活劳动变成再生产自己的手段，而起初交换价值只不过表现为劳动的产品。^①

只要劳动承担了交换的形式和货币的形式，就可以因此转化为资本。但是这意味着关系是对抗之一，意味着劳动和资本只有在组成它们的生产的综合，也就是自发的、独立的实体的交换的时候才得以显现。正是这个对抗破坏了简单流通的现象：这就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的特殊区别的对抗。因此，有必要深化这一对抗的性质，因为只有这一分析才能发展出蕴含在资本中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定义。

因此，“第一个前提是：一方是资本，另一方是劳动，两者作为独立的形态互相对立；因而两者也是作为异己的东西互相对立。与资本对立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与劳动对立的资本是他人的资本。对立的两极的特点不同。”^②这一对抗包含着什么？它蕴含着资本必须降低到交换价值，对工人来说也就是使用价值这一事实。但是：

而工人要向资本提供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工人要向他人提供的使用价值，并不是物化在产品中的，它根本不存在于工人之外，因此不是现实地存在，而只是在可能性上，作为工人的能力存在。这种使用价值只有在资本的要求下，推动下，才能变成现实，因为没有对象的活动什么也不是，或者最多是一种思想活动，在这里我们不谈它。只要这种使用价值受到资本的推动，它就会变成工人的一定的生产活动；这是工人的用于一定目的的、因而是在一定的形式下表现出来的生命力本身。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交换价值和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19～220页。

② 同上书，223页。

用价值彼此发生这样的关系：一方（资本）首先作为交换价值同另一方相对立，而另一方（劳动）首先作为使用价值同资本相对立。^①

这一对立采取了两种形式：首先，是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相对立。但是，因为工人唯一的使用价值就是抽象的、无差别的劳动能力，这一对立也是对象化劳动和主体性劳动的对立。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作为资本的劳动和具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之间的分离是理性的：这就规定了资本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也就是与作为规定和命令的劳动、所有权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很有必要关注这一点，只要人们认为造成资本主义文明的结果的惯常解释是非理性的。不是这样，只有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是非理性的，合理地区别开来的因素被强制结合在一起是非理性的而且是不人道的，结果才是非理性的。资本只把价值看作“抽象的混沌世界”并加以反对，资本允许使用价值在其自身内加以实现的唯一形式就是非理性，“错乱的东西是经济学上的一个要素，并且决定着各民族的实际生活”^②。

下一个深化这一分析的观点是雇佣劳动的性质，是它的自治。这一次，让我们稍微检查一下当经济学家们试图定义资本的自我保存和繁殖的时候所面临的“该死的区别”。从这一问题被置于实质的鉴定而不仅仅是作为偶然的方式那一刻起，我们只有追索到其对立面才能填补作为对象化劳动的资本发展的空白：只有对立面才能将这一分析补充完整，并且这个对立面不能在一个特定商品中构成自身，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将不能解决。如果“所有商品的共同实体——不是作为商品的物质材料，从而作为物的规定的那种实体，而是作为商品，从而作为交换价值的那种共同实体——就在于：商品是对象化劳动”；“唯一不同于对象化劳动的是非对象化劳动，是还在对象化过程中的、作为主体性的劳动”^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23～225页。

② 同上书，226页。

③ 同上书，230页。

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劳动的这一特性。根据这一特性我们可以进入到马克思分析的核心阶段。资本和劳动的分离是第一阶段；现在是在第二阶段——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源泉，作为所有财富的潜力。只有在这些篇章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出剩余价值理论。因此，让我们读一下最重要的一章吧：

所有权同劳动相分离表现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的必然规律。被设定为非资本本身的劳动是：(1)从否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劳动(本身还是对象的东西；在客体形式上是非对象的东西)。作为这样的东西，劳动是非原料，非劳动工具，非原产品：是同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分离的，同劳动全部客体性相分离的劳动。是抽调了劳动的实在现实性的这些要素而存在的活劳动(同样是非价值)；这是劳动的完全被剥削，缺乏任何客体的、纯粹主体的存在。是作为绝对的贫穷的劳动：这种贫穷不是指缺少对象的财富，而是指完全被排除在对象的财富之外。或者也可以说：是作为现存的非价值，因而是未经中介而存在的纯粹对象的使用价值，这种对象性只能是不脱离人身的，只能是同人的直接肉体结合在一起的对象性。因为这种对象性是纯粹直接的，它也就同样直接是非对象性。换句话说，不是处于个人本身的直接存在之外的对象性。(2)从肯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劳动，非价值，或者说，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性，劳动是劳动本身的非对象化的存在，因而是劳动本身的非对象的，也就是主体的存在。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劳动)这种一般财富同资本相反，在资本上，财富是作为对象即作为现实性而存在，劳动则表现为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活动中得到实现。因而，一方面，劳动作为对象是绝对的贫穷，另一方面，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两点决不是矛盾的，或者不如说，这个在每种说法下都是自相矛盾的命题是互为条件的，并且是从劳动的上述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劳动作为资本的对立物，作为与资本

对立的存在，被资本当作前提，另一方面，劳动又以资本作为前提。^①

但这还不够。这一劳动的主体性是“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差别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毫不相干的活动；单纯形式的活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单纯物质的活动，同形式无关的一般意义的活动”^②这一悖论就完整了。并且不再是悖论，而是一个特殊强度的辩证发展：对立决定了主体性和劳动的主体性被定义为一般抽象。这还总抽象，抽象的劳动总体是主体性力量。只有这种抽象的主体性力量，这种能够破坏不公平劳动的被延长和精炼了的劳动力量的整体才能使劳动成为普遍力量和理性的对抗。在这一章中，劳动与资本的分离变成了劳动定义的特性。在这一创造性的工人主体性及其潜在地包含着作为一切财富的潜力中，“抽象的”，从而是“一般的”和“分离的”的两点重要意义被再次加强和巩固。另一方面，使用价值在本质上限定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这与自然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对使用价值的定义有很大的区别！事实上，为了把“使用价值”（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降低到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残渣和附属物，需要大量的无知或坏的信仰。在这里，使用价值只是对立劳动的理性，是主体性和一切财富的抽象潜力，是所有人类可能性的源泉。一切财富和生活的增殖和发展都与这种价值相联系：财富和力量没有别的源泉。资本通过剩余价值攫取这种力量。

继续分析这一对立，我们就会发现劳动被强迫分离和变成对抗性的力量这另一特性。使用价值是必要劳动，反之亦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我们发现工人的使用价值被资本主义转化为交换价值，当两个自治的实体必须互相面对，并被迫联结在一起，一个包含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53～254页。

② 同上书，255页。

特殊计量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对于劳动力的再生产来说，是必要的劳动计量被资本家获得并且服从于资本的普遍关系。

他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是由买者使用这个商品的方式决定的，而只能由商品本身中存在的对象化劳动量决定；在这里也就是说，由把工人本身生产出来所花费的那个劳动量决定。因为工人提供的使用价值只是作为他的身体的才能，能力而存在，所以在身体之外是不存在的。不仅为了从身体上维持工人的劳动能力借以存在的一般实体即工人本身所必需的那些对象化劳动，而且为了把这个一般实体改变得能够发挥特殊能力所必需的那些对象化劳动，都是对象化在这个实体中的劳动。总之，是用这个对象化劳动来计量工人在交换中得到的价值量即货币额。至于进一步阐述工资怎样像一切其他商品一样由把工人本身生产出来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计量，还不属于现在考察的范围。^①

劳动的使用价值被资本降低到既没有改变其质量也没有改变其关系，而是划定了交换的界限：但是工人实际上“既不受特殊对象的束缚，也不受满足需要的特殊方式的束缚。工人的享受范围并不是在质上受到限制，而只是在量上受到限制。这就把工人同奴隶、农奴等等区别开了。”^②“但是本质的东西，就是交换的目的对于工人来说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交换来的东西是直接的必需品，而不是交换价值本身。”^③

从直接的必需品到必要劳动再到使用价值：关系被扩展开来。它扩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人们可以用理性、成熟的方式将工人和资本之间的重组和对抗被建构成阶级对抗。当马克思在这些篇章中讽刺地反对禁欲、节约和参与这些资本的意识形态理论家建议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42页。

^② 同上书，242~243页。

^③ 同上书，243页。

人们去做事的时候，他抓住了这一点：“假如工人一般说来，也就是作为工人（个别出类拔萃的工人所做或所能做的事情，只能作为例外，而不能作为通例，因为这不属于关系本身的规定之内）。”^①现在我们身处相对工资的疑难中心，尽管马克思在与这一主题相关的部分中补充说“关于这一点放在工资那一篇里谈”^②，我们还是要继续审查这些应该组成“关于工资和工人阶级”篇章的各个环节之间的相关性——他也安置了这样一些环节。他们是什么呢？首先，在工资的货币形式中被神秘化了的必要劳动是工人阶级的直接使用价值。另外，这一必要的等级不断地被资本修复。这是第二点：在修复的中心，存在一个动态的关系，即试图重新加固其不可替代的一致性和自身组成的必要性的工人阶级，与试图低估工人和他们的必要劳动的持续不断的对立的资产阶级力量。这种对资本和必要劳动之间的平衡的重建没有表现为意识形态，而是以一种实际的方式表现出来。让工人节约的建议无疑是可笑的，但是工人的反抗和无产阶级试图不断地扩展非工作的领域，也就是他们自己的需要的领域，因此工人的反抗这一事实并不是可笑的：“工人参与更高一些享受，以及参与精神享受——为自身利益进行宣传鼓动，订阅报纸，听课，教育子女，发展爱好等等——这种使工人和奴隶区别开来的分享文明的唯一情况，在经济上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工人在营业兴旺时期，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积蓄的时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③这就意味着工人的使用价值通过必要劳动的价值的增强和提升而在本体论意义上得以扩展。

关于工资的篇章会讨论这些主题。我们很快就会再次看到马克思是如何讨论这些主题的。在此，我们只能再次为马克思作品中这一篇章的遗失而悲叹（就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资本章的第一部分的篇章不能被看作那样的篇章，除非是在反抗工作日以及由此产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45页。

② 同上书，248页。

③ 同上书，247页。

的后果的偶然性的斗争的意义上)。我们只能为这一损失而感到遗憾，因为这是关于工资的篇章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的证据：它们本来是关于工人阶级，需要的等级，快乐，斗争以及必要劳动的篇章。总的说来，关于工资的篇章本来是关于非资本（从而是非劳动）的篇章。

“实际的非资本就是劳动。”^①在《大纲》中，资本的关系在最大程度上是对抗性的。资本家的侵占具有绝对的对抗特性。这一对抗起源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被切断的关系——也就是从被迫统一的整体中释放出来的两种趋势之间被切断的关系：一方面，交换价值在货币和资本中被自动化了；另一方面，使用价值作为工人阶级被自动化了。我们必须反对剩余价值的所有方面，也就是说，将这一断裂到对于工人整体的工作日的分析之中。因此，让我们再次拾起这些非常重要的观点并且审视起源于它们的、可以在这一询问的阶段得出一些特定结论的因素。

首先，必须强调对抗这一因素。当我们说起危机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最后一个例证中看到，马克思关于增殖和流通的分析被补充完整并加以超越，他将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工作日的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阶级关系。这一结论的前提条件是：我们在马克思对于禁欲的批判中读到了它们。^②另外，马克思直接坚持了形成劳动交换和资本交换的两种因素的“年代学分离”，对于那些熟悉他对循环的不和谐的重视程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③但是另一个推论必须被适当地提出——一个属于灾难理论的推论，一个在马克思的术语中被理解为共产主义的真实性而不是危机理论的推论。这是我们的推论，在基础性的对抗的特定阶段，有必要摒弃一切试图将生产力的发展（或者是人类劳动的生产力）与资本的发展联系起来观点。资本所拥有的吸收劳动力的能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32页。

② 同上书，242~248页。

③ 同上书，232页。

是纯粹历史性的(马克思会说“偶然发生的”),它不是被赋予理性力量,而是“非理性的”,非理性使关系的形成倾向于破裂、断裂和爆炸的特点。自1857年以来,已经有很多水流流过历史的桥下:人们一定会说如果这股水流没有冲走资本主义的尸体,如果它愚蠢到停留在桥上看其通过,在社会主义的形式下,以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等待生产力和资本的发展,那么这种等待已被我们的工业河流的有害水流腐蚀了。在马克思那里,在那个清晰地定义对抗的超越了马克思的马克思那里,我们读到了这种发展的没落。资本关系的对抗不仅仅简单地是毁灭性的。将马克思的论点进一步深化,我们认为反抗阶级势必会胜利。工人阶级的立场就是非资本的劳动的立场。我们已经反复提到,被置于“计划”框架内的阶级发展的所有概念对我们来说都是相异的: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这不是统一性,而是将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阶级区分出来的飞跃。但是还要说明的是,在这一飞跃过程中的一个特定的中间状态必须被提到。在我们已经读过的章节中,马克思将工人阶级定义为固定的主体。一方面,使用价值和必要劳动作为历史和社会的基础立刻被统一起来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维持下去所需要的消耗的补偿”^①;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由于其独特的特性,成为社会的基础:工人阶级的使用价值是创造性的;工人阶级是独一无二的财富的唯一源泉。因此,我们位于关于动态的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定义的核心,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本质是价值的创造者,这一本质包含在持续不断的斗争中。这些斗争一方面造成了资本的发展,另一方面造成了阶级构成的增强,造成了工人阶级的需要和快乐的扩大,造成了在再生产过程中必要劳动价值的提升。由于资本要被迫压制和低估这些工人阶级的生产力,并且限制他们增强自身构成的冲动(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途径就是进行这些压制),然后这些斗争,这些原初的对抗就转化成了扩大的无产阶级斗争,形成了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仅仅是在这一对抗的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84页。

步定义中，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规律——剩余价值理论：对抗仅仅定义了运动；资本“正是在形成和扬弃这种区别的过程中，资本本身成为过程”^①。

这一价值规律通过对主体反抗的极端强调开始形成剩余价值规律。但是，只有当劳动的过程被包含在资本中的时候，才能有一个恰当的定义。因此，剩余价值理论直接引出了剥削理论。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层面上，所有停留在价值理论上的幻想都不见了。劳动的创造性力量（如果它是自由的话），都不会倾向于定义资本：只有当剥削作为一个支配和压缩的政治过程，作为对社会的普遍控制的时候，才能直接决定价值和剩余价值。最初的反抗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只有剥削、限制和力量才能成功地解决它。“劳动不仅是同资本相对立的使用价值，而且是资本本身的使用价值”^②：这就是剩余价值理论诞生的时刻。显然，马克思在这里还是像在之前的篇章里那样谈论劳动：社会的、抽象的一般劳动。越是强调这些特性，劳动就越发倾向于生产出剩余价值。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定义及其在创造性的劳动本性中的起源这一问题上花费了很多笔墨。这一强调还伴随着支配整个分析的政治讨论的力量。事实上，一切都是在对剩余价值进行量化的定义，工作日不只从理论上被分成两大部分，并且这种分离进一步成为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

当剩余价值开始被生产出来的时候，就意味着工人的存在完全被吸收进资本中了。使用价值被还原为必要劳动的限制、保护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工人劳动的使用价值的剩余物完全被包含在资本以及资本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中了。劳动的功能对于这一生产过程来说是唯一的，包含在这一过程之中的资本也是唯一的。每一个在资本的控制下可选择的存在都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了，这包括原材料和工具的生产。“进行消费的也不是资本家，而是劳动。这样，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56页。

^② 同上书，255页。

本的生产过程并不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过程，而是表现为一般生产过程，而且资本与劳动不同，只表现在原料和劳动工具的物质规定性上。”^①劳动工具和原材料实际上只是对象化劳动。资本的一般表现（比如不变资本），只简单是其整体的一个实际功能而已（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都被资本范畴所控制）。一旦指令的统一体，其单一性（一般的生产过程）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概念被建立起来，就有可能得到剩余价值的量化定义了。

剩余价值是如何从生产中产生的呢？马克思已经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所有的预想；唯一缺乏的是将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他只在后来才会用到这些术语，但事实上，这一区分已经包含在剩余价值的存在条件之中了。作为活劳动的产出的结果而存在的产品的超额价值，与原材料的价值、辅助材料和劳动工具（固定资本！）相对立，因此，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以工资（可变资本！）的形式支付给工人的价值与活劳动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很明显，只有当前者小于后者的时候，剩余价值才会存在。^②

将剩余价值加以量化意味着将劳动的过程看作全球价值的生产，其中的一部分再生产出工人阶级，另一部分则包含着资本再生产及其快速发展的全部因素。什么都逃脱不了资本控制的整体：作为实用价值的劳动，作为必要劳动的劳动，作为价值源泉的劳动，所有这一切都被资本对象化了并且受到资本的控制。“但是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原料和劳动工具本身已经是对象化劳动，因而是产品。”^③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61页。

② Wygodski, *Die Geschichte einer grossen Entdeckung*, Berlin, Verlag die Wirtschaft, 1968, p. 69; Rosdolsky,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London, Pluto Pr., 1977, p. 255.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57页。

么劳动呢？它“不仅被消费，而且同时从活动形式上被固定为，被物化为对象形式，静止形式；劳动在改变对象时，也改变自己的形态，从活动变为存在。”^①所有这些“发酵”的资本和在其发酵过程中的最初对抗的全部因素都变形了：劳动的使用价值成了资本的使用价值，必要劳动通过工资被资本控制。因此，只有这个时候才有可能将剩余价值加以量化，因为只有当资本侵占了整个生产过程的时候，它才能量化剩余价值。如果这一现象没有发生，那么就没有剩余价值的量化。对抗是不能被量化的。只有剥削才能使量化成为可能，才能赋予其意义。

在这里应当注意一个要素，它在这里不仅是从观察的角度产生出来的，而且是存在于经济关系本身之中的。在第一个行为中，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劳动作为劳动，作为自为存在的劳动，必然表现为工人。同样在这里，在第二个过程中，资本本身被设定为自为存在的、所谓利己的价值（这一点在货币中还只是被追求的）。然而，自为存在的资本就是资本家。诚然，社会主义者说，我们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被看作纯粹的物，而不是被看作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在自身中的反映恰恰就是资本家。我当然可以使资本同单个资本家分开，而且资本可以转移到另一个资本家手里。然而资本家失去了资本也就失去了作为资本家的属性。可见，资本诚然可以脱离资本家，但不能脱离与工人本身相对立的资本本身。^②

因此，这一篇章在此彻底完成了。资本在这里以一种绝对的方式变成了工人的对立面。与其本性的自由相反，“劳动本身只有在被资本吸收时才是生产的”；“与资本相对立的、自为地存在于工人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58页。

② 同上书，261~262页。

上的劳动，也就是在自己的直接存在中的、与资本相分离的劳动，是非生产的”^①，因为资本已经变成增殖过程中的每一个重要因素的“反物象化”、“反位置”的力量了。“因此，要求保存雇佣劳动，同时又要扬弃资本，这是自相矛盾和自相取消的要求。”^②

但是仅仅考虑生产过程的统一还不够。阶级斗争不知道调和，它只知道胜利和失败。这是一个英雄的历史。很显然，任何关于抗争的学说都与资本的历史密不可分。当对抗被制服的时候，资本不是只简单地表现为一个统一的过程，而是自身表现为一个主体。“价值作为主体出现”^③。资本已经是自我增殖的，它将自我保存的社会代价视为自己应得的主体化因素。资本表现为扩张的力量，表现为生产和再生产，并且总是控制的力量。增殖是一个连续的和整体的过程，它既不知道限度也不知道休息。劳动在增殖的过程中被控制以至于其自治性在很多情况下都被极大程度地削减，几乎削减到不存在。当然，剩余价值理论在对增殖过程的方式和动态进行定义的同时，也定义了必要劳动的空间（可以是与相对完全不同的东西），起码是在被神秘化了的工资形式之下。但是在这里，强调的是过程的统一性和资本的主体性。在增殖过程中，资本具有了控制的主体性。

此外，不能忽视最初的反抗。在资本尝试了一切表现为生产和增殖的普遍代表的可能方式之后，它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其对立面所定义。“同劳动对立的资本的存在，要求自为存在的资本即资本家能够作为非工人而存在，而生活。”^④对抗再次出现。并且，对抗在我们已经逐渐学会将其视为普遍的增殖过程的形式中再次出现：对抗伴随着整个增殖的领域而再次出现。工人和资本家，工人总体和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68页。

② 同上书，268页。

③ 同上书，270页。

④ 同上书，277页。

本家总体。我们再一次置身于《大纲》诞生时的政治背景：但是一个重要的过程已经出现了，因为这个政治背景开始与革命的科学观点相关联。

如果我们思考一下构成这些篇章的方法，我认为我们就会得到一个马克思前进方式的好例子。无论如何，唯物主义的方式是完全可行的：组成资本的元素之间的矛盾性，发现了关系的区别，它们是整个分析的基础。但它们不仅仅是基础，它们也是整个动态过程的一部分。区别是动机。这里，我们有一系列主体的替换的操作和理论领域的转换。第一个操作在综合被完成和增殖过程开始时出现。所有组成剩余价值的部分都在此从组成自身并且在增殖整体中消失的对抗中分离出去。在这一操作中它们被转换、翻译并变为其他物质。阶级斗争的领域变成了资本的领域。主体变成了客体，活动变成了存在。这一篇章与从质(价值的创造性)到量(价值的方法)的操作的分析相关。这样，在结果上，这一领域再次倾向于对抗的替换和重现。这一以增殖为特征的社会领域现在是并且总是带着对抗的烙印。首先，伴随着篇章从质到量的节奏，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资本控制的方式下被支配和神秘化了。现在，伴随着新篇章从质到量的节奏，这一领域倾向于对抗。这一图像具有了对立和主体的形式：工人和资本家，工人总体和资本家总体。一旦资本达到了增殖和再生产过程的自体，其过程实际上再次成为了对抗的再生产过程。再生产并不忽视区别，并不弥合对立；恰恰相反，它将两者都加以扩大。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对抗的再生产的扩展和掩饰了历史力量的主体反抗的再次出现。在这一方法论的框架内，剩余价值理论将自身展示为一个基础性的方法。

很明显，我们现在位于精确分析的阶段。这不只是这些篇章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的独特位置的问题：当我们总结了这些标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然而，我正在思考关于再生产中的对抗及其总体表现的分析。现在，在关于危机的第五章中，我们将会再次看

到这一观点。但是，人们不能认为在这一科学的方法、批判的方式在对抗的再次爆发的领域内（在一仍然是趋向性的方式）的水平上就能找到解决办法。这一篇章必须得到深化，并且它实际上占据了《大纲》整个第二部分的核心。我们将会第六讲和接下来的章节的第二部分再次见到关于对抗和再生产的分析。看起来，当其他理论下降的时候，一个新的理论高耸起来：剩余价值理论是《大纲》的巅峰。

我们已经在某种条件下定义了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概念，并且开始讨论与之相关联的后果。

资本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具有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作为产品的更高的价格，只有在流通中才得到实现，但是，它同一切价格一样，它们在流通中得到实现，是由于它们在进入流通以前，已经在观念上成为流通的前提了，已经决定了，——按照交换价值的一般概念来说，表示对象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量（就静止状态来说，劳动量的大小变现为空间的量，就运动状态来说，劳动量的大小只能用时间来计量）大于资本原有各组成部分所包含的劳动量。而这种情况只有当对象化在劳动价格中的劳动小于用这种对象化劳动所购买的活劳动时间才是可能的。我们已经知道，对象化在资本中的劳动时间表现为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总额：（a）对象化在原料中的劳动时间；（b）对象化在工具中的劳动时间；（c）对象化在劳动价格中的劳动时间。（a）和（b）这两个资本组成部分是始终不变的，虽然它们在过程中也会改变自己的形态，改变自己的物质存在方式，但作为价值，它们是始终不变的。只有（c）被资本用来同性质不同的东西相交换：一定量对象化劳动时间同一定量活劳动交换。如果活劳动时间只是在生产出对象化在劳动价格中的劳动时间，那么，这种交换也只是形式上的，而就价值来说，这只是跟作为同一价值的另一种存在方式的活劳动发生了交换，正像就劳动材料和工具来说，只是它们的物质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一样。如果资本家付给工人的价格等于一个工作日，而工人的一个工作日加在原料和工

具上的也只是一个工作日，那么，资本家就只是用一种形式的交换价值交换了另一种形式的交换价值。他就没有起到资本的作用。另一方面，工人就没有停留在简单的交换过程中：他事实上在报酬中得到了他的劳动的产品，只不过资本家帮了他的忙，在产品实现以前就把产品的价格预付给他了。资本家给了他信贷，而且是无息信贷，是为普鲁士国王干的。如此而已。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其结果是劳动价格——尽管从工人方面来说是简单交换，但从资本家方面来说，必须是非交换。资本家得到的价值必须大于他付出的价值。从资本方面来看，交换必须只是一种表面的交换，这就是说，必须属于与交换的形式规定不同的另一种经济形式规定，否则，资本就不可能作为资本，劳动就不可能作为与资本相对立的劳动。资本和劳动就只是作为在不同的物质存在方式上存在的相等的交换价值来互相交换。^①

在一个平等交换的表象下，工人及他的劳动能力与被资本所包含的创造性力量相分离：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将这一创造性力量为己所用，并且付出了劳动活动的结果独立的代价。最好的结果是，由于获得被承认的价值（工资），工人得以成功保存自己的使用价值：他以自身的再生产相回应，即使这一价值必须被不停地掠夺。工人活动的的所有其他部分现在都在老板的控制之中。

至于说除了对象化在工人生命力中的劳动时间，即为了支付维持工人的生命力的必要产品所必须的劳动时间以外，在工人的直接存在中还对象化着更多的劳动，即工人为了获得一定的劳动能力，某种特殊的技能而消费的价值，——而这种能力或特殊技能的价值，表现为生产出同样一种劳动技能需要多少生产费用，——在这里还与我们无关，因为这里所谈的不是某种特殊的熟练劳动，而是劳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81~282页。

本身，简单劳动。^①

简单劳动，财富的原材料，这是一种出于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而将这种主体的需要对象化了的劳动：我们再一次置身于马克思将使用价值看作创造性材料的视角之中。创造性能力与剥削之间的联系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暗示了原材料作为革命主体的重新限定。事实上，在交换的表象背后，一种盗窃发生了。

剩余价值总是超过等价物的价值。等价物，按其规定性来说，只是价值同它自身的等同。所以，剩余价值绝不会从等价物中产生；因而也不是起源于流通；它必须从资本的生产过程本身中产生。这种情况也可以表述如下：如果工人只需花费半个工作日就能生活一整天，那么，他要维持他作为工人的生存，就只需要劳动半天。后半个工作日是强制劳动；剩余劳动。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的剩余劳动。^②

剩余劳动被从工人那里偷走并被转化成剩余价值，被转化成资本。“剩余价值的发现是经济学上最伟大的革命颠覆。这使得马克思第一次在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上发现并科学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机制。用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jakovskij)的话来说，马克思逮捕了这些攫取剩余价值的强盗并且抓住了他们沾满鲜血的双手。”^③

无论如何，这里还有一个积极的方面，一个革命的方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84~285页。

② 同上书，285~286页。

③ Wygodski, *Die Geschichte einer grossen Entdeckung*, Berlin, Verlag die Wirtschaft, 1968, p. 71.

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为普遍需要，成为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东西，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因此，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在这里就像货币和商品的关系一样；如果说一方是财富的一般形式，那么，另一方就只是以直接消费为目的的实体。但是，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再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而在这种发展状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①

让我们将非偏见留到关于资本发展的限度问题上：我们已经强调了过程的反抗性，所以应该不再感到意外。看起来更有趣的是，马克思在讨论中更多的是要着重说明这一事实，即限度对资本来说只能是不能克服的障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86页。

但是，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实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及自我生产的货币了。只要资本不再感到某种界限是限制，而是在这个界限内感到很自在，那么资本本身就会从交换价值降为使用价值，从财富的一般形式降为财富的某种实体存在。资本作为资本创造的是一定的剩余价值，因为它不能一下子生出无限的剩余价值；然而它是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不停的运动。剩余价值的量的界限，对资本来说，只是一种它力图不断克服和不断超越的自然限制即必然性。^①

在这一紧急的方式中，资本试图证明劳动生产力，以及在此框架内的活劳动和对象化劳动(对工人或对生产的其他因素来说)的关系被不断加强。在资本生产力的扩散中，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产生了：因此，剩余价值就不再与工作时间的延长相对应，而是与必要劳动的减少相对应。

活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所以会增加资本的价值(或者说减少工人的价值)，并不是因为这种提高增加了同一劳动所创造的产品量或使用价值量，——劳动的生产力是劳动的自然力，——而是因为它减少了必要劳动，从而，以它减少必要劳动的统一比例创造出剩余劳动，或者同样可说创造出剩余价值；因为资本通过生产过程获得的资本的剩余价值，只不过是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部分。生产力的提高所以能增加剩余劳动——，即对象化在作为产品的资本中的劳动超过对象化在工作日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所形成的余额，——只是因为它缩小了必要劳动时间对剩余劳动的比例，而且只是按照缩小这个比例的比例来增加剩余劳动。剩余价值恰好等于剩余劳动；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97页。

余价值的增加可以用必要劳动的减少来准确地计量。^①

我觉得还需要说一点。我们已经看到剩余价值理论作为一个唯一的、可理解的和合理的资本理论得以发展。单单是剥削的运动就足以解释资本的本性和动态。单单是对抗就足以显示出资本及其强迫的指令。为了生存，价值理论只有作为剩余价值理论的一部分和抽象的下属理论才能存在。它的特点完全是政治性的：它被置于最大的普遍性、关于货币的批判和包含着极端力量的对抗的水平上。对抗性的力量，在一个唯物主义者看来，就是解释的相互关联，就是存在的反抗，是真实的反抗。一切都被降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关系之中：这一对抗立刻成为了这一动态过程的关键，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可解决的限制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秩序。在这里，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而且必须面对其他问题，因为那些问题只能加深对抗。尤其是，利润理论在此是必要的。马克思说：“所有这些论点只有从现在的观点出发来抽象地考察这种关系时才是正确的。”无论如何，整个观点“那就属于利润学说了”^②。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置身于剩余价值定义的末尾，即在一个让我们下降到流通领域去获得《大纲》第二个重要问题的关节，在被看作流通中的剥削和社会的剥削的利润理论的巅峰上。这是基本的方向，是《大纲》的重要基础。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在这一章节，它通过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的革命解释而得以发展。

然而，就算我们忘记了，马克思也会在这里提醒我们。《大纲》中阐述剩余价值理论定义的部分紧接着关于利润理论的分析并不是偶然的（正是此时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不过，我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③）这样，为了提出关于利润理论的分析，这一部分以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03页。

② 同上书，30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性定义作为结尾。

在生产力提高以前资本的剩余价值越大，作为前提存在的资本的剩余劳动量或剩余价值量越大，或者说，工作日中构成工人的等价物即表示必要劳动的那部分越小，资本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得到的剩余价值的提高就越少。资本的剩余价值不断增加，但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比，增加的比例却越来越小。因此，资本越发展，它创造出来的剩余劳动越多，它也就必然越要疯狂地发展生产力，以便哪怕是以很小的比例来增殖价值，即增添剩余价值，——因为资本的界限始终是一日中体现必要劳动的部分和整个工作日之比。资本只能在这个界限以内运动。用于必要劳动的部分越小，剩余劳动就越大，生产力不管怎样提高都越是不可能明显地减少必要劳动；因为分母已经变得很大了。资本已有的价值增殖程度越高，资本的自行增殖就越困难。^①

剩余价值越发展，越不能压缩必要劳动，劳动过程中资本所包含的创造力的质和量就越少。为什么利润理论的解释的关键会出现在马克思的预想和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准备工作之中呢？很明显，我们必须对此加以回顾。首先，剩余价值理论足以使我们认识到对抗的合理性。我们将会看到（在第五章）危机理论是如何引出了利润理论的。

至此，我们所要讨论的第一部分内容就接近尾声了。在这里，我想通过从马克思的作品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即第一个关于剩余价值的完整定义和关于对抗运动的完整定义，来提出一些其他的重要理论主题。但也许所有这些主题都会汇总到一个基础性的主题之上，这就是：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之间的从属关系是隐藏在（马克思）与蒲鲁东的论战背后的无可置疑的理论核心。这就意味着剩余价值理论说明了一件事：社会主义只能是竞争以及资本主义霸权的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04~305页。

秘化，而在意识形态之外的现实中，社会主义作为价值规律来运行是不可能的。《大纲》中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是对（在价值规律上构造出来的）社会关系的平等和公正的赞美诗，而马克思主义显示的是价值规律以及社会主义是谎言。我们所知道的事实就是被偷窃所统治的资本主义异化，以及活劳动及其使用价值和创造力的对象化。根据价值规律，假设价值是可能的，那么让所有这一切运转起来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因为没有不包含剥削的价值。因此，共产主义是对价值规律，对价值自身，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变异体的摧毁。共产主义是对剥削的摧毁和对活劳动和非劳动的释放。这就已经足够了。

第五讲 利润、危机、灾难

剩余价值的社会化，指向利润理论。马克思计划的模糊性以及（或）正确性。

□将“利润”定义为一个范畴的新条件（在笔记本Ⅲ—Ⅳ，和笔记本Ⅶ）：流通，比率和利润的规模化。利润率规律及其双重张力。

□利润作为剩余价值规律的从属性概念。利润作为对象化和社会化的剩余价值。利润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主体性理论。

□第二部分的文本：流通作为危机的形式。现象学和危机的类型。危机的基础规律：危机作为阶级斗争的产物。

□从危机到灾难：理论上的革命紧迫性的红线。反对客体化和反对改良主义。

□证实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规律的不同的公式化表示和阶级解释。

□从危机中的利润理论到共产主义理论：暂时的理论和分析的一个飞跃。

“所有这些论点只有从现在的论点出发来抽象地考察这种关系时才是正确的。在以后的研究中，还要加进一些新的关系，那将大大改变这些论点。这一切一旦不再完全从一般形式上来表述，那就属于利润学说了。”^①剩余价值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开始的：伴随着对于探索领域的改变的迫切需要，为的是得到一个分析领域的全球替换。从剩余价值到利润，也就是到普遍化和社会化的剩余价值：一开始是生产的范畴，剩余价值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05页。

范畴。那么，一个理论上的飞跃就是必要的了。资本的生产力和剩余价值从一开始的位置到这一形式的普遍条件的力量的扩展都需要这个理论上的飞跃。不用说，这种社会化，这种对推论的方法的代替必须重新生产出方法的一般规律和对剥削进行批判的标准。“我们决不否认资本中包含着矛盾这一事实。相反，我们的目的是要充分解释这些矛盾。但是李嘉图却不是揭示这些矛盾，而是回避这些矛盾，认为交换价值对财富的形成无关紧要……也就是说，李嘉图把交换价值看作不过是形式的东西。”^①不，剩余价值社会化后成为利润并不是形式上的，而是一个将剩余价值的矛盾社会化地扩展开来的过程：一个类似在自然界的矛盾，但是更广，更深，也更加具有对抗性。在《大纲》资本本章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利润学说和危机理论同时成型并不是偶然的。

但是让我们按顺序前进。马克思认为利润是与生产条件和资本的自我增殖能力相分离的剩余价值。这样一种从资本的构成关系中独立出来的特点显示了第一个矛盾。确实是一个有力的矛盾：事实上，资本成功地保存了在劳动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价值，并且由于这一侵占显示了自身，以至于不变资本和由此构成的支配成为了社会的形式和社会关系的形式。但这仅仅是矛盾。“这种使社会变富的游离出来的交换价值，在静止的状态下，只能是货币；这样，增加的只是抽象形式的财富。”但是，

它在运动的状态下，只能实现在新的活劳动中（或者是推动以前闲置的劳动，或者是产生出新的工人（促进人口增长）；或者是扩大处在流通中的交换价值的新范围）——这可以从生产方面通过以下办法来实现，即游离出来的交换价值开创新的生产部门，也就是创造出新的交换对象，新的实用价值形式上的对象化劳动；或者是通过扩大贸易，把一个新国家的对象化劳动引进流通范围，来达到同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18页。

的目的。^①

我们一定不要被这个矛盾所束缚。与此相反，我们必须认识到剩余价值的独立性越是固定，它的影响就越是社会地扩展开来，剥削就越是严重：资本不只是生产中的特定剥削，而且无偿地获得了仅仅由活劳动的力量生产出来的社会维度。活劳动被包含并且被当成资本的社会价值继续存在的条件。“实现这种保存，只是由于追加了创造更高价值的新劳动。”^②“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③但是，这种“分离”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就是以这种分离为基础的。对于在生产过程中实际发生的这种分离的扬弃，——因为不扬弃就根本不能进行劳动，——资本并不支付报酬。”^④剩余价值的社会化，就是在质和量的定义上的扩展和深化，也就是剥削的扩展和深化。社会剩余价值是从社会资本和资本家对社会劳动的支配而来的剩余价值，现在是，将来也是：

因此，货币由于现在已经自在地作为资本而存在，它就只是取得未来(新)劳动的凭证。它在对象形式上只是作为货币而存在着。剩余价值即对象化劳动的增长额，由于它自为地存在着，它就是货币；但这种货币现在已经自在地是资本；作为资本，它是取得新劳动的凭证。在这里，资本已经不再是只和现有的劳动发生关系，而且和未来的劳动发生关系。资本看来也不再归结为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简单要素，而是归结为作为货币的资本，但这种货币已经不再单纯是一般财富的抽象形式，而是取得一般财富的现实可能性即取得劳动能力的凭证，而且是取得正在生成的劳动能力的凭证。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14页。

② 同上书，324页。

③ 同上书，329页。

④ 同上书，332页。

币作为这样的凭证，它的作为货币的物质存在是无关紧要的，可以用任何一种要求权来代替。正如国债债权人一样，每一个资本家通过他新获得的价值，而拥有了取得未来劳动的凭证，他通过占有现有的劳动，同时也就占有了未来的劳动（资本的这一方面以后要加以阐述。但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资本的特性，即它作为价值可以脱离自己的实体而存在。这里已经奠定了信用的基础）。因此，货币形式上的资本积累决不是劳动的物质条件的物质积累。相反，是对劳动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未来的劳动被设定为雇佣劳动，设定为资本的使用价值。对新创造的价值来说，没有现成的等价物；后者的可能性只在新的劳动中。^①

这样，我们到达了马克思利润理论的关键部分。这样一个理论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对包含在剩余价值的社会扩展中的剥削新特点的认识。这一新特点既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也不能与在劳动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价值相关：它也是在社会劳动这一整体中形成的，也就是说，它是保存了资本价值的劳动，在规模化的合作中被进一步发展的、与当时社会的科技水平相当的劳动，作为简单人口增长结果的劳动。“总之，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切社会力量，都是不费资本分文的。”^②因此，利润首先是全球剩余价值的社会扩展，由社会生产力的无偿剥削集合而成。

在这里，已经提出了一个问题：《大纲》中的利润理论是否太过屈从于剩余价值理论了呢？罗斯多罗尔斯基（第 426 页）已经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的部分关于“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表述是如何没有精确地彼此相区分并且有时甚至看起来十分相似。这是真的，但是我们不能全怪马克思。的确，如果剩余价值的概念——在它最初的定义里——必须与利润及其社会力量的理论相区别，这种区分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0 卷，336~36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2 版，第 31 卷，168 页。

从相同的核心理念和相同的实体中产生这一点并没错：它是从社会资本的社会剥削中产生。当然，在分析到这一步的时候，这种扩展（从剩余价值到利润的扩展）伴随着扩展利润被解释成社会剩余价值，表现为恼人的趋势。在分析出社会关系的发展已经显示出资本社会化的趋势之前，利润就包含在剩余价值中了。但是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立刻在文本中加上以下内容（不管看起来是多么牵强）：马克思指出了利润的范畴是如何不能在运行中被解决，也不能在媒介的范畴形式上被揭露出来。这一方法的后果是明显的：只要资本授予整个社会以生产模式，利润也是媒介（并且永远不只是媒介）。当资本已经历史地变成社会资本的时候，利润就再也不是媒介了：这时利润变成了解决了的媒介，变成了社会剩余价值；这是指向一个对抗关系的实际上已经遍及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烙印。

在写作《大纲》的那段时间里，利润的第一个定义的限制被代替了。需要另一个更高级的理论条件：首先是对生产成本和循环的分析；简单说来，一个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定义必须被精心制定出来。^① 在这里，请允许我参与对文本的评论的计时并且跳到“资本作为结果实的东西：从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这一部分，该部分几乎在《大纲》的末尾（第 745~778 页，笔记本 VII）。这一部分是对于流通过程的分析（笔记本 IV—VII）的巅峰，是这一分析的结果与对于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笔记本 II—IV）的综合。现在，被（通过流通达到的）社会化的分析所解释的从剩余价值到利润转化的分析，混合了生产过程的结果；与此同时，对社会化过程的分析已经完成了：从剩余价值到利润的演绎，前者的概念并没有屈从于后者，而是反过来强调了它们的差异并且显示出了它们的本质的连续性。这样，模糊性就中止了。

在这里，然后就是资本“同设定新价值，生产价值的自身发生关

^① Rosdolsky,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London, Pluto Pr., 1977, pp. 425-433.

系。它作为根据，同以它为根据的剩余价值发生关系。资本的运动就在于，它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作为根据同以它为根据的自身发生关系，作为现存的价值同作为剩余价值的自身发生关系，或者说，同由它设定的剩余价值发生关系。在一定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是农业中资本再生产的自然尺度，所以表现为资本周转的单位尺度——内，资本生产一定的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仅取决于资本在一个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且取决于一定时期内生产过程重复的次数，或者说资本的再生产的次数。由于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也包括流通，即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以外的运动，剩余价值就不再表现为由资本同活劳动的简单的直接的关系所确立的东西；相反，这一关系只表现为资本的总运动的一个要素。资本从作为能动的主体，作为过程的主体的自身出发，——而在周转中，直接生产过程实际上表现为不以资本同劳动的关系为转移而有资本作为资本的运动所决定的过程，——同作为自行增大的价值的自身发生关系，也就是说，资本同由它设定并以它为根据的剩余价值发生关系；作为生产的源泉同作为产品的自身发生关系；作为进行生产的价值同作为已经生产出来的价值的自身发生关系。因此，资本计量新生产出来的价值，不再是用这一价值的实际尺度，即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之比，而是用作为这一价值的前提的它自身来计量了。具有一定价值的资本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出一定的剩余价值。这样用预先存在的资本的价值来计量的剩余价值，这样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资本，就是利润；从这个角度看，不是从永恒性的角度，而是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剩余价值就是利润；而资本在作为资本，即作为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价值的自身中，同作为利润，即作为新生产出来的价值的自身区别开来了。资本的产物就是利润。”^①

让我们在概念的定义上再进一步。在利润的形式上，剩余价值必须被生产过程中预定资本的总价值所测量。“因此，利润率取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44~145页。

于——假定剩余价值不变，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之比不变——与活劳动相交换的那部分资本同以原料和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资本之比。这样一来，与活劳动相交换的那部分越少，利润率就越低。因此，资本作为资本同直接劳动相比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因而，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创造价值的能力越是增长，利润率也就按相同的比例越是下降。”^①因此，“现实的剩余价值虽然下降，利润率却可以提高。”^②总结起来，“利润率同资本价值成反比，利润额则同资本价值成正比”^③。

我们也许会注意到，在剩余价值的概念和利润的概念之间有一个涉及剥削特性的区分：剩余价值是对活劳动的剥削，生产力的增加，恼人的劳动强度，一个总的和总计的工作能力的排水区；利润是剩余价值的固定，不是在静止状态下的非多元化的劳动的加强，而是劳动生产力的窃贼，对活劳动漠不关心。但是这一区别没有触动剥削的本质：剩余价值和利润都是建立在对活劳动的剥削这一征服之上的；但是剩余价值是在生产关系中考虑活劳动的，而利润考虑的是生产条件和积累的总量。“利润无非是剩余价值的另一种形式，从资本的观点来说是更加发展的形式。”^④这一区别没有触动剥削的本质，证据就在于事实上在这里矛盾再次产生了，不仅仅是作为剩余价值范畴的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对立，而且这种对抗还扩展到了在社会理解的层面上的活劳动和死劳动的关系。更多的劳动被资本对象化了，资本因此增加了；或者说，更多的劳动生产力变成了资本，所有增加的活劳动以一种反抗的方式抵抗这一增长。资本越显示出自身创造利润的能力，作为与劳动相独立的财富的源泉（这样做就显示出资本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是统一的生产力），活劳动就越与社会层面上的资本的发展相疏远。我们稍后将会看到，马克思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46页。

② 同上书，147页。

③ 同上书，147页。

④ 同上书，164页。

如何证明隐含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工人阶级与社会资本(资本的均值化)概念的历史性和实际形式是既对立又平等的;是工人阶级的均值化以及它实际地和历史地发展为革命的力量。这里(并且我们还会回到这里),所谓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在这些篇章中马克思完善了利润理论)显示出从剩余价值的生产到利润的生产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对抗的扩展。

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揭示了生产过程决定资本必须包含越来越多的条件以及在流通过程中将资本社会化的趋势;这就是说资本将越来越多地侵占这些条件这一趋势,也就是剩余价值转化成利润。另一方面,它揭示了从剩余价值到社会剩余价值(利润)的发展,也就是从资本到社会资本所决定的新的对抗。这一以利润规律为承载、既前进又具毁灭性的特征,是被其与活劳动的关系所决定的。一方面,利润的发展趋势是变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和生产性,这就意味着对活劳动的使用将会增加;另一方面,在这一层面上,利润是与其自身的生产条件以及自身的凶猛的和极端的趋向于征服的趋势和趋向于对活劳动的征服的扩展和增加相冲突的。这些趋势都是被活劳动所支配的:利润扩展的趋势与被直接剥削的但仍然是生产性的活劳动相关:利润率下降趋势预定了活劳动对利润的力量及其分离的结构反抗;对盗窃及其对生产力的固定的对抗,资本家与工人生产力的对立,社会资本的力量与社会劳动生命力的对立:因为活劳动显示出自身是毁灭性的。很长时间以来,太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忘记了这一点,因此就去压制证实这一真理的无产阶级的崛起。马克思补充道:“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因此,超过一定点,资本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①“这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现在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49页。

规律。”^①

我们现在必须搞清楚从剩余价值到利润的篇章的一些特点。我们已经看到带有独特区别的利润范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剩余价值范畴相分离的因素；这是一个扩展，一个隐含在剩余价值规律中的扩展到社会层面的对抗。但是，在这两个范畴相似的本质中，在利润范畴与剩余价值之间的从属关系中，存在着一个理论的理由，这些理由诱导马克思从转化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对马克思来说，第一个这样的理由就是与市场无政府状态的神秘化相对立的社会重组的需要，即资本的概念机器运行的范畴。紧随着第一个理由的第二个理由，强调的是带来资本范畴的需要，也就是超越了过渡的篇章和第二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的危机（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紧密相关）的实际的对抗（因此是政治对抗的理由）。从这里可以看出，利润范畴是一个在动态的、历史性的方法也就是趋向性的方法上以方法论的方式成型的。在未发表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第四章中，“趋势”这个词的意思是资本对劳动的从形式到实际的包含。这一趋势将利润看作存在，首先看作是媒介，是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实现的剩余价值的抽象的均值化；然后，由于资本投资了社会生产的总量，利润不屈不挠地实现了这个趋势，它变成了社会化的剩余价值，变成了在资本控制下的社会剥削。“在关系的这一层面上”，资本的运动指向在剩余价值规律下的社会的总体化。然后，在关系的更高的层面上，利润的运动被其本质的能力所决定，与社会工作日相对立（在关于利润的篇章里，讨论的不是单纯的工作日而是社会工作日），并且剩余价值范畴可以被应用于对人口理论的经济学的批判：

创造出来的新的剩余资本，只有再同活劳动相交换，才能作为资本来增殖价值。由此，资本的趋势也是：既增加劳动人口，又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48页。

断减少劳动人口的必要部分(资本不断地把劳动人口的一部分重新变为后备军)。增加人口本身就是减少其中必要部分的主要手段。其实,这一切不过是单个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所占比例的应用。因此,这里已经包含着现代人口理论中虽然还不被理解,但是已经作为矛盾表述出来的全部矛盾。资本作为剩余劳动的设定,同样并且同时既是必要劳动的设定又是必要劳动的非设定;资本所以存在,只是由于必要劳动既存在而同时又不存在。^①

随着生产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利润范畴失去了它的现存结构;或者,说得更明确一些,它必须在社会化生产的条件下重新考虑剩余价值。这里,在这一层面上,它作为“社会力量”:“在一切生产阶段上都存在着劳动的某种共同性,即劳动的社会性质,等等。以后,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等等。(关于这一点,以后再回头来谈。)”^②因此利润范畴起源于个别剩余价值的均值化,起源于剩余劳动的简单联合里,但是它试图发展成并终结于一个剩余价值的近似值,也就是社会剩余劳动。对马克思第一个关于利润定义(这一范畴将与剩余价值范畴重叠过多)的批判是可以成立的,如果它们不能显示出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的质的区别的话。但是,这个关系必须被颠倒过来:只要它是一个社会关系,利润就是一个趋向于剩余价值的范畴。在利润之上是一个神秘化的和资本主义的范畴,它是“一个在生产过程中已经发生的主客体的颠倒”。马克思一再坚持这个利润理论的公式。一方面,他批判性地指出一个事实,即我们一定不要看到在“很明显,在利润率平均化的场合还有其他的规定加进来。但这里讲的不是剩余价值的分配,而是剩余价值的创造”^③。他讽刺地说:“一次交换活动不能增加交换物的价值,同样,交换的总和也不能做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79页。

② 同上书，37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63页。

这一点。”^①他还补充道：“弄清楚这一点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剩余价值在各资本之间的分配，总剩余价值在各个资本之间的计算——这种第二级的经济活动——引起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在通常的经济学中与原初的经济活动混淆在一起了。”^②第二级的经济活动！所以，另一方面，我们再也不能满足于对理论的和范畴的顺序的亦步亦趋；这是一个开始定义利润的动态的、趋向性的、活跃的形象，利润的本质组成并显示出自身的剥削的社会化因素。因此，利润总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在利润的政治形象中，发展的趋势被预定为：利润开始具体化为不仅仅是剩余价值的量和个别利润的均值化，而且是作为社会对抗的一极的一股政治力量——在这一阶段它是政治学的，但是会慢慢被现实所改变。这一篇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清楚地显示出利润理论隶属于剩余价值理论。这一过程引出了资本的政治形式，与剩余价值理论相似——又与之相反，它导致了作为“无产阶级”的活劳动的身份。当然，马克思提出了活劳动的理论，也就是说资本的主体性理论，但是（先撇开他的初衷不论）他没有提出一个工人阶级的主体性理论（比如说工资的形式）。但这一马克思著作发展的字面上的不对称不应阻止我们认识到结构上的平衡；并且从发展他的预设出发，我们在社会工作日中看到了他做出的社会剩余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的区分，即致命的斗争的基础是两个阶级。我们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中看到对立的主体形式，对立的意志和理智，对立的增殖过程：总之，我们已经在这里考虑到的条件的发展所需要的一个对抗的力学结构。关于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以及无产阶级的理论既是利润理论的前提，又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与所有的剩余劳动被勒索、对象化和社会化，以及与此同时资本作为一个阶级和对剥削的控制实现了自身的统一这一事实相对抗。《大纲》的目的就在于发展出一个与资本的主体性的利润理论相对立的工人阶级的主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20页。

② 同上书，20页。

性理论。

在离题这么远之后，让我们回到《大纲》内容展开的顺序，也就是回到资本章的第二部分（流通过程）。这一部分正式开始于一个关于危机的长长的附录。危机，现存的危机，是整个工作的动力的批判性的事实的增殖是其基础！在危机的情绪当中，《大纲》已经开始充分探讨作为危机表现形式的特殊层次的货币理论。随后，它发展成剩余价值理论；然后，通过利润理论的第一个公式和在利润率规律中隐含着的扩张，它又一次回到危机及其科学解释上去了。现在，根据以前的计划，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应该给流通过程的分析提供空间，而且我们应该关注《大纲》的第二个主题。然而，马克思的初衷再一次被危机制止了：在分析充分展开之前，流通被看作危机的独一无二的形式。在危机问题这一问题上的新的和长久的停留显示出《大纲》发展的捷径了吗？这是对革命性的主体的理论程序的顺序的滥用吗？从局部来说，的确是这样的。但是还有更多，也有不同。在《大纲》的第一部分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这就是过程的主体化。换句话说，通过剩余价值理论的特性以及后来发现的利润理论，我们现在已经位于一个概念的网络之中，在这里我们会注意到与经济增长和阶级斗争相关的危机。与资本不同，“资本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增殖过程的性质，只是在危机时期才由于切身利益关系而去认识这一性质”^①，只有当下在危机的形式中，以及在阶级斗争的特许的领域内发生危机时才能考虑工人阶级的观点。马克思对于危机的思考，始于这一观点，即资本的增殖过程应该扩展到流通领域；但是，由于资本的增殖过程被剩余价值的对抗性规律所支配，因此流通过程必须回溯到剩余价值并且在所有的危机之上被领悟：在这一危机中，既体现出了工人阶级急需认识到其主体性这一迫切需求，又说明了工人阶级的对抗是具有统一性的。所以在资本章的第二部分，“流通过程”这一标题的出现不是巧合，而是在关于危机的附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42页。

之后大约一百页才出现的，更清楚的则出现在甚至更往后的几页（我们稍后在第6章会看到）。在附录之后大约一百页出现，也许显示出了马克思对于危机定义的进一步探索。之后，对作为流通形式的危机的分析，一部分基础性的分析是被剩余价值理论勾勒出来的。这是一个对于与流通的危机相适应的生产过程的对抗的运行的探索。因此，剩余价值理论在危机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大纲》的第一部分在附录的末尾才可以被看作是真正终止了。

我们仔细地考察就会发现，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货币只有通过价值增值过程才变成资本——同时表现为资本的价值丧失过程，表现为资本丧失货币资格。^①

不管怎样，资本的价值丧失构成价值增值过程的一个要素；其原因简单地在于：过程的产品在其直接形式上不是价值，而是首先必须重新进入流通才能实现为价值。^②

在生产过程内部，价值增值和剩余劳动的生产（剩余时间的对象化）完全是一回事，因此，价值增值没有任何其他的界限，有的只是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部分地作为前提，部分地被产生出来的界限；正因如此，这些界限在过程中总是表现为应当克服的限制。现在，出现了出于生产过程以外的对于这个过程的限制。^③

然后，我们立刻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问题。生产的矛盾通过流通过程被放大了：矛盾被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以一种新的形式得到缓解，甚至扬弃，但是它们“只有通过暴力被扬弃”^④。“在考察资本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81页。

② 同上书，382页。

③ 同上书，384页。

④ 同上书，386页。

一般概念时，重要的是：资本并不直接是生产和价值增殖的这种统一，而只是和各种条件联结在一起的过程，而且正如过程标明的那样，是和外部条件联结在一起的过程。”^①当然，“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②，危机内在于资本的概念之中这一事实不只显示了其消极性的一面，也显示出了其积极性的一面。这就是指向相对剩余价值的推力和指向世界市场的趋向性，“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③：这些都显示出了(对资本的)限制的概念所包含的积极的维度，这些限制是资本知道并且必须遵循的限制。因此，危机的每一阶段都伴随着重建的扩展阶段。

旧产业部门的价值由于为新产业部门创造了基金而保存下来，而在新产业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又以新的形式确立起来。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奢侈品在古代所起的作用和在现代所起的作用不同，这以后再谈)。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有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87页。

② 同上书，388页。

③ 同上书，388页。

④ 同上书，389页。

但是，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不仅如此。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①

真正地克服、避免危机，这是资本做不到的。这里实际上有两个显示出危及自身的现象形式：一方面，是比例失调的危机（也就是说，实际流通的危机，组成资本流通的不同因素之间的不平衡的危机）；另一方面，是增殖的危机（也就是说，过度生产和消费不足结合起来所造成的消费能力引发的危机）。但是，超越这些现象的形式之外，我们发现的是危机的基本规律，这种规律隐含在主体的无尽的再生产的必然性之中。这一规律存在于生产和资本增殖的矛盾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一个过程的或者不如说各个过程的总体的各个要素”^②之中。这里存在着一个不能在流通或者一般生产的过程中被发现的限制：我们必须进一步探索，因为我们必须发现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规律。现在，从内在的角度来看，危机起源于：

- 1) 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
- 2) 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 3) 货币是生产的界限；
- 4) 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

由此造成生产过剩，也就是使人突然想起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90~391页。

^② 同上书，395页。

的所有这些必然要素；结果是，由于忘记这些必然要素而造成普遍的价值丧失。与此同时，向资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在生产力的更高发展程度上等等一再重新开始它（突破本身限制）的尝试，而它作为资本却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①

因此，危机的基础性规律存在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矛盾关系中，也就是存在于剩余价值规律的运行中。

正是在这一惊人的暴力之中，马克思在后来的篇章里发现了决定危机的基础性规律的效果。如果资本是动态的和“活的矛盾”，那么工人阶级就代表着坚定的、反抗的力量，也就是代表着限制。这一关系变得越来越主体化。发展总是带着危机的形式，这是因为，就像危机一样，发展在其最后的时刻，在其基础上“始终是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比例，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象化劳动的各种要素对活劳动的比例”^②。“最初的比例”，即如何分割这些量，造成了支配发展着的资本的危机问题。“以便重新建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正确比例——这个比例归根到底是一切的基础”^③，是资本的永久的目标。资本的破坏，对活劳动的贬低，重建更多的（对资本来说）剥削条件：这是资本的危机，这是资本为了获得控制权即它的主体性力量而总是愿意付出的代价。

如果我们更深入地分析一下危机的机制，如果我们按照利润理论教给我们的方法去分析那些基础性的规律，我们就会发现作为整个分析过程的基础：即政治关系。规律的主体性再一次表明了过程的主体性，因为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间的关系就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事情既简单又明了：“如果说资本因此表现为劳动的产品，那么劳动的产品也表现为资本——不再表现为简单的产品，也不表现为可交换的商品，而是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97页。

② 同上书，434页。

③ 同上书，437页。

现为资本，表现为统治、支配活劳动的对象化劳动。下述情况同样表现为劳动的产品：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也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①“劳动的这种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也是丧失现实性的过程。”^②因此，资本家面临的问题完全是政治上的问题。权力将剥削从生产扩展到权力关系的再生产：“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③但是另一方面，事情也是既简单又明了：“再生产和新生产出来的，不仅是活劳动的这些客观条件的存在，而且是这些条件作为独立的价值，即属于他人的主体的价值，而同这种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存在。”^④活劳动的主体性以一种十分对抗的方式反对从死劳动到剥削力量的强化，以至于它否定自身作为价值，作为剥削的本质，因此将自己视为对价值和剥削的否定。“甚至活劳动本身也表现为他人的东西而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而活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的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自己的生命表现——，因为活劳动为换取对象化劳动，为换取劳动自身的产品已经出让给资本了。劳动能力把活劳动看作他人的东西，如果资本愿意向劳动能力支付报酬而不让它劳动，劳动能力是会乐意进行这种交易的。”^⑤但这还不够：否定性变成了革命性的反叛，变成了逆转的信念：

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45页。

② 同上书，446页。

③ 同上书，450页。

④ 同上书，454页。

⑤ 同上书，455页。

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就像当奴隶觉悟到他不能作第三者的财产，觉悟到他是一个人的时候，奴隶制度就只能人为地苟延残喘，而不能继续作为生产的基础一样。^①

在此，危机的基础性规律已经完全发展成了阶级斗争的规律。“这个问题在以后研究雇佣劳动时要作进一步的说明。”^②发展的危机以及有了全球化的趋势，以至于危机和发展都被看成了阶级斗争的产物。

不能否认，字里行间蔓延的极端的、主体性的和革命性的张力找到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危机理论之间的捷径并且急切地追随着这条捷径。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在对危机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他用很多精确的数字和比率揭示出隐藏在危机中的主体性和分离性的特点。然而，我们必须强调这一事实，这一捷径并不具有(当然是这样)很长的时效性。我们理解马克思迫切需要找出危机的主体，我们可以积极地评估其效果，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里存在着矛盾和模糊性。其中有一个矛盾尤其突出，即从表面上看，极端的革命主体性与资本主义生产增长中的极端矛盾并肩而行，也就是说革命与灾难同时产生。危机所体现出来的正是革命与灾难这两种性质上似乎是相同或相似的发展趋势。事实上，这个矛盾是很好解释的：这是一个以集中聚焦所有的理论因素和一个以特定行为的主体性为目标的理论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和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很好的理由提出这种潜在的政治主张。这是一个提出所有批判以及革命性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方式所需要的实际理论的集中。这一事实说明聚焦的集中(越复杂就越有用)应该是结果而不是前提。而趋势的类比往往表现为前提。看起来，尽管一些工人的革命(在灾难赋予其理性的动机之后)必须与对资本的革命相结合，也就是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55页。

^② 同上书，457~458页。

在危机之中，通过这一急切的运动指向对自身力量的社会认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这一捷径的简短性，强调它的含义已被改变为其他东西。坚持这一批判对我们来说是很容易的：但重要的是要成功地转换其意义，即我们从这个角度并且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才能掌握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自己意识到了他的理论发展的局限性。为什么不试着理解这些局限性的价值和积极意义呢？理解这些意味着重新回到马克思科学的革命方法论的核心。

所以呢？我们面临的是马克思的恼人的客体性吗？还是我们面对的仅仅是作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的陈腔滥调的主体性概念吗？或者更糟的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综合了革命计划的起源的、预设了危机必然发生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吗？我们已经从方法论的角度考虑过这些客体性了。这些看起来都不可怕；因为这一趋势也许会隐藏其起源的暴力，但是无法抹煞它；因为它缺少足够的革命计划以及能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上加以肯定的历史力量，但是它不能阻止其在发展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暴力倾向。这一对抗的内在性，在其理论框架的无限小的细节中被检验，的确可以显示为这样一个观点：轨迹，尽管其发展的对抗性的层面不能被抹煞。另一方面，知道了如何阅读这些篇章，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十分准确和紧迫的对于对抗种类的关注，而只有极端的漠不关心才能得出消极的结论。总之，在这里，这一紧迫性（理论上的革命紧迫性的红线）已经在化学意义上导致了分析的沉淀，并且巩固了一些（也许是太过基础性）试剂；但是这一紧迫性正是与某种客体性和改良主义相对立的。人们可以通告消除在字里行间中纠结的矛盾和模糊性，但是如果我们要从政治学的角度去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要将它们视为革命激情的流溢；如果我们想要从理论的角度去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小心不要从客体性或有机性的层面上去流行地理解它们。罗斯多罗斯基经常告诉我们，马克思的“灾难主义”是革命音乐的关键音符。我们已经多次感受到了被打败的愤怒和革新的理论激越，因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这一切。

从理解到解释。事实上，仅仅理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让我们以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例，这就是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这也许是马克思理论中最模糊也是最具矛盾性的观点。让我们试试看能不能理解这一问题并且明确地解决这一问题，也就是说，看看我们能不能在不同的方法中发现解决之道，一种与阶级立场相适应并且与马克思的方法论预设相一致的解决方法。我们选择这一特定的观点的理由是可以成立的。事实上，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看起来是对批判的“残暴的活体解剖”。如果我们成功地带着敬意显示出马克思研究过程的正确性，即剩余价值规律的统一性和阶级立场，我们就能取得巨大的进展。

现在，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马克思利用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来显示资本的增殖比率是如何成比例地降低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的，前者的贫穷的加剧是如何相应地造成了新价值增殖的增加。进一步说，固定资本成比例地吸收越来越少的活劳动即增殖劳动，尽管从量的角度上说它征服的越来越多。利润的总量可以增加，而利润率却在下降。根据这一规律，资本的增长无可避免地会引发危机，因为资本承担的所有的生产的原因也正是隐含着减少资本价值的原因。根据这一公式，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的规律成型了，这是由剩余价值所建立起来的。在这一基础之上，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从必要劳动是一个固定的量这一事实中诞生。资本的增长也许确实造成其自身的量的压缩，也确实能使劳动生产力多元化，但是无论如何，可供榨取的剩余价值是有限的：必要劳动的固定性（工作日的必要部分）造成了资本增殖的限制。这一限制增长到了这一程度，以至于生产力和利润的量的任何增长都面临着越来越脱离主体，变得越来越不能被控制。这一固定性从最初的意义决定了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在这一规律中我们必须看到，在《大纲》中马克思已经得出了这一规律的第一个公式，即理性的外化，即工人阶级从资本中发展出工人自治。我们必须记住，一个新的假设是如何在这一观点以及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观点中

被制造出来的，这也就是在我们看来被最近的阶级斗争经验所证实和广泛证明了的假设。这就是，关于工作日必要部分的价值量不仅是越来越固定的，而且趋向于一个更高的价值，从而趋向于减少（主体性地、活跃地）可以被勒索的剩余价值的假设。必要劳动的量是固定的，并且从阶级角度上看，一个更高的资本增殖和无产阶级的自我增殖的可能性正是建立在这一固定性的基础上的。总之，对马克思来说，对于劳动力的低估，也就是对工作日的必要部分的压制不是没有限度的，而且与此相反，它是有限的并且是可以逆转的。必要劳动可以自行增殖，需要的世界可以并且必须扩展。在这里就出现了结合了资本的价值的成比例的减少与增殖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因此，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就显示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阶级斗争张力方面最清晰的直觉之一。稍后，当马克思改良了这一规律而不是提出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间的比例公式、资本的有机构成（特别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公式，或是利润和工资的比例之间的公式，就会出现关于主体问题的困惑。很明显，这两个公式在《大纲》中也出现了，但是在这里它们是从属于由剩余价值规律所决定的量。与之相反，当它们变得卓越或独一无二的时候，整个关系将被不恰当地转移到经济的和客体性的水平上。因此，一个作为基础的、固定的、可变的理论的消除阶级斗争的概念将会在一个有机构成公式的基础上作为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解释结果而出现；反过来，不断增长的贫穷的不切实际的规律将会从一个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比例的指导方针的解释中诞生。对抗原因的困惑将会进一步完善，在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诱导下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危机的如此不切实际的描述，对抗的原因总是比规律自身要更加重要。

我们从对在一系列危机过程中的马克思的波动的解释的需要出发。我们已经理解了他的灾难的意义。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个灾难以及它所预示的客观主义和决定论，可以在一个理论的层面上被看成是对他之后的思想公式的反映，这就是，将一个奠定了基础的公

式以及居于核心位置的剩余价值理论看成是所有其他马克思主义的范畴的基础的否定。但如果我们把这一规律当作出发点，我们可以公正地将马克思的灾难主义归因于他的规划的革命紧迫性，我们可以认识到寻找这一捷径是暗示着理论论辩的扩展，我们可以用他的战斗的唯物论的内容来宣告客观主义和决定论的残渣的无效性。换句话说，马克思揭示出危机是以最大的阶级斗争发展的强度和最广的剥削规律的固定性的扩展为基础的。现在我们可以将图像倒过来，认识到从阶级斗争到发展和危机，再到资本结构的内在性是如何在讨论的这一阶段得到证明的。这是对我们将要在《大纲》的第二部分学习到的东西的预想，也就是说对流通过程和在社会资本层面上阶级斗争范畴的重组。但是现在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方式的重要性吧。

我们还是在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这一主题上，做出另一个标记。让我们想象一下在阶级斗争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无产阶级对抗的刚性引起了萧条和/或利润的下降。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情况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且阶级斗争的扩展是社会同质性的。现在，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得到的将不仅仅是利润率的下降，而且是利润总量的下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二十年来发生的阶级斗争，向我们证明了我们刚才所描述的情况并非不实际。强调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允许我们向更深层次的、强加在马克思理论上的任何经济主义计划的断裂前进。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只有当它在剩余价值理论的视角内解释才是正确的；工人阶级反抗在资本主义以及资本自行增殖的条件下的劳动的强度的复杂性的复杂性是由这一规律的潜在性特征而产生的。还有，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它才有可能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看是“灾难性的”。只有不相信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才会使共产主义的发生不可避免。这只是文字上的矛盾。在现实中，只有必要劳动的自由，劳动赋予自身以创造性，它的既是创造性的又是破坏性的能量，才造就了对资本的限制及其危机的各种各样的、循环的原因；从它的不可逆性来看（也就是在基础性的关系上），被

剥削劳动的总量剥夺了被剥削劳动总量的剥夺者。危机理论就存在于这一视角之中。

但是这还不够。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萌发不仅在于它将每一个危机的经济现象都降低到其阶级基础上去。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阶级斗争领域定义危机的现象方面，它也惊人地富有成效。也就是说，只要记着马克思的方法论因素，那么一旦对危机原因的研究被降低到剩余价值规律的运行上去，这一理论就能将自身展开到危机形式上去。在此，我们将会看到危机（许多危机）的模式被编织到辩证法的庞大理论网中，从而显现出马克思危机理论所具有的批判性以及矛盾性的特点。当然，只有在流通和生产的相互关系中重新考虑过危机之后，我们才能走上这条道路。但是无论如何，强调一下上述分析的结果还是值得的。

通过利润率理论，以及它所揭示的双重张力（即建设性的、带来文明的张力和与之对立的毁灭性的、强制性的张力），剩余价值理论在作为阶级斗争产物的危机理论中终结了自身的实际过程。这一点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大纲》的第一部分在这里就结束了，结束的还有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苦心经营出来的剩余价值理论。

我们该怎么说呢？在这里，人们有种坐在炸弹上的感觉。已经闪过了一些火花，也许还不成熟，也许还很仓促，但未来的方向已经灵光乍现。但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潜能现在必须爆发，而且这种爆发将会取代整个理论分析领域。迄今为止我们都在跟随着已经扩展到其弹性尽头的分析线索。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一地步，即所有对于分析的继续以及它保证将会带来新视界和新财富的暗示，几乎只能从否定中产生了。在危急中显现出灵光的共产主义，是一个通过将其置于阶级斗争的危险之中而迫使政治经济学的每一个范畴断裂和破产的双重计划。阶级斗争通过毁灭雇佣劳动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并且走向一个极端否定的极端多元性上去。在这一理论的转折点上，我们对于马克思分析的破坏性和批判性效果有了一个确切的认识。

这是一个笛卡尔主义式的强烈破坏。一切都被破坏并且在阶级斗争原则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名义下被降低了。现在呢？现在回归到了社会资本和重组阶级之间的冲突问题上来。回归就意味着使理论方法变得具有精确性、具体性和历史性。回归必须是通往政治学的路径。否定性的暗示有权利也有义务成为活跃的、积极性的命题。危机理论所暗示的共产主义，必须被给予内容。我们面临着资本开始从生产运动到流通的图景，但是流通在这里被困在危机的形式中。一个必定是灾难性的危机：它对革命计划的紧迫性来说是必要的。但是让我们想象一下流通使它的过程固定下来，即使是在危机的不可逆转的形式中；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一阶级斗争的内在性被固定下来并且只是作为爆炸物潜在地显现自身；最后，让我们一方面想象一下流通的标准化和危机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人阶级通往共产主义的潜在的发展；另一方面想象一下可以被理论估计出来的情况。突然插入的关于危机的附录，证明了马克思在确定这些预想（我们将会关于流通的最初篇章中看到它们）时所面临的困难：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难耐的革命的時刻。然而，清楚的是，这一标准化的新领域，也就是在资本的社会化方面的另一个飞跃——和阶级斗争。替换这一分析就是必要的了。在重要的篇章里还是像往常一样聚集着理论的和历史性的动机；它们变成了政治动机和政治意图吗？如果要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倾向于肯定。事实上，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向我们展示的是：马克思已经得出了工人阶级理性自治的结论。剥削理论（即使剥削理论的社会化更多地是被象征性地而不是逻辑地展示出来），也同样导致在这一领域中两种对立力量的涌现。在这里，政治因素变成了我们赖以设计理论模型的基础，而且与它相伴随的是它开始为了自身的正确性而测定有拘束力的条件。一个理论变得越抽象、越广泛，它就越需要现实的支持。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理论上的替换（我们称之为飞跃）没有与一个力量、一个主体相关联就实现了飞跃，这是不可思议的。它的差异和特点被看作是广泛探索的条件。马克思的这一系列预想，即工人阶级的自治也许已经被暗示出

来了，但这一暗示并不缺乏实际性。但是，被改写了的辩证法的这一部分则不是这样：在危机理论中，它表现为任何辩证法的断裂、无产阶级独立的基础和共产主义的命题。我不知道该如何使你们确信我的这一论点；但是我知道，换成任何其他的论点，弥合从革命理论中分离出来的剩余价值理论与社会资本的对立之间的分歧都变得不再可能。除非我们太喜欢“理论”。

第六讲 社会资本和世界市场

从剩余价值理论到流通理论：通往《大纲》中第二个基础性的主题。

研究的实质层面和方法论层面。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个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补充。

回到主体：作为侵占的社会化。

从形式到真正的实质。

通往社会资本的“质的飞跃”。

从肯定到否定：作为障碍的社会化。

资本及其规律的“不断革命”。

限制和障碍。

通往世界市场。

作为结果和作为条件的资本的扩展。

资本的集中形式及其对立的形式：社会资本和阶级斗争。

作为对抗的充分的、极端的发展的论证的综合。

这样，危机不得不在流通理论中被普遍化。流通只是由剥削的动力学所形成因素的扩展。流通理论是剩余价值理论的继续和扩展。关于危机的附录已经向我们显示了流通，但它只是在否定的层面上，在一个仍然是非中介的领域里，强调着分离及其毁灭性后果这一前景的否定性层面。而现在，我们必须考虑一下中介。流通是资本主义对危机的胜利。但是它没有消除组成危机和资本本身的关系，以及两个阶级间的分裂及其斗争。资本必须向外扩展并且在流通过程中复制，这样才能使危机扩大化，才能包含组成自身以及越来越急

切的不断爆发的分离的逻辑。但是资本投资的每一个新领域及其流通，组成了另一个阶级关系。因此，流通导致了资本的再生产、工人阶级及其更大规模的斗争。很显然，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难题，这就是(总的来说)流通和再生产之间关系的定义，或者(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流通的生产潜力难题：我们将会在后看到这些难题。现在，我们将要效仿马克思在讨论这些主题时存在的相对不精确性。他最关心的是对资本扩张力量的分析。这一过程不仅具有量的内涵，也有质的内涵。事实上，资本通过其扩张变得越来越集中，它甚至征服了更广泛的劳动力。然而，反过来，这也证实了资本及其发展的不稳定性。当资本达到更高水平的时候，社会资本也达到了征服整个社会的水平。《大纲》第二部分所揭示的正是通往这一可怕前景的道路。

为了强调《大纲》第二部分的重要性，我们在这里必须离题。如果，就像罗斯多罗斯基指出的那样，剩余价值的发现在经济领域内解释了阶级斗争，对流通的分析将阶级斗争理论发展成为革命主体。作为《大纲》第一部分的目的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革命主体的可能性的定义，否定性的定义。工人主体的总体被置于流通理论中这一事实，就在于流通的分析(和事实)存在于被普遍化了的分离的内容之中。在这一讲以及下一讲，我们将会对此加以研究。我们将会以下面两种方式在更深的层面上进行讨论：作为主体渐进自我实现的共产主义理论，以及危机理论和主体理论的综合。

在这一方向上，论证的发展包括了一系列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只是匆匆提到的一些想法，这些因素尽管属于马克思的方法论，却很少被他明确地理论化。但是在这些篇章这里，它们起到了一些相关的作用。我们将不得不坚持，尤其是我们一直声明的不同的理论置换的组成性的特点。我们将会继续坚持这些篇章的真正特点，即马克思的理论倾向于变得越来越具体化。从剩余价值理论到流通理论，从对市场的分析到对资本的分析，从形式上的小前提到实际上的小前提，都变得越来越具体化、政治化。马克思经济学被解读为资本

主义发展的直接历史。这是不对的。现在，在这些可怕的篇章和置换里，我们感受到了理解这一过程的关键所在：在阶级斗争的实际层面上，向革命主体的复杂性更进一步。一种实现了马克思的方法论的基础标准的方法，在一种如此主体有效性的方式上抓住了核心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真正转变的关键所在。然后，我们所追求的是在剩余价值理论和流通理论之间的途径：主体变得更加现实，更加具体；剩余价值理论所描述的细胞结构变成了躯体，即完成了的动物实体。我们的说明性的问题是，当然，是以这一过程中的步调前进的能力。如果我们遵循着马克思的论证，就不会遇到困难。

但是这对马克思来说是困难的。事实上，在正式开始关于流通^①的讨论并为之命名为“第二部分——资本的流通过程”之后，他不仅给了我们一个关于危机的一百页附录（这个附录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只是一个剩余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的附件），但是在这之后，他还是没有进入到核心分析。在笔记本Ⅳ和笔记本Ⅴ里，在马克思没有被打断的连续性解释中，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个五十多页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②的长长的讨论，这又一次延迟了第二部分（这部分内容出现于刚才提到的笔记本，写于1858年2月之前）标题中所暗示要完成的任务。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是一篇关于“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或者原始积累之前”的生产过程的小短文。这是一篇经常被独立地印刷和使用的小短文，因为，第一眼看来，它确实拥有自身的独立性。这篇在任何情况下在它的广大读者看来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小短文，的确最终提出了一系列独特而又极端的（以它们自己的方式来看是）重要的问题。^③

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所提问题的讨论不是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我们只需记住的是，这篇短文是《大纲》的一个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81页。

② 同上书，465页。

③ 请参看 Sofri, G., *Il modo di produzione asiatico*, Torino, 1969.

机组成部分，它要求我们理解它在展开马克思的理性中所占据的地位；这就是，要理解它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出现，也就是说要确定它的综合运行。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指出，这一研究是对危机的另一种研究。在关于危机的附录的准时的、同步的研究之后，这里揭示出的是一个历史性、历时的分析。在流通的形式中看到危机之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在一种长期趋势的图景中对危机加以分析。这一方法是完美的：在阅读这些篇章的时候，我们经常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些篇章就是直接运用《导言》中所提出的方法论的范例。历史编纂学的运用。这里，我们找到了我们在第三讲中所强调的所有的东西：一定的抽象——趋势——新的朝向——置换。然而，这篇短文的关联性却不是它的方法中被找到（即使撇开主题问题的独特性不谈），而是在它的实质中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因为它对《大纲》的阅读和解释具有内在的推动作用：这是一个不能放在括号中的括号。因为，我们必须再次强调这篇短文在《大纲》的经济学中的地位，以及这一研究的置换所包括的在通往对流通的分析及其理论问题的计划中的地位。它的目标是通过将危机带到在这个领域中构成了发展和危机的要素的再也不能被避免和神秘化的阶级力量的确认，来完善对于危机的分析。这是我们不能低估的辩证法的具体的一步。

但是让我们看一下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的初期的观点。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确认一个抽象的坐标轴和两个具有内在必然性并在后来发展中不断具体化的位置来前进。这个坐标轴由生产模式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定义构成：存在着一个共同体，只要再生产的客观条件充分，生产模式就可以被确定。但是“生产本身，人口的增长（这也属于生产），必然要逐渐扬弃这些条件，破坏这些条件，而不是加以再生产等等，这样，共同体就同作为其基础的所有制关系一起瓦解了。”^①生产的限制、再生产和危机都由客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78页。

条件的水平决定，也就是说，由预定的条件所决定。“在一定范围内可能有很大发展。个人可能表现为伟大的人物。但是，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原始关系相矛盾的。”^①每一个“前定的社会形式”都包含这一复杂的条件和限制，这些条件和限制的相互关系由既有形式的存在和危机组成。文明的普遍特征是从自然到历史的运动。从定义来看，每一种形式都是“限制的”，而发展的方向是通往无限的人类潜能。

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依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②

这里展示的就是这个普遍性的、抽象的、趋向性的坐标轴。运动规律（就像促进了从有限的途径到无限的途径的趋势的规律一样）促进了从有限的统一到差异的途径：

共同体以主体与其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提的，或者说，主体的一定的存在以作为生产条件的共同体本身为前提的所有一切形式（他们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但同时也都是历史过程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79页。

^② 同上书，479~480页。

结果), 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 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先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起先是自然形成的基础, 然后是历史的前提——从事劳动的。可是到后来, 这个基础或前提本身就被扬弃, 或者说成为对于不断前进的人群的发展来说过于狭隘的、正在消灭的前提。^①

差异和无限性、差异和财富是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同源方式: “成为某一历史过程的结果的, 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 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 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 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②我们已经说过, 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定义伴随着两个更加具体的、下属的命题, 这就是它们的内在组成关系和造成它们的爆发的危机。我们这里关心的既不是对马克思用来说明一种决定性的社会形式(一种前资本主义的形式的古老的、东方的共同体)的分析, 也不是马克思在这里对“帝国的衰败”开始后的浪漫主义的传统的强调是否值得。

更有趣的是, 跟随着马克思的线索, 到达对作为第二个从属主题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分析, 因为只有在这里, 一些作为之前的一般规律及其后来范例的一般(至少可以这么说)小前提才变得清楚。让我们读一下这两段:

这里首先如我们有关的是: 使一个民族等等的大批个人变为可能的自由雇佣工人(只是由于没有财产而被迫劳动, 并出卖自己劳动的个人)这一解体的过程, 在另一方面所要求的, 不是这些个人先前的收入来源和部分财产条件的消失, 相反地, 只是它们的使用有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90页。

^② 同上书，481页。

不同，它们的存在方式改变了，它们作为自由基金转入他人手里，或者部分地仍然保留在这些个人手里。但同样明显的是，使大批个人脱离他们先前的(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肯定关系，把这些关系加以否定，从而把这些个人变为自由工人，这一过程又可能使这些劳动的客观条件(土地、原料、生活资料、劳动工具、货币或这一切的总和)从它们同这些个人(它们现在已同这些条件分离)先前的联系中游离出来。这些劳动的客观条件现在仍然存在，但却以另一种形式，作为自由基金而存在，在这种形式上一切原有的政治等等的关系都已经消失，这些劳动的客观条件已经只是以价值的形式，以独立的价值的形式，与那些已同这些条件分离的、丧失了财产的个人相对立。正是这种使大众作为自由工人来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对立的过程，也使这些条件作为资本同自由工人相对立。历史的过程使在此以前联系着的因素分离开；因此，整个过程的结果，并不是这些因素中有一个消失了，而是其中的每一个因素都跟另一个因素处在否定关系中：一方面，是自由的工人(可能性上的)，另一方面，是资本(可能性上的)。客观条件与这些变为自由工人的阶级的分离，必定同样会在相反的一极表现为这些条件本身的独立化。^①

可见，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产生，是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主要产物。普通经济学只看到生产出来的物品，而把这一点完全忽略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对象化的劳动同时又表现为工人的非对象性，表现为工人之外的异己意志的财产，所以资本就必然地同时是资本家，而有些社会主义者认为，我们需要资本，但不需要资本家，——这是完全错误的。在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这样一点：劳动的客观条件(而这种客观条件是劳动本身的产物)对劳动来说人格化了，或者同样可以说，客观条件表现为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人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97~498页。

财产。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①

在这些篇章里，整个关于历史过渡(危机)的讨论变成了在现代意义上组成阶级斗争的讨论。远不止是“前定的社会形式”的固定方式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清晰度，显现出阶级组成的物理学。现在，被一个自洽的社会学定义和内在于“前定的社会形式”的限制所建立起来的发展的对抗二元论，就被人格化了，也就是被主体化了。在前面讨论过的附录里，作为对危机的同步分析已经促使我们将危机视为阶级斗争的产物。相似地，这进一步的发展促使我们将生产关系的因素人格化，同时将转换和危机视为这些“主体”之间进行斗争的产物。伴随着关于原始积累的分析，“前定的社会形式”的概念变成了“阶级组成”的概念：换句话说，它恢复了主体行动的物理学，建立或摧毁了必然性的物理学。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经常被攻击为是《大纲》中一种既是自然主义又是人道主义的理论态度的残余，也就是说将某种未经批判的马克思(青年马克思)植入到他的成熟思想里。我们应该说这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要害。一般规律带有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味道。对于古代社会和东方文明的分析确实是历史社会学的分支。然而，我们不得不说，随着我们资本主义世界和原始积累的进一步分析，这种模糊性和普遍性显著地增强了。在这里，社会形式的社会学术语以及自洽性和限制的内在标准(它对功能社会学来说是完全合适的标准)一开始就失败了，之后就分解为分离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并没有最初的人道主义。这种充分的需要和发展只是充分的断裂，是分离。但是还有一些更多的东西：阶级辩证法第一次不仅仅显示了其分离的特征，并且进行了实施，接受了进一步的说明和优先的意义。它变成了主体的辩证法，并且我们不能低估这一篇章的政治重要性。我们也就明白了这一由“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508页。

各种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关于危机的分析出现明显中断的原因：在这里，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章里，在关于危机的分析中加以理论叙述之前，主体的概念就已经凭着直觉建立起来。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有必要以它为线索并且预设了在关于流通的部分中已经蕴含着的置换的操作。因此，“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这一章不是《大纲》中突兀的部分，不是其发展的中断；相反，它既是关于方法的精彩例子（甚至，随着它的发展，这一论证纠正了一些一开始的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歪曲作用），又是一个主体性的进程：事实上，在这里就引出了必须形成组成流通的斗争关系并且在这种关系其中形成的关于主体的主题。还有，记好了，在这里主体与之前提到的实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预设无关：相反，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工人的极端异化和革命反叛之间的关系的結果：由分离所导致的短路，在这里，主体是只有差异和总体之间的关系才能解释的逆转（任何自然主义的同族关系）的爆发。

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一点以后再考察。^①

在此，这一分析恢复了明线：资本的流通及其过程。这是把资本社会化当作利润率规律的物理学矛盾的结果而进行的研究。研究的第一阶段注重的是增长的过程和资本生产的社会条件的连续性假设。这是命题在其抽象性的所有潜能中的辩证部分、设定部分和肯定部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511~512页。

货币的流通是一个“永恒的流动”。资本的流通也同样具有这一特征；但是资本以一个主体性的方式构建出其流动性，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创造性的流动。“资本的流通同时也就是资本的生成、它的成长、它的生活过程。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和血液循环相比，那么，这不是徒具形式的货币流通，而是内容充实的资本流通。”^①资本在时空中的流通造就了共生的、更快的、空间上更加全面的流通。被资本推动的流通的组织，形成、组织和支配了生产的社会条件。因此，流通首先是资本潜能的扩展；因为相同的原因，它导致了对所有社会条件的侵占及其在资本增殖中的位置。尽管流通没有创造剩余价值，但是剩余价值的确是在资本流通过程中产生的。甚至是极权主义的流通的资本主义侵占决定着流通作为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直到历史的、有效的（尽管不是逻辑的）伴随着流通的生产的确认遇到限制。“这样把每一生产部门脚下的自然形成的基础抽掉，并把这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条件转移到它外部的普遍联系中去，——也是，过去多余的东西便转化为必要的东西，转化为历史地产生的必要性，——这就是资本的趋势。一切生产部门的共同基础是普遍交换本身，是世界市场，因而也是普遍交换所包含的全部活动、交易、需要等等。”^②在一个完全由资本投资的流通领域内，不只是在被利润率直接剥夺和均值化的部分里，而且在组成了必要劳动的部分里，劳动自身变得统一。比较也发生在劳动力中。“如果把整个社会看成是一个人，那么，必要劳动就是由于分工而独立化的一切特殊劳动职能的总和。”^③资本的流通不断地将必要劳动转化成“社会的”必要劳动。这样，流通给资本及其对立面带来组成了一个自身范畴的实际的置换的资本的内在同质性的结果。资本的社会化是一个在社会共同体的标志下通过流通而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扩展、侵占和同质化过程。“历史地自行产生的需要即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社会需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513页。

② 同上书，525页。

③ 同上书，523页。

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越是表现为必要的，现实财富的发展程度便越高。”^①

然而，有必要更进一步，即使是为了澄清；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也不能以一种形式上的方式来看待这一资本的社会化过程。它表现出来的的是一个实际的过程。资本通过流通和社会化的过程真正地统一起来了。因此，我们必须开始考虑“现实的共同体在资本形式下成长的程度”^②。从形式到现实的预设，这一篇章推演出了对生产的社会条件的征服有效的、功能的、有机的征服以及伴随而生的作为联合力量的劳动。

当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不是由社会收入的扣除，不是由国家赋税创造出来（那时，表现为劳动基金的是收入，而不是资本，工人虽然同人和别的工人一样是自由的雇佣工人，但他在经济上毕竟处于另一种关系中），而是由作为资本的资本创造出来的时候，资本就达到了最高发展。这一方面表明，社会的生产财富在多大程度上资本化了，并且一切需要，其中也包括表现为社会需要的个人需要，即个人不是作为社会中的单个人，而是同其他的人共同消费和共同要求的需要（这些需要的消费方式，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一种社会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交换的形式得到了满足，——还有，这些需要通过交换，通过个人交换，在多大程度上不仅被消费，而且还被生产出来。^③

我们必须更加坚持这一发展。事实上，流通在这里产生了第一个生产性的效果。如果“过程的稳定连续性，即价值毫无阻碍地和顺畅地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或者说，由过程的一个阶段转变为另一个阶段，对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说，同以往一切生产形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524页。

② 同上书，529页。

③ 同上书，530~531页。

下的情形相比，是在完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为基本条件”^①，那么这也是一个飞跃的条件，一个资本本性的突变。在他关于利润的篇章里，马克思特意强调了表现为保证生产的连续性和价值的保存等等的社会条件。但是在这些分析中，资本仍然是一个面对着在生产条件被无偿剥削的社会的主体。但是这种二重性再也不存在了。资本组成社会，资本全部是社会资本。流通造就了资本的社会化。马克思非常赞赏这一通往社会资本的途径，并且强调：“然而却附带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我们在这点上还不能明确勾画出来的远景：资本对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的特有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它对特殊资本及其特殊生产过程的条件的关系。”^②因此就像通往“社会劳动”的飞跃一样，通往“社会资本”的飞跃不是一个一般的飞跃。这是一个渗透着资本范畴的质的飞跃。社会表现为资本的社会。正是通过这一途径，所有的社会条件都被包含在资本里，也就是说，变成了资本的“有机构成部分”。除了社会条件（直接地显示出自身），资本逐渐包含了所有的因素和流通的过程的材料（一开始是作为中介的货币和交换）；其后，所有这些都属于生产过程，所以从工厂到大工业再到工场的途径的基础就存在于此。在它们的转换中包含着这些属于理想化和制度化结构的过程：事实上，通往理想的国家、国家资本主义及其增殖途径的起源就在于此。资本所真正包含的劳动和社会：这是一个从一开始就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进行说明的篇章；一个组成了马克思的探索之关键的篇章；这是一个在《大纲》中十分有力而清晰地表现出来的篇章。这是一个在马克思的工作中起支配作用的篇章；这是一个十分有远见的篇章；对我们来说，这一篇章是极其重要的。

仅仅停留在资本的扩张力这一特性上是不够的。资本是一种关系，是对立的综合；是分裂。这一分析被其对立面所反对，否定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533页。

② 同上书，532页。

肯定相对立。在强调了流通的扩张作用之后，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概念的辩证分析。

流通时间只有从它是利用劳动时间方面的自然限制这一点来说，才决定价值。可见，流通时间实际上是对剩余劳动时间的一种扣除，也就是必要劳动时间的一种增加。^①

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②

时间和空间，在流通中组成了资本扩张的因素之后，现在表现为障碍和阻碍。所谓必须被消灭的障碍——通过将空间减少到时间，通过时间上的快速的转移和转换。但是这还不是全部。我们已经看到了流通如何潜在地成为整个社会。在社会中，在生产力的组成中，存在着其他一系列的由时空关系决定的阻碍。资本被限制在这些阻碍之中。资本必须摆脱这些阻碍才能释放出自身的力量——还有就是颠覆的可能性。

资本把财富本身的生产，从而也把生产力的全面的发展，把自己的现有前提的不断变革，设定为它自己在生产的前提。价值并不排斥使用价值，因而不把特殊种类的消费等等，特殊种类的交往等等，当作绝对条件包括进来；同样，社会生产力、交往、知识等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538页。

^② 同上书，538页。

的任何发展程度，对资本来说都只是表现为它力求加以克服的限制。它的前提本身——价值——表现为产品，而不是表现为凌驾于生产之上的更高的前提。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外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结果就是：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扬弃，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作神圣的界限。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由此而来的是把他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作为支配自然界的实践力量而存在着）当作对他自己的现实躯体的认识。发展过程本身被设定为并且被意识到是这个过程的前提。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不是使一定的生产条件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①

资本的永久的革命揭露了运动的动力。每次当我们看到资本的全球定义的时候，这一图像都承担着逆转。分离，而不是矛盾，使过程前进。资本的扩展看起来是一个表现自身的力量，但是，它是一个每次都要被解决的敌对关系。资本的运动规律不包括某种解决方式；恰恰相反，它包含的是在障碍的不断地再次出现中再次出现的分离。在这里，对障碍的分析必须作为对运动的原因的研究而得到发展。在这里，这一论证根据首先存在于运动（时间和空间）的条件超越之中的三段论而修辞学地发展了；然后，作为确定的（确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540~541页。

的(但也是抽象的)对立的特殊性在关于障碍的问题上表明了自身的肯定性和否定性。这一论证的综合现在必须回到一切事情发生的基础和阶级斗争规律中去。能使资本运动的只有阶级斗争。这一图像被倒转过来了。因此,我们必须回到活劳动的关系中去,看看植入其中的障碍。我们必须通过资本的关系才能确定吗?当然是这样,但是只有将它分离,只有考虑矛盾及其组成部分的复杂运动。所以,

流通时间本身是对价值增殖的限制(当然,必要劳动时间也是限制,但它同时又是要素,因为没有它,就不会有价值 and 资本);流通时间是剩余劳动时间的扣除,或者说,是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相比的增加。资本的流通实现价值,正像活劳动创造价值一样。流通时间只是对这种价值实现的限制,因而就这一点来说,也是对价值创造的限制,这不是由生产一般中产生的限制,而是资本的生产所特有的限制;因此,取消这种限制——或者说同这种限制作斗争——也属于资本的特有的经济发展,并会推动资本的信用形式等等的发展。资本本身就是矛盾,因为它总是力图取消必要劳动时间(而这同时就是要把工人降到最低限度,也就是说,使工人只是作为活劳动能力而存在),但是剩余劳动时间只是作为对立物,只是同必要劳动时间对立地存在着,因此,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它的再生产和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会扬弃资本本身。^①

在此,马克思分离逻辑发展的激进性就很明显了。但是,伴随着一个不断增加的与范畴的复杂程度成比例的力量——又是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关系使这一过程以及资本的扩张及其矛盾——使这一运动的矛盾变得清晰。资本的清晰性是一个使利润增长的关于“限制”的辩证法,是一个剥削的辩证法,这一剥削必须被限制在最大程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542~543页。

的剥削和资本的最大程度的扩展的“限制”之内。资本需要自行增殖的自我限制的原因是清楚的：资本自行增殖的过程是一种必须考虑到组成资本自身概念的分离的战略。发展的限制有一个策略性的作用，这就是它与内在于剩余价值生产中的“障碍”相对立——障碍一开始在流通的层面上被定义，但是在最后的、决定性的瞬间被重新定义，并且在生产领域里，在生产关系的内在性上（也就是说在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分离的层面上）被灵活地重构。

资本迫使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来做剩余劳动。只有这样，资本才能增殖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剩余价值。但是另一方面，资本确立必要劳动，是因为并且仅仅由于劳动是剩余劳动，而且剩余劳动可以实现为剩余价值。可见，资本把剩余劳动作为必要劳动的生产，把剩余价值作为对象化劳动即价值本身的界限。如果资本不能确立剩余劳动，它也就不能确立必要劳动，而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只有资本才能确立必要劳动。因此，资本就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用人为的障碍来限制劳动和价值的创造，而资本这样做，正是由于并且仅仅由于它确立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同一理由。因此，资本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说，会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这种界限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因为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①

根据我的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就是资本本身”这句话的意思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组成资本概念的那些力量的关系，是组成其发展的分离。在这一领域内资本的概念变成了一个战略的概念，一个不断地为了与其控制力量相适应的、适当的、成比例的和扩展的利润的生产而重新校准的计划。限制，方法，比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04~405页。

这是定义了资本主义策略的因素，它们是结晶的图像。但是，在结晶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策略用资本支配的关系限制了生产力潜力的发展。这些限制能够超越最初关系的方式吗？不。在这一模式中，资本将其控制力量扩展到了战争和毁灭中。罗莎·卢森堡写下了关于限制—障碍关系的伟大篇章。在这里，我们要记住的是限制作为与无产阶级与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主义控制的再生产的必要的对立所造成的障碍相对立的策略的结果而成型。

资本的扩张过程和为了克服剥削的障碍以及定义其胜利的策略而必须强制存在的“永久的革命”，倾向于建立起“世界市场”。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遇见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向更高水平、向一个操作和控制的新领域的组成的扩张。我们想在这一主题上稍作停留，就像马克思一样，把它当成一个关于资本的扩张流通的主题的方法的范例。必须立刻强调的是，如果利润是被时间所决定的资本的构成，那么世界市场就是被空间所决定的资本的构成。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市场的组建过程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跟随着利润形成的节奏。在马克思看来，这里存在着一个关于确认这样两个概念的张力：还有这一假设可怕的关联性没有受到在《大纲》中（甚至是在后来的著作中）这一确认并没有被充分说明这一事实的损害。因此，我们十分有兴趣在这里介绍世界市场的辩证概念，因为在这一概念中并且通过这一概念我们得出了一个关于流通问题的新的解释，一个强调迄今为止被投资所生产出来的结果的解释。

现在，尽管已经有了一本专门讲世界市场的书，世界市场还是在《大纲》的前几页中显示出来（已经在货币章中出现），并且在每一个基础性的篇章中不厌其烦地重复出现。对于这一主题的解释也同样遵循着一个三段论的逻辑节奏：肯定，否定，综合。肯定意味着关于世界市场的组建过程的线性描述，也就是“世界市场的独立化”^①。在这第一步里，一切其他的因素通过肯定被集合在一起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10页。

是混乱地挤在一起。这里，对线性机制的主体性的描述与其必须克服的障碍结合在了一起。这样，讨论变得越来越缺乏耐心。“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这种联系的形成同时已经包含了超越它自身的条件。”^①还有一个关于共产主义的篇章，关于人的自我实现了的篇章，在这之后立即出现了。论证的高密度不应该成为混乱的理由；这里有一个将他们组织起来、加以澄清的线索：事实上，否定和综合——取代——颠覆都显示出来了。这一论证已经扩展开去。但是我们不关心这一修辞学和推论的运动：我们关心的是实质，也就是说，作为主题的障碍的出现。这一障碍在流通和生产的层面上都出现了：在流通的层面上是作为一个平衡的区别和子序列的全球化过程出现，在生产的层面上是作为将生产方式带回到一个均值化和媒介的物质操作上去的不可能性而出现。在关于“货币和世界市场”的篇章中，马克思强调了“货币”是如何被它与世界市场的对立所阻碍，并且考虑到马克思所处的帝国主义发展阶段，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困难、障碍和区别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国际交换的层面上，“货币不得而被非货币化”；还有，“就像过去一样，它获得了一个政治头衔和名称，一个区别。在不同国家的语言”，因此它失去了自身的“象征性”特性并且再一次变成了“通用的商品”。但是其价值的经济衰退时期引发了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发展总是趋向于世界市场，即使是在缺乏足够控制工具的情况下。资本不满足于仅仅克服自身的障碍，它还想克服自身的限制。这样，所有的矛盾都被设定在运动之中，“世界市场”代表了很多方面的“结论”。“这样，世界市场再一次基层的和全部的预想。”这就是“废止”（aufhebung），与生产相对立的流通的普遍危机。我们要记住我们还停留在货币的水平，这一描述还只是暂时性的，但是稍后在《大纲》里，关于世界市场——平衡——废止的关系的论证将会转换到一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11页。

优先的水平上。发展的直线性现在直接展开到生产领域中——走向国际货币。当然我们不能说“普遍资本”，那将是“无”；但是我们可以说作为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的“永久性革命”的观念的方式的“一般性的资本”。在这一领域内障碍已经变成了一个契机，一个关键的契机，一个通往资本组织更高阶段的真正途径。线性的发展只是一个理论假设，然而尽管有无数的障碍，平衡的真实性、价值的比较和均值化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但是再一次，过程的结果显示出矛盾的最高潜力。

这一论证应该再次得到发展和总结。在《大纲》中存在一个不断趋向世界市场的张力，一个在流通和生产领域中配置资本的扩张力量；一个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张力。有时，考虑到他是那么强调过程的直线性 and 资本的文明作用，也许人们会合理地将马克思看成是犬儒主义者。这一章里的内容在后来的著作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在《资本论》中。这一著作经常被当作独一无二的：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的维度中，都是作为直接后果的关于发展的阶段的理论。但是这一张力不是独一无二的：相反，它完全依赖于由（无产阶级的）障碍所造成的机制与其相互关系必须被仔细研究的（资本主义的）限制。资本主义的流通和扩张需要一个无穷的、真实的关于经常被客体化为资本的扩展的社会的条件的取回。这一取回是障碍的过程：这是一个经常被更新的利润的均值化形式、平衡和比较、一般利润经常更新的定义。在论证的节奏中，否定紧随着肯定。我们现在必须关注一下经常被资本实现的更新的均值化，经常被更新的、自我强迫的限制（资本经常是“不成比例的比例”或者是“均衡的不均衡”）——这样，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一过程。一方面，我们发现了资本急不可待地想要加大投资和控制的力度：这是已经实现了的帝国主义阶段——并且这是必须实现对其基础的取代——颠覆的领域。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资本的这一空间扩展只是一个一般利润组成的更广泛的过程而已：内在于利润中的矛盾和强迫自身的组成力量的对抗正在于此。这样两个过程是并行的：它们在它们空

间的、外延的和内涵的维度上引出了辩证法的第三个阶段，引出了废止。我们知道这一说明性的形式是抽象的；但是它能告诉我们有关资本运动及其占领世界的极端趋势。在这一领域内所有的矛盾都深化了。这样，在分析之中，我们必须强调这些复杂性并且看一看关于世界市场——平衡——废止的辩证法每一次是如何被具体化的。每个具体化的层面都带来不可思议的分析领域的丰富；因此，每一个具体性都包含着一个分析的全球性置换。在马克思的分析的限制的方法中，帝国主义进程仍然与一个无限的“边界”相对立，也就是说它仍然从客观上决定了与一个国家的现实和未来密切相关的危机所产生的时间。我们面对的是（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谈到了我们这里解读出的假设）一个被大大发展了的剥削多元的现实。因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世界的资本联合以及在资本的发展中实际包含世界社会的程度越高，与剥削、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的内在主题相对应的帝国主义空间就越加扩展。由于马克思的方法不是针对某一特定的时间段，而是超越了局部的时间之上，因此被保存至今。资本的扩展、帝国主义化的过程及其通往世界范围内的剥削的一般方式的组建的扩张，同时是革命主体性条件的结果和前提。资本的帝国主义扩张还显示出了逃离它所憎恨的内在于其定义中的作为资本的对立面的企图。矛盾和对抗是使资本趋向矛盾和对抗的更高水平的动力。每一个结果都是前提，是一个新的基础。每一个资本在其历史性发展中强迫自身调整的“限制”，都是一个新障碍的叛逆基础。这一无限的过程只有在阶级斗争中才会遇到阻碍。但是流通过程已经如此广泛和强大，以至于它不仅将资本流通暴露出自身的总体力量，而且作为特权领域显示出与之相对立的力量涌现。世界市场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革命趋势的最成熟范例。

“社会资本”是资本的扩张力量在流通领域中并超越流通领域之上被固定化的形式。作为一个扩张性的力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还是并且首先是一个总体性的力量。在这一关系中，社会资本是发展的主体。在流通过程中，资本将自身看成是社会性，看成

是在自身发展中的吸收能力。在一个更加确定的方法中，它是一个更加社会化的生产力。这一把它的综合赠予资本的主体显示出资本本身通过包含的过程和一个更加连贯的、彻底的征服社会的行动过程被实现。生产的模式被改变了。最初，资本聚集了社会中的劳动潜力并且在制造业中对其加以重组。大工业，一个更进一步的阶段，显示出一个社会资本已经将自身作为主体，也就是说它已经预定了生产条件的生产情况。工作条件和劳动过程被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所预定：从一定量开始(作为“社会资本”的资本构成)，再也不可能区分出劳动和资本，劳动和社会资本，以及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了。只有生产出资本的劳动才是劳动。资本是劳动和生活的总量。

拜比吉说，“知识和经验的这种不断进步，是我们的伟大的力量。”这种进步，这种社会的进步属于资本，并为资本所利用。一切先前的所有制形式都使人类较大部分，奴隶，注定成为纯粹的劳动工具。历史的发展、政治的发展、艺术、科学等等是在这些人之上的上层社会内实现的。但是，只有资本才能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①

让我们跟随着马克思的清晰的思想脉络而继续前进。上述引文之前的篇章是一个在《资本论》第一卷和从细节上讨论了从制造业到大工业，劳动的形式上的征服到实际的征服的没有出版的第六册中的广泛的讨论的总结——总之，这些篇章组成了一个简洁的但是完整的关于连续的范畴置换的主题，这一主题与马克思构思的特殊的历史篇章(从制造业到大工业)有关，但也同时显示出他的分析方法和每一个后来的篇章的定义(那些我们看到的篇章。)

工人的联合——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基本条件的协作和分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592~593页。

和一切劳动生产力一样，即和决定劳动强度因而决定劳动在外延方面实现程度的力量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因此，劳动的集体力量，它作为社会劳动的性质，是资本的集体力量。科学也是这样。分工，当它表现为职业的划分和与之相应的交换时，也是这样。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所以，工人的联合，像它在工厂里所表现的那样，也不是由工人而是由资本造成的。他们的联合不是他们的存在，而是资本的存在。对单个工人来说，这种联合是偶然的。工人把自己同其他工人的联合，同其他工人的协作，当作异己的东西，当作资本发生作用的方式。资本只要不是出现在不适当的形式下——例如规模很小的、亲身参加劳动的资本形式——，就要求有一定程度即较高或较低程度的积聚。一方面，是客体形式的积聚，即在一个人手中积聚了（在这里积聚和积累还是同样的意思）生活资料、原料和工具，或者用一句话说，积聚了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的货币；另一方面，是主体形式的积聚，即在资本指挥下劳动力的积累和劳动力积聚在一点上。不可能每有一个工人就有一个资本家，相反，一个资本家却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工人，而不像一个师傅有一、两个帮工那样。生产资本，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只能有两种形式：工场手工业或大工业。在前一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是分工；在后一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是劳动力的结合（具有相同的劳动形式）和科学力量的应用，在这里，劳动的结合和所谓劳动的共同精神都转移到机器等等上面去了。在第一种情况下，工人（积累的工人）数量同资本的数量相比应该很大；在第二种情况下，固定资本同大量共同劳动的工人人数相比应该很大。^①

将来，马克思会彻底地（即使是从术语学的角度来看）将从事实上到实际上的包含具体化。在这里，资本是真正的主体，它是一个总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587~588页。

的社会力量。流通给予了我们第一个主体。马克思的论证就是在这一对抗的因素的主体性上出发的。资本从来没有被客观地赋予这样一个定义。

但即使在这里，我们也不再可能区分出劳动和资本，无论理由是如何的明显。另一个主体即工人阶级主体一定会涌现出来，因为资本主义的征服没有抹去他的身份，只是控制了其行为；这一主体一定会在过程所导致的社会资本的总体力量的水平上涌现。如果一方面资本是主体，那么在另一方面，劳动一定也是主体。

首先，劳动一定是一个被其与资本的关系所改变了的主体。在资本征服劳动的连续过程中，资本改变了阶级组成，使它在资本的统治下达到一个更高阶段的统一。其次，“他们的劳动的联合，表现为一种特殊行为，与此同时，他们劳动的独立分散性仍然存在。这就是作为资本的货币同自由劳动相交换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消除这许多工人的独立分散性。这时，在交换行为中，一个资本对这些工人来说不再只是表现为社会集体力量，把许多交换联合在资本中，而是在它的指挥下把工人集合在一个地点，一个手工工场内；资本不再让工人继续停留在它所遇到的那种生产方式中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权力，而是创造一种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作为自己的基础。资本使工人在生产中联合起来，这种联合一开始只在于：有共同的地点，监工的监督，统一的规章制度，较严格的纪律，连续性和已经确立起来的在生产本身中对资本的依赖性。同时从一开始便节省一定的生产上的非生产的费用（关于这全部过程，见加斯克尔的著作，他在书中专门考察了英国大工业的发展）。现在资本不仅表现为工人的集体力量，他们的社会力量，而且表现为把工人联结起来，因而把这种力量创造出来的统一体。”^①在这里，我们还不能做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区分，即使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看（这是联合的阶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589~590页。

后来，情况却有所变化。我们拥有一个工人阶级的联合，尽管是被资本所创造出来的。它让我们摆脱了个别工人的孤立并把我们带到了利益统一的水平上，这是政治联合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见，资本一开始就表现为集体力量，社会力量，表现为分散性的扬弃，先是扬弃同工人交换的分散性，然后是扬弃工人本身的分散性。工人的分散性是以他们的相对独立性为前提的。因此，工人完全依赖于资本，完全脱离生产条件，是以他们聚集在作为他们生存的唯一基础的个别资本周围为前提的。”^①

现在，更进一步，这一被资本支配的客体化过程，开始揭示出一个新的工人阶级主体性水平。一个质的飞跃诞生了：工人阶级行动的联合开始变成自我充分的。资本的社会化面临着工人阶级对抗的叛逆。工人阶级主体性被以下事实揭示出来：（1）资本所创造出来的统一体允许工人打破与资本的交换关系。在资本主义过程中，交换关系被两个阶级力量的关系所代替了。

如果竞争使工人能同资本家讨价还价和争执，工人就要按资本家的利润来衡量自己的要求，并且要求在他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得到一定的份额；于是，比例就成为经济生活本身的现实的要素。其次，在两个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而出现）中，衡量它们相互之间的差距，即恰好是通过工资本身作为比例表现出来的差距，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事情。交换的假象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消失了。^②

（2）除此以外，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被交换关系在工人中不是有效的这一事实所揭示出来。对此，我们在下一讲中将会详细地讨论。现在，我们只是将其作为工人和资本之间的交换关系的重要补充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592页。

② 同上书，600页。

简单提了一下。

关于流通的篇章至此得出了第一个结论。资本主义趋势与工人阶级的趋势并存，通过流通而实现的交换关系的扩展与其毁灭并存。社会资本的组成首先是在其社会发展的层面上被资本统一起来，其次是从其自身的角度，即从其本身的物质组成的角度来看，是由于作为工人的联合存在的基础而存在的交换关系的毁灭而凸显出来的工人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因此，我们看到了与资本的总体力量及其扩展形式的对立的爆发：一个新的主体出现了。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新主体的系谱学，他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对于研究和现实的置换的分析模式。资本的有机构成没有附加工人阶级的政治组成，但是它作为其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而存在。再一次，分离辩证法被置于方法论的逻辑和现实发展的核心。对于流通的分析的合题，向我们显示出一个极端的、充分的对抗的发展，尽管这种发展在这里还只是处在初级阶段。让我们跟随着马克思和《大纲》的思想脉络继续前进——我们将会有惊人的发现。

第七讲 工资理论及其发展

□再论资本主义运动的对立形式：《大纲》的本质连接。

□论工资及其引发的争论：它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地位论作为基础和发展的工资。

从工资到主体。

□流通和小规模流通。

货币和小规模流通。

流通理论中的分离逻辑：工资理论，主体理论的引导性思路；它允许我们给予此理论以新的基础。

□《机器论片段》：劳动中的分离逻辑。

主体的集合力量和共产主义革命中社会个体的组成方式。

□伪装成结论的笔记本：价值理论的变形，主体的道路，方法论的证实。

我们必须深化在第六讲中所展开的分析与结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对立形式，分离理论的急速发展，说它是证明，其实可能更像是一种描述。如今的问题是达到再现(neue Darstellung)的层面，在这一层面上所有的证明的环节都被重新表述。这个问题旨在查明资本的对抗性不仅仅是一个结果(结论)：这是一个结果，但是这一对立形式也很关键，是发展的一般特征。从这个角度可以明确看出，指引我们得出社会资本定义的构成过程必须完全颠倒过来。如果我们坚信马克思的方法简明易懂，这一点就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方法我们在整个论证过程中反复提到，它提议将剩余价值主题作为基本法则来充分展开。这赋予了社会资本概念鲜明的二元性和对抗性的标记。这使我们有第二次机会去解释这一法则：资本主义社会化愈是

扩张，它的对抗性(在质上)就愈是加深，(在量上)就愈是增长。这一特定期限里的综合体融合了利益法则的基本矛盾。《大纲》的结构事实上是基于连续性的发展阶段的接合。这里我们进入马克思论证的结论阶段。在剩余价值理论或剥削理论的扩张效应——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等章节中——第一次是共时性的比较，第二次是历时性的比较——完成这些对他们的报告和例子所必需的比较后，便是结论阶段。在一个社会的、集体的且全面的新空间中，这些效应得以发展。对抗的法则现在必须出现在它所有的原创性和所有的力量之中。在增殖的过程中，当它达到极权主义的规模时，必须允许无产阶级的自我价值稳定过程出现。它必须允许自己的对立性以其最大的潜力发展起来。以下的几页，我们将详尽地分析马克思观点的表述。它那很能解决问题的特质将清楚地表现出来。可以说，《大纲》是以“机器论片段”(这正好是我们在本讲中展开分析的前提)结束，因此马克思论证的逻辑性达到完满。在“机器论片段”之后的章节(几乎都在第七个笔记本中)大部分是这些结论的补充。在其他更早阶段的研究中开始的论证过程中，有各种不完美的观点，后来的章节是它们的深化和发展。这些材料当然非常重要，但不是关键性的。因此我们停留在第二部分的核心基本表达，资本流通理论代表了《大纲》分析的另一面。让我们继续我们在第六讲中留下的文本。马克思的分析在这里进展迅速。起起落落的波浪推动论证继续进行。如今已退潮的波浪给我们带来社会资本，并且在落潮时揭露了它的对立面：工人阶级主体性。让我们去发现这一种处在最成熟形式的分离理论：此处资本凝聚度最强，这和马克思的步骤是一样的。

隐藏在工资形式背后的是必要劳动及其创造性——这是我们仔细思考工资理论所学到的。可以在每个剩余价值法则运行的地方找到被隐藏的事实——但它仍然如一个富有成效的推力一样独到而且强有力。它参与了法则运行的全过程。这意味着，为了获得劳动阶级的主观能动性，为了阐明这个角色，我们必须首先探究工资的形式，才能打开那隐藏着价值的生命力的外表，揭露价值的实质并给

予它资本的生产力这一形式。从本质上说，这意味着要发现工资运动的法则，即独立(或相对独立)于商品的整体流动而自己发展的法则，它能指导我们通向那被掩藏起来的事实。正如我们所见，这一方案存在于《大纲》的“概要”中，存在于马克思的研究发展计划里。然而，在《资本论》的草稿中，它消失了。这本特殊的著作本欲致力于研究工资问题，然而作为独立的一本书它却在《资本论》中消失了。原因何在？罗曼·罗斯多罗尔斯基(pp. 57-62)曾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或者说提出了两个问题：(1)该书本应展开的主题是什么？(2)为什么马克思放弃了专门写一本《雇佣劳动》册的计划？罗斯多罗尔斯基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令人满意，但是第二个就稍逊一筹。我们以后将继续回到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看看这本关于工资劳动的书中本将探讨的几个主题。我们要列一张表来进行漫长而仔细的分析。以下是最重要的内容：

《大纲》，P264，175。工资作为无产者直接生存的形式——在流通中——和其他两个阶级。

《大纲》，P281-282，193-194。工资的形式。计件工资：它所包含的参与的幻象的去神秘化。

《大纲》，P398-401，302-304。工资和全球人口的关系，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关系。对必要劳动的支付即社会总体性再生产的支付。

《大纲》，P416，319。作为活劳动力量的交换价值的限制的必要劳动(工资的下向的刚性?)。

《大纲》，P424 和脚注，P329。另一方面，论必要劳动的限制的工资的削减的法则。工资形式的历史演进。

《大纲》，P464-465，368-369。再论工资形式的历史演进：对作为等价交换显现的的工资的去神秘化。劳动力作为工人的“私有财产”。

《大纲》，P520-521，420。“小范围流通”，工资作为流通领域中的收益。

《大纲》，P607-608，501。工资和工人的过剩。

《大纲》，P817-818，702。最低工资的假设。这一假设在分析展

开中的流动性。

鉴于这些要点以及其他根本问题(例如将具体劳动归结为抽象劳动,将特殊的人类劳动归结为普遍无差别的平均劳动)。在熟练工人这一问题上,罗斯多罗尔斯基转向讨论第二个问题,并且推断说,马克思之所以放弃写关于工资的专著,是因为“资本与雇佣劳动这一严格的种类区分设定了旧的固定架构,只能将其上升到某一特定点后放弃”。这就意味着,必须把以上列举的所有主题都看作是位列于资本分析之后的要素。

但这不是真的。正如我们已经在各处强调过的那样,对于这些主题中的一部分而言,这不是真的,而且我们也将看到,对剩余的主题而言也不是真的。从整体上看,这也不是真的,因为所有这些要素不是从属于资本的法则,而是必须被看成是从属于阶级斗争的法则。正如我们所见:“比例就成为经济生活本身的现实的要素。其次,在两个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而出现)中,衡量它们相互之间的差距,即恰好是通过工资本身作为比例表现出来的差距,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事情。交换的假象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消失了。”^①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需要重申这个问题。罗斯多罗尔斯基所作的评价能够帮助我们,尽管他自认为这一评价是次要的。他指出,严格地说,将具体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以及将特殊劳动力转化为平均的社会劳动力并不需要工资的参与。这些转化牵涉到剩余价值理论的细化。因此它们是资本理论的基础。基本的转化,是的,它真正称得上是基础:为什么重复它呢?我们可以对罗斯多罗尔斯基浮夸的问题作出回应。我们必须重复这些基础,因为马克思发现的剩余价值(还有找到的那些转变),它们的基本特征无法在这本关于资本的书中得到详尽阐释。因为,每当这个基础要素出现,它就强行将一个不同的逻辑环节加诸分析,即与万能的辩证法相反的分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600页。

辑(the logic of separation)。从这个角度上看,也许我们应该这样说,若《雇佣劳动》册没有写,那不是因为它——在资本理论的水平上——所要讲的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相反,原因其实在于整个资本理论只能在自身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得以发展。前者始终涉及而且包含后者。我的观点比较极端,我知道:从第一章开始,我就已经为这样一本包含关键的充满歧义、言语模糊的《雇佣劳动》的缺失而扼腕叹息。但现在,此处也许我们可以说,除了马克思自己,这一模糊的语言几乎难倒了所有的马克思解读者们。

让我们转向问题的核心。具体劳动转型为抽象劳动,有差别的熟练工人转型为平均的普通工资,在这些范畴中,《货币章》是奠基在《资本章》之上的,这两个变化并非同步进行,根据已知的事实:这是一个趋势——一个对立的趋势。高绩效的劳动力、劳动能力并不能构成资本赖以产生的固定动力:它们存在于资本连结链的始终,它们以一种对立的方式存在于所有具体的资本形式之中。阶级之间力量关系的形成——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以一种真实且集中的方式表现了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一开始就呈现出的内容。资本流通零星且偶然(作为平均因素)地进行干预,使概念的二元论得以迸发而且采用主体的双重形式。它总是在同样的基础上,在一个从未中断的持续过程中。没有一种资本能够从这种对立性中剥离出来,从这种永恒裂变的变化状态中脱离出来。我们也不能让一种假定的工资理论从属于资本理论。当工资的确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现时,相较一串在《大纲》中明确展开的主题,它看起来像是“独立的变量”。它的法则从《大纲》出发,主题是抗议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它们直接把自己展现为宣告独立的章程。一旦工资被引入,整个分类系统就像它的存在一样必须因此而改变。我们必须从采用绝对剩余价值转向采用相对剩余价值,从形式上的包容转向真正为资本社会包容。必要劳动价值的增加是工人为工作日以及工作日减少而进行斗争的成果,它要求整体取代资本积累以及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绝对形式。资本理论的基础始终被迫屈从这种动力之下。

只要一涉及这些范畴，这就是真的。但是还不充分。无论如何工资必须一直出现，这一事实作为一个变量独立于资本过程，它引发的一连串效应我们在任何发展阶段都能追踪到。关于工资的这章不仅仅是绝对的基础，而且是指引人们了解马克思资本理论发展的主线。在我们成功定义第一个范畴内的主题的重要时刻，我们必须处理它们在历史上的变题以及它们的特别决定：这里工资的观点居主导地位。反对意见一开始就已给出：“资本的一部分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这可以看作一个特殊要素，而且必须看作一个特殊要素，因为劳动市场不同于产品市场等等，它是受另一些规律支配的。”^①这里，主要问题其实是必要劳动，它愈发彻底地（甚至在更加不可逆转的层面上）固定自己的地位。而所有这些都“属于工资那部分”。“其他法则”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分离逻辑占主导。换言之，就工资的社会数量而言，它是一个独立变化的量。它的刚性不可动摇且体现在分析中。这种刚性真的可以改变。让我们假设，比如，为了获得忠诚，在利益法则中将必要劳动力束缚在必要最低工资上。这只是一个完全抽象的假设。事实上，我们必须历史地学习这种基于真实力量关系之上的刚性。“固定的前提本身在展开分析的过程中全都会成为流动的。”然后在实践中，“必要劳动的标准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会多么不同”。正相反，对资本来说，“在任何一定的时期内，资本都必须把这个标准看成是一个固定的量，并把它作为固定的量来加以利用。对这些变动本身的考察，完全属于论述雇佣劳动的那一章。”^②

但是，这些相互矛盾的主张之间的对比表明了一种可能性——是的，就是阶级斗争的事实。只要数量、质量、必要劳动力的价值对资本而言“必须”是一个固定的规模，工资就是一个独立的变量。由资本主义关系构成的对立性在这种矛盾关系中进一步发展。别无选择：资本只能通过分离逻辑而完善成熟。不论什么是真正的活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5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225~226页。

可变，工资、固定资本以及必要劳动之间形成了分离的极致点。它的价值并不是一次性决定且不适用于所有作为交换，但是当它无法成为对无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则是阶级斗争的结果。独立性决定了斗争，决定了可能性与发展。是斗争加固了必要劳动力的价值并且把它装扮成历史的独立实体。综合考虑到需求、行为以及效果等要素，我们不难发现，只有斗争成功地进行了修正和发展——根据活劳动力所有的潜在价值，这作为一种历史性变化已经完成，可能性总是与高效的资本转变相联系。让我们检验一下活劳动的力量：为了更好地衡量它，在工资的形式下它只展现了它自身的维持中令人难解的那方面，还有资本需要的这种稳定性。一旦我们超越了资本强加的必要性，我们能从工资内，还有越过工资看到活劳动力的心悸，看到他们在整个社会现实里，带着所有敌意的力量在颤抖。这一点我们在马克思每个阶段的论证中都能够看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时每刻，我们都能够感觉到这种永无止尽的悸动。这个问题的错综复杂令人晕眩。“资本逻辑学派”主张拥护资本控制一切发展的力量，看来只要我们拒绝对这个学派最客观的阐释，我们也必须避免主体性之路，因为它将资本归咎于最简单的对象化。但是我们对那些理论上的剑拔弩张——可怕的简单化——并不感兴趣。相反，真正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过程的含糊性、解决办法的匮乏以及在这一水平上所有控制法则的枯竭。在《大纲》中，我们能够在这种力量关系的极度变异下阅读每一段理论。我们能够理智地对《资本论》在这个问题上的不确定性表示遗憾：那本书只给出了一个破碎的解释。它仅仅展示了特定类型的发展，即这个单一整体的一些片段。《资本论》没有给我们而《大纲》的确告知我们的，是在对抗性已确立背景下的全球化的规则。工资、必要劳动力的数量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它也从总体上决定了基础法则，包括必要劳动力的创新功能及其不可抵挡的上升趋势。自工资理论成为一种条件以来，它就成为发展规律。如若没有得出分离主导整个过程的结论，我们就不能阅读《大纲》（作为一种对历史进程的预期）。在工人们看来，

这种分离是一种对历史上已存事实的强化。这是自由主体的有效力量，它主宰着它的领域。

分析往下进一步进行。以工资形式包裹工作的这层神秘面纱已被撕破，如今我们需完全揭去这层面纱。随着我们一步步推进，所有我们强调过的元素就在这里汇集起来，形成了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联合体。首先，活劳动力是发现全部生产活力的真正关键，也是将自然转化为历史的原动力。请记住在开头几页的分析中所提到的：当金钱开始代表那公认为强有力的社会需要时，活劳动是怎样在这之前便开始不知疲倦的增加？请记住，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活劳动是怎样采取了“真实的”抽象、工人社会、生产的中介这些形式的？抽象劳动力的红色威胁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劳动越是抽象和社会化（这是代替分析的第二要素），需求的空间也就愈大。劳动创造了自己的需求并且迫使资本去满足这些需求。需求的进一步增长使一致性更加具体化，抽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过程创造了在差别性基础上的普遍性，它们也变得更加具体化。工资是在这些基础上形成的——此后很明显，为了将个体性神秘化，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强化的大量必要劳动也是工资的基础。第三个要素：这种个体性倾向于变为主体性。这就意味着，必须激活需求及其构成的个体物质性之间的联系。资本之间的关系打破了为经济上的必然性所征服的状态而焕发生机，而唯一的途径就是让物质变得活跃起来：作为一种行动，一种潜能(*potenza*)。这种潜能就是主体性，它不可减少。资本被迫将自己视为一种关系、一种比例，一条强加于分离的规律。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就是双方的斗争。从此以后，阶级斗争与政治便成为经济理论的核心。如果剩余价值理论将剥削的事实引入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流通理论则介绍了阶级斗争。在这一阶段，我们能够完全理解《雇佣劳动》一册对马克思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是从经济转到政治的理论原因，这是将政治性的概念浸入到经济学之中。剩余价值理论提出并描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单一形式；这是一个有关分析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于有机的、经过充分发展的成熟的

资本关系的问题。所有的威胁都集中起来了。正如我们之后将看到的那样，马克思在此发现的成果是不可估量的。由于马克思著作中主线被分割，要彻底理清它也许并非一件易事：如今，在我们面前打开的广阔领域中，我们能更加轻松地前进。《雇佣劳动》的主题也是唯一主题，即从工资到主体，从资本关系到阶级斗争。马克思没有就工资单独写一本书，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不断地回归这个主题。它孜孜不倦地寻求触及阶级斗争、颠覆、革命。现在我们必须来检验，工人主题是怎样发展出一个独立的逻辑。

让我们从第六讲中留下的地方（即关于“小规模流通”那章）开始着手分析文本。这里，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关于从主体性的角度颠倒资本观的可能性的直接例子。而这一可能性是否能够发展，显然取决于历史上阶级关系如何。这里我们想要强调的是，这些术语大致说明，无产阶级具备在资本中独立的理论可能。

“我们可以在作为总过程的流通中，把大流通和小流通区别开来。第一种流通包括资本从离开生产过程到它再回到生产过程这一整个时期。第二种流通是连续不断的并且总是和生产过程本身同时并行的。这是作为工资支付的、同劳动能力进行交换的那一部分资本。”^①这个第二个小规模流通的特征是什么？它有什么影响？首先，在小规模流通的范围内，必要劳动的价值是被预先决定的而且可被再生产出来。“包含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时间，即生产活劳动能力所必需的时间，同时就是再生产——假定生产力水平不变——劳动能力即保存劳动能力所必需的时间。”^②这种生产力量的生产和再生产守恒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存在于流通中。这意味着“表现为工资的那部分资本的流通，是伴随着生产过程而进行的，作为经济的形式关系和生产过程并列，和生产过程同时进行并和它交织在一起”^③。这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68页。

② 同上书，68页。

③ 同上书，70页。

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交易和剥削并不会抹杀无产阶级主体的独立。更准确地说，一个不可删减的、任何事物都无法将其夷平的主题，它的出现的典型特征就是因流通形式的双重性而产生的复杂性。与这一主题相关的价值概念影响着资本主义过程。“在资本的循环中，只有在这个环节上才有消费直接加入进来。”^①生产性消费？这不是一个关于进入这一不确定领域的问题。我们必须干脆且一直强调关系上直接的、难以解决的那一方面。它存在于马克思所有的深思中。“可见，流动资本在这里是直接供工人个人消费的；完全是供直接消费的，所以以成品的形式存在。因此，如果从一方面说资本是产品的前提，那么成品也是资本的前提。这从历史上看就是：资本并不是使世界从头开始，而是在资本使生产和产品从属于资本的过程以前，生产和产品早已存在。资本一旦活动起来，以它自身为出发点，它就不断以自身的各种形式——可消费的产品、原料和劳动工具——作为前提，来不断以这些形式再生产自身。这些形式既是资本自身所要求的条件，又是它的结果。资本在自身的再生产中生产出它本身的条件。因此，在这里，通过资本同活劳动能力以及同保存活劳动能力的自然条件的关系，我们看到，流动资本也是从使用价值方面被规定。”^②

就它的使用价值而言：这是形成这种关系难以解决这一特性的基础。必要劳动力接触产品并通过它们自身的耗费，将其转化为使用价值。只有必要劳动力有能力对抗它自己对于资本主义稳定物价措施的抵抗力，一种自我守恒与再生产的抵抗力。这种抵抗力并不是简单地由一种固定性构成，它自身更是一个流通、运动和增长。“因为支付工资是一种和生产行为同时的和并列的流通行为。”^③同步性与平行性突出了工人主体的独立性，它的自我价值稳定措施与资本主义的物价稳定措施相对而立。现代经济学家将这两种形式相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70页。

② 同上书，70~71页。

③ 同上书，72页。

的物价稳定措施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一个双螺旋或者平行线；这一过程无论如何总是包含发生危机的正式可能，而学者们知道有多少危机是由这一过程决定的。而且随着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也一直在增加。这不再是一种辩证的关系，而是一种敌对关系，尽管它总是受到控制，但却充满危险与反叛。资本无法将自己从这一关系中分离出来，而且必须安抚稳定它。而为了达到这一点，资本又得屈就于这种关系，无论是在它的抽象形式上还是在它的内容上。“资本和劳动能力之间的小流通。这种流通伴随着生产过程并表现为契约、交换、交易形式，而生产过程就是在这些前提下进行的。进入这一流通的那部分资本——生活资料基金——是真正的流动资本。这种资本不仅在形式上被规定了；而且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即它作为可消费的和直接进入个人消费的产品物质规定，也构成它的形式规定的一部分。”^①工资的两面性消失了。它看起来更像是作为工人收入完全改装了的形式；它否认所有的补充以及对资本的尊重，并且以与之对立的姿态出现。马克思坚持且强调小规模流通的活力，这对我们非常重要。理论假说如往常一样既严密又灵活：在象征性的趋势方面严密；在它经历的历史关系方面灵活。从最后一点看，在展现在马克思面前的这一阶段上，资本主导着小规模的流通并且在整个流通过程中修复它。基于这一事实，马克思频繁地将话题回归到这个过程的真正环境中，坚持适时地表现他敏锐的历史感。对此我们不应感到惊奇。但是这绝对没有减损小规模流通携之出现的这种敌对力量：这不仅是作为事实，而且是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过程，一个趋势。正是这一段从事实到活跃的过程描述了小规模流通的特点。我们已经在理论上看到了劳动力的创造性力量如何成为主体；现在我们能知道这个过程具体是怎样完成的。在小规模流通的空间内，与必要劳动力相关的需求得以发展。因此，它采用一形式并且不断积极地构建自己，让自己在劳动力力量以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74页。

劳动阶级的混合体中得以巩固和强化。它进行自我再生产并增长壮大，最后将自己定义为斗争的潜能。

这里产生了几个问题。首先便是这里所描述的构建联结的深化。第二个问题便是去分析整体的敌对性后果，它源自无产阶级主体完整形式中的第一幽灵。现在不是深化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我的研究所及，在我的书《论国家形式》(Milan: Feltrinelli, 1977)中的最后一部分，我已经尝试正式提出其中一些问题。我们会经常回到这些点上来，但总是匆忙带过。然而，我们还应该记住，此处我们正在触及马克思主义政治辩论的核心。这些问题该怎样展开呢？正是该问题区分出了革命派马克思主义者。眼下我的研究并不怎么涉及大家更倾向于哪一边的问题(假设这种类似的理论状况存在)；我只想强调，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只能各走各的路。对马克思而言，对自我价值稳定措施这一词的历史性判断是客观的。而对于我们而言，在工人与无产阶级达到的写作水平上，这已经变得完全主观了。这意味着所有的关系都是由意志决定的，所有的决策都创造了一种发展，所有的片段对整个趋势而言都有意义。此外，自我价值稳定措施的基础已经扩大到我们能够将这一革命规划定义为建造基于阶级活力的反对力量。一种具有活力的力量。说是具有活力的力量，是因为使用价值对无产阶级而言是一种直接的重新辩护，一种直接的权利实践。必要劳动只能以力量这一术语来定义——即使这是一个纯抽象的定义：严格死板，不可逆转，自命不凡，危险的暴动意识。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对于定义小规模流通不可或缺。从这一趋势上看，双重性是完整的：这是一个新的力量宣言。双重性是资本危机的现状，或者，不管怎样，它都是资本发展过程中危险的偶然。

让我们来检验这一点。我们已经超越了马克思。这关系到一个问题，即大量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马克思。这些理论问题至少使我们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客观主义(经济)立场与主观主义(政治)立场的分裂感到遗憾，之后也使我们的批评缺少一个适当的足够政

治的角度。马克思被视为客观主义者和经济学者，并被解释成消解革命行为的思想家。因此，必须在用马克思的整体性精神超越马克思，超越令人窒息的传统正统性。我们不想否认，仅仅局部的检验就能够找到马克思的思想中明显独立于这个研究整体的那几方面。我们也不想否认，人们仅仅透过客体主义的眼镜就能够阅读马克思的大量文本（特别是那些第二国际在德语世界编辑出版的文本）。我们自己经常发现在《大纲》（以及作为这一研究标志的统一性）与《资本论》（它的发展不乏辩证法上的偏差失误）之间存在着分歧。另一方面，我们想要说的是，无论是进行客体主义的思索，还是频频将他的分析回归到经济上，都不可能使我们就马克思的思想给出一个整体的阐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要彻底批评最近兴起的普通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灾难性的和令人慰藉的方方面面，批评它客体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观点，还有它惯常的经济学倾向。我们应该开始作战，反对近来这些阐释中的一些普遍要素吗？为什么不呢？我们拥有制胜的一切。举个例子。因为现在仍然停留在小规模流通和无产阶级的自我物价调节这个主题上，那就让我们想想《资本论》第二卷再生产方案中的马克思主义论述。显然，我们在《大纲》中看到的分离逻辑否认这些方案能够真正实施。在书中，它们被看作是一个近似值，只能适用于一种实际情况，而这一现实其实已经深为对立和敌意所破坏和粉碎。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就这些方案再说一些废话：这只是说，它们能够为接近生产流通服务，即从经济上一致的观点，或者从过程上结算一致的观点出发，为接近它的理念而服务。

自我价值稳定措施这一概念让我们去回顾货币的概念，《大纲》前几页对其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货币是整体的、社会的、抽象且敌对的。我们从双方找到了以一种对立的方式互相反对的两种形式。我们必须强调这一关系中敌对的那一面。货币（数量理论与其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中介物，甚至在这种由阶级关系构成的斡旋中，它代表着资本的控制权（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就代表这种观点）。然而面对自我价值稳定措施，这些功能削弱减退。小规模流

通看起来排斥货币的功能，尽管它能够在普通商品流通时在小规模流通中运行。在小规模流通中，不能保持货币——商品——货币的顺序：在无产者之间进行交换的货币是使用价值。货币从属于自我价值稳定措施。当然，如果不考虑两个集团力量之间建立起的敌对关系的方式，这一分析就显得抽象而且充满乌托邦色彩。只要我们把放在这一层面上，它就不会显得那么抽象。例如，对立的阶级关系贯穿于资本主义剥削社会功能的始终，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一问题，那么今天是有可能正确评价这种关系的。这段关系中一方将货币减少到简单纯粹的控制功能，这等同于另一方令货币从属于自我价值稳定措施。而且这发生在敌对状态下。这就是马克思开始在这些章节中进行理论检验的全部内容。条件都已具备：两个阶级主体性的产生、他们的构成的总体特性和社会特性、他们在流通与再生产中对峙时的敌对天性。从马克思的教导出发，我们以一个新的方式定义资本的类型，还有在我们时代给社会资本新基础和一个新的恰当的表达方式，这些能否实现，以下的主题即货币（控制）——自我价值稳定措施比其他人和马克思主义要素都要重要。只有从这个主题出发，我们才可能在其真实的规模中抓住真正的阶级对立。同样，在这里我们将会发现提高分析水平的可能性，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资本的政治机制以及权力问题。在这一关系的中心，资本主义关系直接就是权力关系。同样，从劳动阶级看来这也是真的。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工资理论的发展伴随着主体理论的展开，而在看过工资理论以后，我们现在将能够以之为鉴来修订并找到阶级斗争理论中最重要的类型。问题在于要在每个层面上去实践分离理论，在于在每个假定中将危机理解为一持续进行的过程，在于回顾《大纲》的整个概要，在于逐点将它与当今阶级斗争发展所必需的缓和机制进行比较。就我自己而言，我往往愣是去找马克思的直觉力量和《大纲》中的非凡预言。但是这不允许我们逃避，我们在这里必须有所创新。

总之，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工资理论及其所具有的理论创造

性使我们能够定义一个重要的时刻，那时阶级斗争理论进入了流通理论。一旦重新思考资本的社会性决定及其渐进的力量，那么我们就直面立法则。接下来的是重要结论。首先从工人阶级的角度看：一个在物质基础上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的逐渐产生决定了阶级的真正构成。这个方向的路径已经打开，我们将在以下几页中看到马克思是如何步步推进的。第二，分离理论确定了分析能够展开的空间，也框定了我们寻找那些有助于重新找到主要类型的空间范围。在这一点上，所有我们能做的便是跟随《大纲》中马克思在“小规模流通”分析之后的几页里思维的发展过程。

在迄今所知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着手看《关于机器的断章》。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在《大纲》中，也可能是在马克思所有著作中所能找到的运用矛盾而且建构辩证法的最高级例子。关于机器的章节涵盖了笔记本六的最后几页和笔记本七的开头。这章于1858年2月底写成，而且处于《大纲》中马克思理论张力的最高点。我们以前已指出过这一点。这也是逻辑结论的一个要素。无论是从阶段性的观点还是从他们长期历史决断的观点出发，此后的资本进程都通过一系列关键要素而发展：一直到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成为对抗的形式。此时对抗打开了通向覆灭的道路。现在要做的就是将不同的威胁归整到一起，以获得整个财富的进程。让我们再次从头开始推进。

分析是从活劳动力的辩证法开始。活劳动力发现自己嵌入了“劳动过程充满活力的，持续的统一体”之中。这个统一体通过机器，或者“自动的机器体系”，作为资本不断变化的形式，将劳动力囊括其中。这个机器的自动化系统是：

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在机器中，尤其是在作为自动体系的机器装置中，劳动资料就其使用价值来说，也就是就其物质存在来说，

转化为一种与固定资本和资本一般相适合的存在，而劳动资料作为直接的劳动资料加入资本生产过程时所具有的那种形式消失了，变成了由资本本身规定的并与资本相适应的形式。

机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机器的特征决不是像[单个工人]劳动资料那样，在工人的活动作用于[劳动]对象方面起中介作用；相反地，工人的活动表现为：它只是在机器的运转，机器作用于原材料方面起中介作用——看管机器，防止它发生故障，这和对待工具的情形不一样。工人把工具当作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相反，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它为了自身不断运转而消费煤炭、机油等等(辅助材料)，就像工人消费食物一样。只限于一种单纯的抽象活动的工人活动，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而不是相反。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

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这种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占有，在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中，也从生产的物质要素和生产的物质运动上被确立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从劳动作为支配生产过程的统一体而囊括生产过程这种意义来说，生产过程已不再是这种意义上的劳动过程了。相反，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它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机械体系的许多点上，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这个体系的统一不是存在于活的工人中，而是存在于活的(能动的)机器体系中，这种机器体系同工人的单个的无足轻重的动作相比，在工人面前表现为一个强大的机体。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占有活劳动的资

本就其形式来说就是这样的力量。由于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由于活劳动转变为这个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转变为机器运转的手段，劳动过程便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值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包括进来，这一点从物质方面来看，也被肯定了。

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资本的必然趋势。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物质上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并主动地使活劳动从属于自己，这不仅是通过活劳动的占有，而且是在现实的生产过程本身中实现的。在作为机器体系存在的固定资本中，资本作为把创造价值的活动占为已有的价值这样一种关系，同时表现为资本的使用价值来说与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的关系。

其次，对象化在机器体系中的价值表现为这样一个前提，同它相比，单个劳动能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由于机器体系所造成的规模巨大的生产，产品同生产者的直接需要的任何联系也都消失了，从而同直接使用价值的任何联系也都消失了。产品生产的形式和产品生产的关系已经意味着：产品只是作为价值的承担者被生产出来，而它的使用价值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条件。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本身不仅直接以产品的形式或者以当作劳动资料来使用的产品的形式出现，而且以生产力本身的形式出现。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因此，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后者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

因此，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恰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另一方面，就固定资本被束缚在自己一定的使用价值的存在

中这一点来看，它是不符合资本的概念的，因为作为价值来说，资本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形式都是无所谓的，它可以把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形式作为自己一视同仁的化身来加以采用或者抛弃。从这方面来看，从资本对外部的关系来看，流动资本同固定资本相比表现为资本的适当形式。^①

如果要简单地评价以上引文，就要回想起我们已说过的一切：这些引文不需要如此繁琐的解读。我们只是突出强调这里出现的一些特殊要点，并且理解马克思是如何运用它们继续向前分析的，这会更加有用。第一点很精要：将劳动过程作为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的一个普通要素。第二点比较泛泛：生产资本扩大进入流通。真正的劳动力前提不能同时成为真正的社会前提，换言之是高效的社会推动力，特别是科学成为社会前提。“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②而且马克思继续坚持社会高效推动力的前提（以它们的全部），继续坚持认为，当整个系统呈现出来并且向前发展时，它们对资本的发展是完全实用的。首先从集中分析的角度看，那涉及劳动过程的还有它归类于自我价值调节过程。这里意味着建立在劳动阶级的使用价值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分解。

劳动时间——单纯的劳动量——在怎样的程度上被资本确立为唯一的决定要素，直接劳动及其数量作为生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决定要素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失去作用；而且，如果说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那么它在质的方面，虽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一方面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另一方面同产生于总生产中的社会组织的、并表现为社会劳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90～93页。

② 同上书，94页。

的自然赐予(虽然是历史的产物)的一般生产力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于是,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①

此外,还有第二点(从宽泛的分析来看)。这里,流通着的资本通过采取计划和控制社会再生产的方式而显得像是高效率的资本,归属于社会并且变成了该社会的产品。这一替代是全方位的。“那么,另一方面,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由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并存劳动来维持,则表现为流动资本的属性。”^②

本人劳动和他人劳动的这种交换,在这里不是以他人同时并存的劳动为中介和条件,而是以资本所作的预付为中介和条件。工人在生产期间能够实现他的消费所必需的物质变换这件事,表现为转到工人手里的那一部分流动资本的属性,并表现为流动资本一般的属性。这一情况不是表现为同时并存的劳动力之间的物质变换,而是表现为资本的物质变换,表现为流动资本的存在。

于是,劳动的一切力量都转化为资本的力量。在固定资本中体现着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存在于劳动之外,并且(在物质上)不以劳动位转移而存在着)。而在流动资本中,一方面,工人本身有重复自己劳动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工人的这种劳动的交换以其他工人的并存劳动为中介,——这种情况表现为,资本对工人实行预付,另一方面资本又造成各个劳动部门的同时并存。(后面这两个规定其实属于积累。)在流动资本的形式中,资本表现为不同工人之间的中介。^③

在这一层面上,资本主义在总体上转化为全社会范围内的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94~95页。

^② 同上书,95页。

^③ 同上书,95~96页。

资本主义的主体性由暴力激活。机器与科学构成并制造它。但是在类型范围内的分离尚未停止。这种对抗必定在力量的最高水平上进行自我再生产。取代对抗性的辩证法必将全面展开而且在这个层面上充分运行。马克思为继续深入分析而采取的进路，使用了大量看起来彼此之间相对比较表层的论据。这是一条将不同的发展联系起来的有些机械的进路，当然你可以尽情地批判它。有时候我们希望找到更加深层、细致且值得推敲的辩证法。这些即兴的移动更迭，它们的突然出现令人窒息，使人回想起一种“劫数”的味道，对此我们可以将其忽略。此外，很难想象我们能提出一条足够有力的逻辑论据，或者培养出这样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预言资本主义发展的能力（它可能不够严密但仍然强硬有力，特别具有一种卓越的科学张力）。此处，思想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致无法沦为一种普通的讽刺漫画。分裂再次出现而且进程继续向前。分裂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①但是，本来被隐藏在过程中的分裂突然被推到表层，并且采用了独立的主观性形式。在整个过程的情景中已经表述了：

现实财富倒不如说是表现在——这一点也由大工业所揭明——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上，同样也表现在被贬低为单纯抽象物的劳动和由这种劳动看管的生产过程的威力之间在质上的不成比例上。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关于机器体系所说的这些情况，同样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00页。

用于人们活动的结合和人们交往的发展。)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

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生死攸关的问题。一方面，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

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①

由分离逻辑导出的第一个结论是为了取代必要劳动/剩余劳动的关系，将它置于资本的能力水平上，划归到社会的范围，并且转化这两种完全相反的主观性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对互相破坏这点怀有敌意。这对于依靠剥削而存在的资本而言是不可能的。而对于无产者却有可能，因为，资本越是去尝试破坏它们力量的一致性，它们的力量反而愈发无限壮大。资本寻求不断减少必要劳动以扩大可榨取的剩余价值的比例，但是，它在个体上从工人们那里一个一个赢得的越多，必要劳动力从集体中获益也就越大，并且通过吸收资本打算完全为自己牟利而决定的巨大集体力量，他们又重新参与分配。压缩必要个人劳动便是扩大必要集体劳动并且建设“社会个体”，它不仅能够生产而且能享受生产出的价值。在第一项分析之后，马克思回到这一论据上，重新沿着他曾经跳过的道路，再次着手审视所有的威胁，因为他们允许代替分析并且重新定义又一条别样复杂的价值规律。各种迹象——有的隐蔽有的明晰——让我们继续推进研究。每一次这些类型都以一种颠倒的方式在起作用：对于剩余价值，发展的动力反而不起作用；对于资本主义，它是共产主义反对派。

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资本还添加了这样一点：它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财富直接在于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直接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00~101页。

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是，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

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是在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中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因此，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①

有人希望看到，马克思强烈渴望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从剥削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为标志。假使果真如此，当然那里也没有罪恶。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如果我们停留在类型的水平，我们必然记得，共产主义是对价值规律（或者更确切地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03~104页。

是推翻和颠覆价值规律)的破坏压制而且否定了个人生产力的个体要素,而从资本主义的观点而且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来看,个人生产力的个体要素是共产主义的基础。这里,代替和更迭已经彻底完结。与社会资本相一致的是集体劳动力。再一次,暂时的规模要求必须有一个巨大的空间规模。“正如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大工业所依据的基础——占有他人的劳动时间——不再构成或创造财富一样,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一方面因为直接劳动变成主要是看管和调节的活动,其次也是因为,产品不再是单个直接劳动的产品,相反地,作为生产者出现的,是社会活动的结合。”^①在共产主义革命中,个体也就是社会。社会是具体的,它是扩展性的,是稳定的,是享乐的延伸以及这种延伸的创造者。

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潜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

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做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

此外,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劳动不可能像傅立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不过,他能宣布最终目的不是把分配,而是把生产方式本身提到更高的形式,这依然是他的一大功绩。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04~105页。

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对象化中的科学。对于这两种人来说，只要劳动像在农业中那样要求实际动手和自由活动，这个过程同时就是身体锻炼。^①

是时候就工资章得出一些结论了——也就是要展开分离逻辑。我们现在能够在它的整体中概述出一条路径，一条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对立形式走过的道路。首先是以剩余价值理论开始，换言之，是在《大纲》第一部分中理论架构的术语与范畴内，这个结构在第二部分被完全颠覆。剩余价值理论被颠覆了。在资本项目里，劳动力由剩余劳动指挥和控制，而在无产者的革命计划中，重新分配的剩余劳动由必要劳动来控制。《大纲》的第一部分中，价值理论在我们看来是从被剥削阶级的角度出发的，它显得抽象而且从属于剩余价值理论。而这里，价值理论不再仅仅处于次要地位。在这种次要地位上，它经历了一次重要的位移，并且受到一种基本质变的约束。换句话说，当价值理论不能用一定量的劳动时间或者一个个体的劳动量来衡量，或当第一次更迭导致价值理论去面对社会时间还有集体劳动量时，此时，衡量剥削的不可能性就修正了剥削的形式。剩余价值中出现的空洞，任何并非一个社会辛勤劳动的一般参照物的衡量要素的缺失，社会劳动力的解放以及它在集体独立状态中的最终建成，所有这些都没有中止价值规律，但是将它挤压到仅仅是一个手续。当然，手续并不意味着缺乏效率。手续并不意味着丧失意义。相反，价值理论的形式高效且意义重大，但是只有它自己的非理性以及剥削逐渐合理化的功能的终结才能赋予它以效率和意义。这个形式是剥削空洞而且悲哀的基础。价值形式是单纯而且简单的控制力，是政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07~108页。

单纯而简单的形式——是“关键的非关键”形式，就如青年马克思会用黑格尔哲学术语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正站在一个过程的制高点上，在这个过程中，理智地建立起来的力量关系（它被管理并包括在资本发展过程中）被颠倒过来了。在这里，合理性颠覆了自我。这种颠覆是全方位而且是彻底的。剩余价值规律继续起作用，但是以颠倒的方式在起作用。不劳动，拒绝劳动就成为工人们的主张，成为价值规律被颠覆的基础，也成为剩余价值规律被重新阐释的基础。《大纲》的第二部分是行动过程。我们本可以给这章命名为《价值理论的质变》，而致力于谈论“共产主义理念”的下一章则可命名为《拒绝劳动》。最后，要处理“扩大再生产”机制的第九讲则应该以《工人自我价值稳定措施》为题。总的来说，我们在此快速地追溯了一遍自由与共产主义的整个轨迹。但是当我们提及这条轨迹时，我们说的是一个与它有关的主题。这个主题拥有通往推翻剩余价值规律的钥匙，这个钥匙是指一种物质条件，并且把它作为一种力量。此外，首先我们回忆一下已经达到的结论，即价值规律已经抽象化，缩减为资本主义控制力的一个空洞形式。因为抽象所以高效，这种控制力虽然高效但是并不充满合理性，而且还残暴。

从阶级的观点来看，找到推翻价值规律的钥匙意味着什么呢？有些人想到这一论点让我们能够发表一下的言论：当有一种颠覆出现时，资本就成为劳动阶级的使用价值。这是错误的。任何试图证明这一点的人都必须在分离逻辑的框架内进行，并将发现他自己被困在这种资本关系的双重性之中。在另一方，这可能在颠覆发生之前就停止下来：那就是必须逆转资本的理念而不是逆转它的现实和关系。这不会完全割裂资本关系，但会通过使关于这段关系的高级意志实体化而在全世界引起与资本主义理念相对抗的化学反应。还有通过想象，通过自我幻觉和神秘化。神秘化，因为通过这种神秘化的机制，工人的行为看起来“等价于”资本家的行为。工人的行为变成凌驾于资本关系之上进行控制但不是破坏——控制这种必要劳

动和剩余劳动。这是一个特别具有诡辩性的论述：如果问题在于批评，那么资本是一种必须破裂的关系；而如果我们经由批评走到理论方面，资本则成为一种必须被主导和控制的事物。但是只有能够对自己的否定客观化的资本才有可能这样。对于不承认自我否定的劳动阶级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将关系神秘化而且包容在自己的客观性之中，资本才有可能存在。否则揭开这一神秘面纱并且想从中建立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则是不可能的。

我们坚持这点批评意见有多重原因。第一是因为，从我们已经批评过的观点中得出的结论自然是错误的：当这一观点把资本当成劳工阶级的使用价值时，它就把资本实体化了，而鉴于在剩余劳动的累积部分只能是劳动阶级的使用价值，是有可能重新分配那可以减少到不工作，减至劳工阶级的解放和自我物价调节的部分。这一部分是否定，否定的财富。第二点，因为我已经批判过的那一观点要以一种非常神秘化的方式给政治以自治权：这一情境的政治不是价值规律的新形式，但是更是一种高于资本的关系并且独立于资本。在《大纲》中没有一种高于资本的关系不是资本主义的功能，那不是资本伴随着其控制力的发展而采用的形式。从内部破坏它，不是要寻求外部的参照点，以工人的主体性作为对立面和潜藏的财富（这已经被资本用在它的全球观中）来碾碎它；它让自己立足于与剩余价值规律相对立的本质基础之上：这是我们在马克思《大纲》以及所有其他著作中能找到的道路。一部著作，在其中我们能够找到矛盾，找到分歧；在其中我们会——而且我们能自由地承认这一点——喜欢某些部分甚于其他的内容。但这不是因为我们在其他部分中不能找到同样的政治经济批评与政治批评的统一体，而我们在《大纲》中能看到这种统一。在我们所达到的高度上，现在这也可以看成是可争议的，我们开始了解掌握主体性，马克思对主体性的承认，它的劳动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这里我们含蓄地强调分离，它作为剩余价值理论中的一个定义要素，展现给我们工资理论，发展，给予劳动阶级那一极的活力——在工资理论中它从资本关系里解放出

来——“小规模流通”理论。总体的更迭在这对立的领域中经过了机器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以及真实的全球社会理论——所有这些都指向作为资本关系对立面社会个体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不是要颠覆对资本主义的控制力，而是要扭转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关系，否定并重新分配剩余劳动。这条主体性路径处于资本关系之中，它不是在想象中去改变，但它知道怎样做，它不断加深分裂，以破坏这一关系。主体性路径是一条集约的道路。这是持续而且协调地对已成功对立面进行再创作。它将必要劳动上升到能够毁灭剩余劳动的高度。

在分离模式的张力中我们找到了最大的自由。社会个体是多元的。最强的差异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最高途径。当资本关系到达它爆炸的顶点之时，解放了的否定不再是一个综合。它不懂得任何形式上的等价物。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是资本力量的否定。它是对资产阶级即资本的政治阶级的被中心化、同质化的力量的否定。它是一切同质化的消解。现在，这种方法论的“多元”，这种多元性胜利了。我们不能强加给解放了的主体性任何一种同质性以及构成社会的组织框架。剩余劳动在资本主义的计划中有一个一致的方面。工资重新显现为资本的形态。当工资成长为自我评估以及对剩余劳动的重新占有时，对于发展能够共同起作用的规律就到了尽头。并没有更多的利润了，因为劳动的生产性再也不能转化成资本。再也没有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了。主体性不仅解放其自身，它还解放诸多可能性的总体。它勾画出了一个新的视域。劳动的生产性是以社会的方式得到奠基和传播的。它既是一个搜集和重组一切事物的粘合剂，又是一个享乐和创造的网络体系。这些东西穿过那块因这种粘合剂而变得肥沃的土地。共产主义革命，社会个体的一切力量的凸显，创造出了这一由各种选择、各个命题和各种功能组成的财富。关于自由，除了在我们刚刚研究过的《大纲》的这几页中，共产主义从没有显现为自由的同义词。

第八讲 共产主义和过渡

《大纲》中的共产主义和流通问题

□ 隐蔽唯物论的综合？对这种综合和思考方式的批评。

□ 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一个新命题：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要超越乌托邦或启蒙及其逆转。关于能动性的重要话题；从前历史到历史，共产主义建立自身。

□ 启蒙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范畴的发展。从启蒙到逆转，从实在的主题到过渡的形式。

□ 过渡和主体性。过渡和构成的实践。逆转的力量：劳动的压抑。

□ 消灭劳动：作为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

使辩证法回归到资本和乌托邦的毁灭中去。

从世界市场到共产主义。在坚持推进主体性进程后，我们推理所达成的，是一条表面上可称之为是名副其实的悖论的路径。但它仍然是一条马克思不止一次表明了路线：马克思在《大纲》中提出，“最后，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个人劳动实际成为社会劳动以及相反的情况”^①。共产主义源于世界市场这个概念自身的内在矛盾：一旦资本主义一体化和对抗达到最大，时间和空间的综合决定了资本过程。因此我们在此需要指出，共产主义的问题在于甚至没有认清过渡问题，在于忽略了主体性问题：它把它们作为资本的内在要素，作为表征，作为客体的迂回，但它不把它们作为明确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21页。

问题。“什么是共产主义”的问题，都以非常核心的方式贯穿于马克思的文本中，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都是如此（我们不能忘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之后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是什么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在它被界定的各种形式中，看起来更像是客观的描述，而并不具有方法论上的功能，更多的是一个研究过程中的先验客体而不是一种原动力。什么是共产主义？达到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劳动的“生产方式的较高形式”的道路是怎样的？对这两个问题的传统回答都把它作为资本辩证法中一个独一无二的过程。共产主义并不被认为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资本在对抗发展中产生的大灾难。过渡这一问题，在共产主义被界定后就消失了，这个结果通常表现为与资本发展相联系的超越。与此矛盾的是，将共产主义与过渡阶段统一起来的，正是它们对资本的否定，是这种否定的客观方面。这两种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后资本主义的。

显然，这种思考方式并不能使我满意。它显得太不现实、太理想化了。毕竟，正如我们已通读过的那样，这个立场与《大纲》的总体发展相去甚远。这种观点，将共产主义定义为全都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对抗。它们的发展，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激进转换之下，要视不同主体的情况以及全球范围内对抗形势的发展而定。因此，我能够理解马克思对于灾难的论述是有预见性的，而且他的革命热情表明他在主观上是坚持这一观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围绕危机和灾难这一概念的结合了与《大纲》中所有在本质上具有共同性的要素。一旦这样说，这个问题就仍然是开放的。拒绝这些途径，就意味着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其他本质特征。思考共产主义形式的过渡，能够使我们直面导致这种过渡被压制的现实原因。这就意味着，不论好坏，我们把它切成了两个碎片，其中一个作为引言，位于资本中且存在于其矛盾的间隙；另一个则是最终到来的、自己表现为超越了灾难的、完全自由的共产主义。现在，我们关心的是自由的进程，也就是在引言与结论之间的部分。将这两部分放在一起，这就

意味着，我们把两个概念同化了，这也就抑制了把逻辑本质和史学品格分离开来的全部可能性，并且在阶段和阶级的辩证法中将它们实体化了。结合这两种途径，我们间接地认识了自由进程的一些特征。但是，如果这种结合无法留给我们决定自由进程的空间，那立场又会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再次审视《大纲》中关于共产主义问题的论述：我们必须现在就提出我们的假定（这也是从我们迄今为止的研究中所浮现出来的）。我们必须在此验证：并非过渡以共产主义的形式表现，而是共产主义采取了过渡的形式。

罗斯多罗尔斯基在看待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问题上，强调了要想认识共产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的核心地位，就必须撇开机会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两种理解模式，他还强调了马克思对这两种理解模式的批判。罗斯多罗尔斯基认为，马克思凭借着辩证唯物主义对乌托邦思想进行了扬弃。换言之，对罗斯多罗尔斯基来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全都被积极的乌托邦思想所渗透，被乌托邦的力量所掌控，与此同时，这种乌托邦精神与唯物论相调和。这是极其令人惊讶的。罗斯多罗尔斯基成长于19世纪20年代左派共产主义学校，知道如何从马克思中读出积极乌托邦的重要功能！并且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种建议的特定力量：积极乌托邦总是在革命阵营和机会主义者之间划出一条精确的界线。但他的观点并非令人全部信服。因为，它没有看到、没有充分地强调这种调和与辩证过程之间的不确定性。这种辩证法，包含了共产主义的特性，但并未包含过程，是个过于宏观概况的关键。它冒着给“方法的迷惑”带来新力量的风险，以所有差异都会消退（只有差别才可激活进程）的名义。一方面，我们修正共产主义，我们将其概念下降为一种客观逻辑和决定论的产物；而从反面来说，我们发现“跳跃”、新的品质、政治活动以及唯意志论以一种成熟、激烈的方式被提出。让我们记住马尔库塞的立场，正如罗斯多罗尔斯基那样（p. 424）。一方面，资本超越劳动的持续动力，可怕的摩洛神在形成；另一方面，它仍是个“迷惑”，但

不再是由决定论方法所产生的了，而是一步质的跳跃和飞跃。对资本家来说，对劳动组织的颂扬被劳动的废除所对抗。已成定局，马尔库塞的浪漫主义得到了满足。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在这儿发现的。这不是关于细化这步跳跃的：我们必须抛开一切、过程、它的对抗主义组织逻辑、表面上的主观性，以及存在于劳动组织和劳动废止之间的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基于似是而非的矛盾，而是建立在经济与政治的高度统一，建立在不断变化的现实道路的基础之上。第二，马克思的方法在事物分析的不断置换中得到确认，这种变化产生于起作用的各种力量之间关系所表现的形式多样性。当主题修改时，范畴也就变化了。也就是说，这是重要的第三点，即进程的历史决定。这不是以共产主义形式定义过渡的问题，而是在将两者同化后（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是等同的）用过渡来定义共产主义。当我们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时，这是一个关于斗争和置换的主题的问题。这是构成共产主义的通向前方的过程。

从相反的方面来说，如果我们接受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形式过渡的假说，我们就不可避免地退回到了与辩证法无关的立场上。我们高兴地发现，我们已经收集到了关于人道主义的所有模型。一个普遍的人道主义，有关趋势的概念无法将自身转换为一种方法：趋势成为人类本性的有机伸展（甚至是在历史上定义的）。整体、重生以及无限的丰富，这些我们为之倾其所有的事物，正当地激起了义愤。阿尔都塞将追踪清晰的界限和从理论中排除这种平淡的模糊视为优秀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标志，这一点并没有错。但是请不要夸大这些要素的重要性，不要将遥不可及的、杜撰的分类引入马克思主义思想！我们将回到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上：但发现它已经沦为了这样一种手段，通过人道主义这种手段，乌托邦和共产主义被同化了；通过人道主义这种手段，试图解决唯物主义的现实与想象之间的二元论所产生的理论矛盾；通过人道主义手段，试图将各种主体组织起来。如果说共产主义采取了过渡的形式，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遵循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主体的对抗性。为了

避免人道主义，一些人企图避免主体性的理论领域。他们都错了。唯物主义的道路精确地通向了主体性。主体性的道路正是将唯物主义带向共产主义。劳动阶级是主体，分离的主体，是他们催生了发展、危机、过渡，乃至共产主义。

我们必须吸收《大纲》中的共产主义范畴，并从其中分离出所有不能在主体性唯物主义进程之前的思想和方法。马克思所提出的道路的综合，即通过世界市场决定论的道路以及跳跃至共产主义的道路，必须被分离并颠倒过来。如果分析过渡进程的在主体性上的呈现，那我们就只能面对这样的道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阐明、推翻所有将过渡形式视为必然性和决定论的种种见解。

阐明又意味着什么呢？它就意味着，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所有特定阶段加以批判的过程中必须要思考共产主义是如何形成的。从这点上说，《大纲》是一本从本质上加以阐明共产主义的著作。

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将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这也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先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52~453页。

范畴向前推进的道路是清晰的。在历史中前行时，这些范畴不断把历史阶段作为条件，把当下作为历史，把未来的预见作为将要发生的运动。因此，即使是走走停停，我们也必须检验共产主义形态的动态范围。这就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我们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的同时也在阐明共产主义——当这些范畴把它们自身作为主体的实践认知结果时，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一时刻。

利用这一途径和方法论(就像我们提到过的、确定了界限的那些途径和方法论那样)，我们可以轻松地得到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及其历史演进所下的各种定义。从《货币章》开始，几乎所有我们读到过的章节都包含了一种共产主义逻辑。从那种观点来说，货币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关系。让我们记住这些页码：它始于产生三个阶段定律的外部链结力量，始于激进的替代力量开始出现时，即货币看来是一种社会聚合力量之处，超越了它所表现的阐明，我们能够看见个体发展的第三阶段的轮廓。“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①货币的一些特征，如社会性、共同生产的表现，社会共同财富的度量和标志，就立即被颠倒了。我们可以说，货币范畴仅仅是为颠倒它本身而存在的。阐明就意味着将范畴理解为一种颠覆。这就是货币这一范畴所发生的：它指示了颠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果赋予这种压力和断裂以力量，它就能利用自身来控制这种颠覆(并且，让我们在此从根本上强调反人道主义的措辞，如普遍的个人。这些措辞更多地取决于货币关系，而不是基于一些自然主义者或历史主义者的考虑，或是连续性的考虑。这种分离是激进的，并且它不仅是达成这种颠覆的关键，而且是组织结构的基础。如果我们确实想从马克思思想中找到关于人道主义或模糊的类似说法，我们必须要到有关辩证法中去寻找，尤其是当这种辩证法被伪装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07~108页。

重组和升华的机制的时候)。共产主义思想(回到我们的推理),担负着揭示有关资本的每一个范畴的内在矛盾的功能,正如它批判性的对立面一样。在这里,当谈到货币的时候,共产主义思想就像货币一样也以高度发展的社会性的颠覆为形式。从史前到历史的道路,同样是人掌控自然和历史的道路。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取决于现实运作的完全真实性:这是自由的主体反对并颠覆资本主义社会化的结果。

《大纲》:这又是一个共产主义从颠覆中、从对范畴的批判中获得了些什么的例子。它不亚于普遍交换的范畴、资产阶级自身的范畴,而这些都是需要颠覆的。

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

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因此,一方面,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另一方面,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代世界是从狭隘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换句

话说，凡是现代表现为自我满足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①

资产阶级的世界是空虚、排外和庸俗的；共产主义则是需要的多样性被不断丰富并被扩展的世界（尽管寻求着自身的巩固）。理论范畴就是这种颠覆的定型。从史前社会到人类历史，如果说共同体本身作为颠覆的形式，在此意义上，此前几页里提及的真正的共同体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范畴进步的基本要素。并且：“极端的异化形式……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②就是从这儿我们发现那些不可思议的、被污名化的一些说法由此产生。“以一种颠覆的方式”、“上下颠倒”试图给出详尽的或形而上学的解释：就我们而言，我们的分析进程把我们带向更加清晰的解释——显而易见，这些说法都是在论及范畴的颠倒、具有超越性的革命力量时所用到的语言。颠覆的基本要素存在于每一处，存在于工人主体的观点彰显其力量的每一个地方。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史前史的终结，我们所到达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描述，是最强有力、最完整的。以《大纲》^③为例。共产主义的动态范围，在资本关系包含的内在矛盾的激化中可找到源头，这看起来是最透彻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被引用的内容：资本用尽其膨胀的能力，将抽象劳动扩展至整个社会，把劳动的合作和分工发挥到极致。这个段落的每个范畴都是双重的：因为劳动的合作和分工满足丰裕的需求、并且不断出现的个性的概念。但这种双重性并非意味着错误。它在各方各面都是双重的，以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共产主义过程的一幅相反的映像，一幅在资本主义前进过程中被损毁、愚蠢的映像。当这种对抗达到极点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79~480页。

② 同上书，512页。

③ 同上书，587~594页。

当颠覆是唯一可遵循的道路时，团结起来的人民力量得到新生。在这个发展水平，我们不能抱着不应有的谦虚来否认诸如新生或灾难的事物的价值。资本主义的丑陋使它不配使用这些措辞。

再向前，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即竞争规律，并且在这样做的同时，他坚持资本主义自由的力量：但这种自由的基础是狭隘的。“但这不过是在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因此，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①竞争法则勾勒出了资本发展所包含的关于对抗和分离的内容的轮廓：共产主义，即是对一切事物强有力的颠覆。

阐明资本的范畴意味着将历史前进的规律公布大白。基本规律使共产主义成为可能。从这点上说，为了保持阐明，共产主义在建造自身，并且在建造自身的过程中是激进的、最极端的对比。自由、财富需要、生产形式的冲突发展以及危机范畴，全都在这得到满足。它们和它们的对立面在每个范畴里都有体现。这里当我们谈及共产主义的时候，颠覆是强有力的、综合的。矛盾形式表面上有着不可超越的障碍，这种障碍在对资本“不断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日益增大。这个过程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平衡发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追求社会主义的观点则显得更不坚定：国有财产理论、计划理论、剥削关系中的平等，都是从资本的不断革命中产生的。当理想的综合体中的每个要素都被对抗且失效时，就没有任何可能的平衡。出现这些是因为对立面的发展和资本的发展具有同样的趋势。两者皆有其目标。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作为颠覆的极点。这还不够。在《大纲》中，除了对这些范畴的再次确认（资本范畴的反面、这些范畴的新工人基础），我们仍然能够读到这样一些段落，其中阐明名词开始作为主体构建它自身，并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43页。

共产主义定义构成的过程作为残留——也许无法压缩，但毕竟是残留——并将它们作为替代品的动力。

从这点来看，我们必须开始涉及主体，但我们还没谈论到它。所以让我们亦步亦趋跟随马克思前行。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共产主义的动态范围和对立面，即它颠倒了的模式。但我们仍然缺乏共产主义的定义和研究。在追踪共产主义主体范畴之前，我们需要阐明与共产主义相反的特征和根源。这个相反的根源由生产力解放的综合体和对抗性主体的出现组成。生产力解放？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水平上，资本家的支配就显得不再必要。“而资本本身，只要理解得正确，只有当生产力需要外部的刺激同时又表现为对生产力的控制的时候，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条件。”^①对立主体的出现，这又意味着什么？这是说共产主义只能在新的共同的个体性产生、发展的各阶段间发现它自身，这就造就了生产和发展的新规律。解放的主体打开了一个具有共同需要的新世界。

剩余价值总是超过等价物的价值。等价物，按其规定来说，只是价值同它自身的等同。所以，剩余价值绝不会从等价物中产生；因而也不是起源于流通；它必须从资本的生产过程本身中产生。这种情况也可以表述如下：如果工人只需花费半个工作日就能生活一整天，那么，他要维持他作为工人的生存，就只需要劳动半天。后半个工作日是强制劳动；剩余劳动。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的剩余劳动。

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396页。

余劳动本身成为普遍需要，成为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东西，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

因此，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在这里就像货币和商品的关系一样；如果说一方是财富的一般形式，那么，另一方就只是以直接消费为目的的实体。但是，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而在这种发展状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①

劳动不再是劳动，而是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共产主义的内容因此包含了一种颠覆，同时压制着被颠覆了的客体。共产主义纯粹是对雇佣劳动的颠覆，以至于这种颠覆到了压制劳动的程度。生产力的解放，在大多数形式下成为一个动态的扬弃过程。将从劳动中解放变为超越劳动，这构成了共产主义的核心定义。我们在坚持这一理论事件时不应感到害怕：劳动力的解放激发了创造力，而劳动的废止在每时每刻都给它以生机。共产主义的内容、框架都是普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85～286页。

需求的发展，普遍需求产生在共同的、不幸的雇佣劳动组织的基础上，但是这也以一种革命的方式象征了劳动的废止，它决定性的灭亡。

我们在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定义上已经有所进展。我们不但已经能够从历史或理论的水平上领会颠覆的巨大力量，而且能够理解它的内容。现在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可以把这种颠覆视为动态的、独立的、自主的。共产主义的主体的产生标志着这种颠覆的终结。

从过程阐明共产主义的颠覆，不再是哪条才是从史前史到人类历史的道路的问题，而是同时发生的、明确的革命问题。颠覆本身把主体性解释为结果，同时作为共产主义的条件。过渡在这里表面上只是共产主义形态的专有形式。

这里有两种思考的顺序。一种关乎方法。首先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的方法达到了它最成熟的定义。在马克思谈到共产主义的主题时，《导言》中的方法得到了全面应用。共产主义采取过渡形式时，它的功能发挥得最为充分。除了过渡，没有其他对共产主义阐释的可能性。否则，它就只是一个可说明的概念。所有马克思主义范畴都是共产主义范畴。因此它们避免了“科学使用”（在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可能，而且也避免了改良主义者的使用。马克思主义范畴不仅仅被永恒的、不可缺少的双重性所渗透，但这种双重性表现为对抗的方式，以及以颠覆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对抗。马克思主义的范畴的运用意味着要把它们推向必然出现的颠覆，允许自身获取这种难以置信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是颠覆性的范畴，出现于颠覆的过程中。这些范畴是被当作有对抗趋势的逻辑，该趋势的发展由范畴系统的不断置换所构成。理论将历史过程打断，使其连续性不再可能，在破坏和改革的过程中完全的重塑。并不仅仅大量的范畴（货币、劳动、资本等）具有革命性，那些属于模式或者方法的，如限制、障碍、过程、改革等也可能有革命性。在发生的各种互动之间，这个概念变成了在发展中采取了对抗或者敌对力量的运动的要素。

改革在破坏的逻辑里构成了最强水平的敌对。唯物主义逻辑到了足够抓住本质的程度，它是富有创造真相和阶级斗争的力量。共产主义只是从这个方法着眼的概念，它始终是一个动态的改革字眼。

第二种考虑的顺序涉及概念内在的主题的历史成型。我们必须再次追寻已在其他方面得到检验的整个理论路径，并关注每一时刻对每个被即将到来的革命要素所标记的范畴，关注这条道路到底如何。然而，我们只暂时关注一些基本的要素。我们仍然处于“货币作为社会关系”的分析中。所有的对立面在它的普遍性中都消失了，其程度以至于诸如社会主义者，诸如蒲鲁东主义者将货币视为共产主义“倒置的面孔”。这是极其错误的：范畴只是一种对立要素的外形。

但是，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有大量对立的社会统一形式，而这些形式的对立性质决不是通过平静的形态变化就能炸毁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珂德的荒唐行为。^①

有关货币和交换价值。但这些概念对劳动而言都是真实的。《大纲》详尽地分析了抽象劳动的概念，以及劳动时间和社会生产的调节。当调节进行时，形式就更加对立。共产主义表面上是颠覆劳动的概念，是控制的形式。共产主义是一种终结，尽管这种终结表现为一个过程；共产主义是将劳动作为社会生产的组成部分，并使主体得以解放的社会。主体就开始构建自身，就是为了去除它自身及其全部对抗性和霸权，但它只缺少一种要素：认识。

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09页。

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就像当奴隶觉悟到他不能作第三者的财产，觉悟到他是一个人的时候，努力制度就只能人为地苟延残喘，而不能继续作为生产的基础一样。^①

认识、觉悟、革命：把方法中的障碍实体化的时刻到了。这段内容极其重要，因为在这里，主体性表面上是作为特定的、有机的材料分类的组成要素：这里由主体性自己表达出一种革命的要素，但它存在于生产关系的矛盾结构中。主体可以自身发展，能够把自身从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也可以达到解放并掌控它们的程度。无产阶级自身稳定自我的价值，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采取了自治的形式。马克思遵循了这样的过程。他领会到，自治在社会个体中表现自身，并具有调节普遍性的能力。但是，这种把共产主义过渡看作根植于科学过程，理解为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做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相似而已。我们必须进入事物的本质：结合在劳动中的科学，以及被包含在资本之内的生产力必须被彻底地解放，从而使矛盾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只有达到高度集成的水平，才有可能出现足够深刻而有效的破坏以建立有远见的自治。相似性和暗示还不够。马克思对待科学的方式总是既是人道主义的，又是科学的。科学这一概念的矛盾本质的加深被这一点减弱。但这种情况并不会发生，即使是在对立力量(无产阶级的自治)开始在资本内对社会和科学进行高层次定义时，这样的分析也是富有表达力、有力的。这就是“机器论片段”所表明的(见第七讲)。共产主义具有主体性的形式，同时也是持续的实践。在新主体迅猛发展中，资本没有哪个部分不被摧毁。这个主体显示了巨大的力量，它带来了主观上的剧变，带走了所有旧事物的痕迹。过渡是一个完全持续的过程，完全建立于由最激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55页。

替代品所决定的空间。马克思超越了马克思。超越了所有暗示均质化的假设。最坦诚的革命意识能够在这里找到众多崇高的颂扬。对资本的颠覆与劳动背道而驰。在“机器论片段”里，不是推翻，而是构建。资本主义颠覆带着排他性，它不仅作用于生产模式的布局，也帮助构建了生产模式的基础：颠覆的颠覆达到了这个基础。

回到笔记本七。为了检验这种关系，马克思这样论证：

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物的条件即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相比必然增长，——这其实是一个同义反复的命题，因为，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无非是使用较少的直接劳动就能创造较多的产品，从而社会财富越来越表现为劳动本身创造的劳动条件，——这一事实，从资本的观点看来，不是社会活动的一个要素(物化活动)成为另一个要素(主体的、活的劳动)的越来越庞大的躯体，而是(这对雇佣劳动是重要的)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越来越巨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就通过这些客观条件的规模而表现出来)，而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相对立。关键不在于对象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归巨大的对象[化]的权力所有，这种对象[化]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

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活动的这种物的躯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对象化过程实际上从劳动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外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过程，——就这一点来说，这种扭曲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是单纯想象的，不是单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宗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对象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但是，随着活劳动的直接性质被扬弃，即作为单纯单个劳动或者作为单纯内部的一般劳动或单纯外部的一般劳动的性质被扬弃，随着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这种异化形式；这样一来，这些物的要素就被确立为这样的财产，确立为这样的有机社会躯体，在其中个人作为单个的人，而不是作为社会的单个的人再生产出来。使个人在他们的生活的再生产中，在他们的生产的生活过程中处于上述状况的哪些条件，只有通过历史的经济过程本身才能创造出来；这些条件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条件，它们不过是同一些条件的两种不同的形式。

工人丧失所有权，而对象化劳动拥有对活劳动的所有权，或者说资本占有他人劳动，——两者只是在对立的两极上表现了同一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而决不是同这种生产方式毫不相干的偶然现象。这种分配方式就是生产关系本身，不过是从分配角度来看罢了。因此，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下述说法是极端荒谬的（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49年伦敦第2版第240页）：

“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具有物理真理的性质……财富的分配却不是这样。这种分配仅仅是人间制度的事情。”（第239、240页）

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与“财富分配”的规律是不同形式下的同一些规律，而且两者都在变化，都经历同一历史过程，总的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历史过程的各个要素。

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洞察力就可以理解：例如，如果把从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自由劳动即雇佣劳动当作出发点，那么，机器只有在同活劳动的对立中，才能作为与活劳动相异化的财产和与它敌对的力量产生出来；也就是说，机器必然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但是同样也不难理解：机器一旦比如说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也

不会不再是社会生产的作用物。但在第一种场合，机器的分配，也就是它们不属于工人这一情况，正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条件。在第二种场合，改变了的分配将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①

再没有人能够写出像马克思这样清晰的文字了。革命性的主体在这个阶段是在与资本发生关联的地方出现的。这个主体与资本对立的颠覆是一种已经不再是重新估价的运作了。重新估价面对新基础时就显得苍白而含糊了。因此主体的自治在质上改善了这一过程。主体在重新估价劳动力的客体化这一点上施展力量，迄今为止它都是活劳动的敌人，今后却将被活劳动所主导。在这一分析中，没有范畴可以阐明的空间了：范畴的颠覆是如此激烈以至于产生了与由剥削所造成的苦难之间无法衡量的距离。

接着我们要看《大纲》中马克思论述共产主义文字的末尾。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共产主义不可能与资本主义共存，它是一种激进的颠覆。非神话化是发展的反面。共产主义既不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种技术，也不是它的灾难。它是新形成的主体，它改变现实，摧毁资本。因此，对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我们只能在过渡的范围内对其加以阐述。颠覆的运动力量强大，以至于过渡的形式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建造新主体，并且它有引发大变革的巨大潜力。为了能够用最精确的方式标记这种变革，马克思坚持劳动的废止。解放的劳动是从劳动中的解放。共产主义劳动的创造性与资本主义劳动力的组织方式无关。活劳动通过解放自身，重新从交换价值中夺回其使用价值，这使我们走向那个最终把劳动作为一种需要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劳动作为本质的、共同的、非神话化的共产主义劳动的问题，而不是说劳动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颠覆是彻底的，绝不允许任何妥协。这是个新主体，丰富而且充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243~246页。

的新主体。马克思说过，没有必要去夸大它。马克思这样说过无数次。整个事情中唯一滑稽的是，这些段落太多了以至于读不完，真是惭愧。对于剩下的一点也不滑稽的事情，仅仅存在废除劳动的斗争中巨大的痛苦。

从那里开始，我们可以对这种达到共产主义的方式所产生的后果做一点评述。在过渡范畴里，废除劳动所占据的核心地位，暗示了检验这种不同理论主题之间的相互结合的条件之必要性。面对现存的各种共产主义模板，我们必须提出共产主义和计划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废止和过渡的接合中，这些问题起着什么作用？毫无疑问，马克思将计划看作是共产主义的一种品质。尽管如此，这种关系或者被理解是指用政权这种简单形式来推进生产关系社会化（常常是基于恩格斯的论述），或理解为一种强大的经济理性形式。如果我们检验《大纲》，我们就会发现显然不是这样的。只有当劳动被废除时，共产主义才是一种计划。计划，是必须禁止指令及其具体化的排外性的劳动的联合特征和条件的表达。因此这并不是具有超越性的经济理性。两者如此不同，以至于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性。当废除劳动的条件和对象不存在时，计划只是资本主义指令的一种新形式——它的社会主义形式。这就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批判中具有力量的地方。社会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或者阶段。社会主义是资本经济理性和利润理性的最高形式和最优越形式。它仍然基于价值规律，但已是被作为将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引入国家政治法律机器职能的综合和核心程度。社会主义保持着生命力，包含着价值规律。废除劳动是价值规律的相反标志。废除劳动问题导致资本主义计划和共产主义计划不可能趋同。我们必须强烈批判在对立面发展过程中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同化加以合法的辩证逻辑。相反地，我们必须看到劳动的双重逻辑。在《大纲》中“机器论片断”，价值规律的消除，是将其功能转变为纯粹的指令规律的基础。但是对抗的逻辑的作用已经有了。每种关系，每个简化的运动，每个相对理性的要素，都随价值规律的消失而消失了。资

本主义关系的连续性一定会被打破。这仅仅是对抗的逻辑，建立于反对的不可削减的客体基础，能够在这儿发挥作用。

每个无产阶级都有自己的计划标准，一个独立自主的计划。工人和无产阶级自我定价，这就是对废除劳动的计划。相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其计划所产生的社会空间将产生极为脆弱的后果：每个部分都互相矛盾冲突，这不仅是指对抗的直接性，而且关于对立的框架，废除劳动的计划，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劳动的扬弃，以及由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了计划而采取的组织形式，这二者衡量着过渡的质和量。它所衡量的对象不是这种愚蠢的乌托邦行径，而是由主体决定的切实的构建。这个过程因此要承受替换，一个真正的转移。计划成为资本不可缺少的东西，社会主义在它代表经济范畴时变成了共产主义不可缺少的东西。共产主义主体在这一过程中成型，它与那些激烈的置换有共同的基础。它具有多样性，不仅有丰富的需要，也在连续的综合中被不断丰富（正如阶级构成理论告诉我们的）。

现在回到对客体和它的组建力量的分析上来。从否定劳动，到否定把劳动自身转换为计划理性的劳动，我们已经看到客体提出了自我组建的条件。但是在外表上这是一种策略顺序。劳动的否定构成了客体，在于它透射到世界，在于它构建了一种生产模式。这不能由马克思或我们来预言这个客体的形态。我们能够说得非常简单，即生产的共产主义模式包括了社会经济决定的完整性，这种完整性来自于这些生产模式中每一个的规定性。强调这点很重要，因为在这个价值规律的理性化消失的精确立场上，平衡、比例以及生产的共产主义模式的最终发展就在劳动的否定中浮现，在抑制更加具有共同计划的劳动的主体实践中浮现。

重新介绍整体性思想并不意味着我们把所有共产主义的论述放在了整体水平上，也不意味着我们把整个发展都归结为策略的延伸，事实上，意义恰好相反。伴随着整个进程的总体性，劳动的否定以一种与总体进程不断冲突的方式从而显现出伟大的多样性，显现出

复杂自治运动的伟大财富和自由。通往共产主义的每一步，都是整个财富种类的延伸与扩展。差别与破裂，在这一点上，我建议考虑马克思的一些隐喻(如资本主义世界定会“爆炸”等)。这是一个持续回归的范畴，它不是灾变说的标志，而是主体通向共产主义的自由运动的成长。反抗以及根植于反抗需要的颠覆用行动构成了解放的过程，这和过程的整体性一样重要。如果不是解放的过程，我们还能如何理解一种通过抑制劳动的革命机制？如果不是作为一种一直存在且重复出现的风险，我们如何勾勒共产主义的全部？过渡形式的共产主义是我们知道起点、分享过程的道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在我们前进并为之奋斗的道路之外，什么是终点。共产主义的未来只能够被建立，而不能被同化。它的所有品质都存在于它稳固的基础上，存在于激活整个进程的巨大力量之中。

根据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思考，这个结果表面上是令人信服的。毫无疑问，框架已从我开始分析之时就发生了变化了。我们已经留下了这些道路之间的交叉和联系，这些道路时而在客观需求、灾难性发展，或者甚至在乌托邦的痕迹里，阻挠共产主义的产生。

当我们钻研这些范畴，在这一过程的主观描述上暂停，把重点从理论水平转换到实践水平时，共产主义范畴就已经融入了共产主义过渡，因为它根植于马克思主义逻辑的对抗性本质。所有的决定，都点点滴滴地围绕这个新过程汇合到这片新天地。所有辩证的、延续逻辑的残留都消失了。我们也得承认，马克思的检验带有辩证法的残余，但最终这些东西并非是决定性的。相反，这条道路已经勾勒出来了。在对抗方面，它建立在许多方法论的和物质的决定基础上。马克思道路的核心将在我们注意到的从非神话化到颠覆的段落中被探明。当颠覆在马克思主义本质分析的所有层面上都发挥作用，并赋予诸如货币、抽象劳动、机器、科学等范畴时，就不存在任何含糊的阴影。辩证法就会回归到资本。唯物主义成为唯一的水平线，完全由对抗逻辑和主体性赋予活力。共产主义过渡在这个阶段上遵循从自我稳定到自治的道路，到无产阶级更大的、更完整的独立性，

再到其道路的多样性。过渡就是所有乌托邦最终非神话化的地域，不管是空想家还是科学家；在不论有多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情况下超越主体性时，它发现了共产主义。这是所有辩证法的否定和颠覆。是马克思将自己非神话化的。马克思超越了马克思。这个过程的内容对于它自己的形式已经完全足够了：主体为废除劳动而进行的对抗过程。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摧毁。它是非劳动的，是主体的、共同的，是无产阶级废除剥削的计划。这是自由建立主体性的积极方面，因此所有的乌托邦都不再可能。

第九讲 资本主义发展与革命阶级

共产主义的动力问题。

□其积极的和消极的规定：从价值规律的危机到使用价值的再现(不确定性)。

□解决问题所必需的理论条件：作为生产流通的社会生产、作为无产阶级社会个体的基础和建构过程的生产流通及其矛盾。

□方法论的现状和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局限。

□“生产劳动”范畴的替代物：革命阶级。

□使得这一转换过程转化为共产主义动力的新历史条件。

□自我价值稳定过程，这一计划的理论—实践核心。

□共产主义作为解构资本主义发展的发动者和执行者。

□为了共产主义的批判：颠覆资本的范畴。

共产主义凭其自身的动力与进程所引发的颠覆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是巨大的。但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者话语中的辩证法残余的消极性影响。我们必须从中解放出来，并且给出关于共产主义动力的界定与解释，而不是泛泛而论。我们需要通过对转变形式的考察达成对共产主义的全新阐释。我们已经澄清了在马克思文本中所运用的对立逻辑和多元逻辑。我们看到它是如何真实地迸发的。同时也看到它扫除了很多理论障碍，这些障碍是辩证习惯的顽固产物。现在让我来考察这种逻辑是如何同时被特定的一般性论断所加强，被某些创见性的理论前提所支持，并被新的历史条件所证实的。我们现在就来试图理解这种分析是如何通过置换自身和摆脱自身局限而推进的。把对转变的分析植根于物质性中，意味着我们是在真实地讨论共产主义的动力问题。无论颠覆的力量为何物，我们已经了解

到这种力量是巨大的，尽管它只是一个暗示、一种危险和一种展望。经由过渡而实现共产主义，这才是新的问题。我们需要深入到这个问题的核心。

事实上，有各种不同的论断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尤其是那些具有否定性功能的论断，即那些强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危机，却同时具体地勾勒出其框架的论断。价值规律将消亡。如我们在《大纲》中所看到的那样，价值规律在资本的社会化层面上所带来的力量与效率之谜已经被破解了。价值规律抛弃了外在形式而陷入了贫困：价值规律的外在形式和内在贫困这二者都是价值规律的效应，但是前者是理性的，而后者则是被迫陷入进去的。此时涉及(抽象)劳动时间的关系已不复存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也不再有着确定的比例关系。而剥削规律的进步性表象却正取决于它们。一旦资本和全球劳动力完全变成了社会阶级(即各自独立并能拥有自我价值稳定化的能力后)，那么价值规律就只是对这种关系中所蕴含力量(potenza)与暴力的表达。它是力量关系的综合。所有肯定性的论断都变成了否定性的。指令、指令的计划以及对于危机被迫的超决定性：这就是“机器论片段”中所展现的价值规律。价值规律认识到自身的空洞，并将反对者的消极性视作对立。这种表象，这种综合的幻觉必然认识到自身是纯粹的表象与幻觉。它不是被创造出来的综合，而是力量的运作所促成的结论。这样，劳动阶级这一方就解放了自身，并获得了独立性。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与颠覆相当的力量。但这种假定是否将它所表现的现实力量考虑在内了呢？我们能在独立的环节和解放的环节上建立一种积极的辩证法；但解放运动并未指明这种解放的内容与积极性，没有说明关于它的动力以及进程的任何东西。我们从价值规律的消亡和它向指令规律的转化中所演绎出来的真理只是不完全的真理。如果不从交换价值的视野出发，那么可能会有造成这样一种结果的危险：任何一种参照系都变得模糊不清了(许多人在面对资本主义的危机时，在街头巷尾大声呼吁人们警惕法西斯主义的重生，这绝非偶然。我们无法靠否认问题来解决问

题。如果对共产主义的预言只是以价值规律的展开为基础，那么它就不过是一个无果的、不可行的预言)。

另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价值规律的消亡事实上会为无产阶级的独立提供现实的空间。这个空间虽然是模糊与不确定的，却是现实的。它积聚着使用价值、基本需要以及或多或少的直接行为。但对使用价值的需求自身并不能为问题提供确定的解答。正是由于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的思考上，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中许多人都在社会过渡问题上停滞不前，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科学迷宫。在颠覆运动自身内部，就会有一种必然的力量来勾勒出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因此我们看到，在描绘共产主义时，这样一种资产阶级思想的特征被凸显，这种资产阶级思想认为只要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进行简单的颠倒即可，事实上二者在市场问题上仍然是同质的。资本主义、危机、颠覆：其不确定的结果是导致一个自由(free)而又空洞(empty)的空间的产生。空洞，是因它仅仅包含着某种被推翻和倒置的自发性。正如市场，在其结构中，“普遍个人”只具有空洞的积极性。持存于使用价值直观性中的转变辩证法失去了意义。固然，这里的论断力图寻求积极的结论，但事与愿违。颠覆的进程与创造价值和价值规律危机的进程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后一进程只具有批判和暗示的能力。不仅仅是因为前一个进程作为它的使命已经完成；还因为它不满足于这种颠覆。那些试图为这个谜题提供解答的理论家们所做的尝试都不令人满意。其中最著名的是建立在过程多元决定论观点上的尝试，它由资本主义暴力和颠覆的无产阶级暴力的综合对立所构成。但当它尚未被组织成现实颠覆的物质性力量时，这种极端的无产阶级暴力的紧张状态，除了意味着价值统治以悲剧的形式再次出现，又能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单纯停留在颠覆的层面上，我们将无法从冷漠的使用价值的整体缺乏中获得解放，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倒向唯意志论或恐怖主义式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使用价值，就其自身而言，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说实话的孩子的直观正如皇帝本人一样是赤裸的。但我并不是将两者混为一谈。我坚定地站在一

方的立场上。但我并不因此而满足于这种直观。它是一个开端，一个再现的起点，一个合适的环节。但如果它未被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动力，它就只能是空洞且危险的。它与共产主义的动力和颠覆进程之间唯一的共同要素就在于肯定了这一过程中的暴力，在于否定了和平主义假设的所有可能性，在于将武力作为决定性的要素。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它与共产主义的原初性关联。无产阶级的暴力，就其作为共产主义的积极暗示而言，是共产主义动力的本质要素。抑制这一进程中的暴力无异于捆住其手脚，并将它交给资本掌控。暴力对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来说是首要的、直接的、有力的确定。它并未提供问题的解答，却是根本性的要素。在这一分析层面上（以及阐明的现实上），它或许是使用价值能够从模糊复杂的活动中显露出来的唯一手段。这种手段虽不充分，但却是正当的。无产阶级的暴力是共产主义的征兆。

我们不能在尖锐的理论对立或范畴对立的框架下去定位和解决共产主义的动力问题。否则，正如我们看到的，这将会导致不确定性。着手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意味着需要运用恰当的概念具体地认定共产主义动力的结构。问题不在于关注阶级构成和生产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的路径青睐数据分析，而工人行为的每个变化都被用来假定特定范畴的实在性。“在方法论上要花招，从而使研究变成静止的东西。”问题同样不在于客观地去定义价值规律的危机和权力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极权主义式的扩张。“洪流，跟我来！”在《大纲》中马克思提出了此问题，并界定了解决问题的条件。由于解答的要素仍是遥不可及的，这限制了马克思的研究进路。然而，这一解答仍具有相当的精确性。虽然没有赋予其特定的形式，但马克思的确接近了共产主义动力问题的真实解答。在《大纲》中，马克思从对剩余价值主题的关注开端，进而过渡到危机和灾难，直到这种对立贯穿剥削的每一个范畴并最终找到了它历史的归宿。接着，在他在理论分析上完成了第二次推进之后，马克思通过流通主题来展现现存社会力量之间的巨大对立，以及它如何导致共产主义的爆发。从这两

方面来看，它依旧是一种抽象的话语。从这两方面看来，要想达成共产主义，其间必须要有一个跳跃。即使这种路径的展望（如同在论证的第二阶段那样）是被主观化了，它仍然充满着模糊性。马克思意识到了这种局限，并想要超越它。如果马克思无法超越这种局限，他的全部理论方法就面临着陷入客体主义的危险，这是一种连《资本论》都无法逃避的方法论畸变。分析中所蕴含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确定性的匮乏。于是，马克思主张把剩余价值的进程和它巨大而可憎的剥削量（以及它所导致的极度的对立逻辑）结合起来，把它与其他进程即在资本和全球劳动力流通范围内的社会化进程结合起来。这种对立必然会成为社会性的，全球劳动力必然会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革命阶级。在《大纲》的最后部分，马克思通篇都竭力试图达成这一新的阐释层面。我们可以毫不避讳地说，结论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我们将看到何以如此。但这些结论是前后一致的。现实中，正是在分析的这一阶段，在资本的一方，形成了利润范畴；在工人阶级一方，社会对立和自我价值稳定化（self-valorization）这些范畴也开始出现。在这个进程中，共产主义的动力问题能够得到正确解决。这既是就马克思而言的，也是就我们自身而言的。马克思自己只得出了部分的结论，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障碍；相反，这应促使我们沿着马克思的假设前进。

在无产阶级的主体性视角内，有关剥削和流通的研究构成了解决共产主义动力问题的基本理论前提。在对资本的考察中，马克思就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进了。如我们在第五讲所了解到的，利润范畴的定义正是从剩余价值理论与流通理论的密切结合中产生的，而它的最为全面的定义是本章需要考虑的问题。剥削的平均化（Ausgleichung），它内部的平均化，它在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模式中的构造，正是剥削关系在社会流通中扩张的结果，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结果。颠覆和无产阶级价值稳定过程（valorization）的平均化也必须遵循同样的路径。考虑到这种颠倒只是一个开端，在资本路径和无产者路径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相似性。这决定了对

立的逻辑。颠覆的时刻否定了相似性，而肯定了绝对的多样性。然而，我们必须检验这个颠倒的时机。这一时机出现在（并且只能出现在）剥削规律消解于流通之时，以及生产流通转变为社会主体的对立之时。这一认识至关重要。虽然存在历史的局限，但以非凡的洞察力和预见力著称的马克思成功地在这两个领域进行了探讨。他彻底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也就是生产流通的形成问题），并且接近了第二个问题的解答（即社会层面上的对立问题）。说他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是因为他在这里与他在解决利润问题时所依据的是同一个理论基础。说他只是接近了第二个问题的解答，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依据的理论基础并不充分。马克思利用了所有给定的条件，也积累着用以说明无产者主体的独立性的所有方法。但这里，为了向前推进这一主题，唯一拥有的条件就只有一种，那就是我们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成熟的革命实践。这种趋势力图在具体的论断中证明自身，正如抽象概念试图肯定自身。阶级斗争经验的历史局限阻碍了这种趋势证实自身的进程。这一分析的力量却能推进这一趋势，并将这一趋势以煽动性的方式揭露于现实之中，以至于并不需要太多的工人斗争就能够实现马克思所指出的“另一种”工人运动。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谈。

货币——流动着的消极关系。当马克思引入这一主题时，他就立即洞察到它的重大意义。根据第一个解释，流通对货币而言并不充分，货币与流通具有关联性，但这种联系并未穷尽流通的内涵。事实上，流通是生产的中介。在这种意义上，货币就被积极地表现为“生产工具，因为流通已不再表现为流通的最初的简单性，即量的交换，而是表现为生产过程，即实在的物质变换。于是，货币本身就被规定为这种生产过程的特殊要素。”^①但这里还需要考察第二点。消极的货币变成了积极的货币。更重要的是，货币的这一转变必然会改变流通的一般定义。“过程的稳定连续性，即价值毫无阻碍地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71页。

顺畅地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或者说，由过程的一个阶段转变为另一个阶段，对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说，同以往一切生产形式下的情形相比，是在完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为基本条件。”^①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力量展现了惊人的流动性、交换性与创造性。

首先从客观的角度来理解资本本身：

但是，如果说这样一来，资本作为流通的整体，是流动资本，是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那么资本在每个阶段上，就是处在一种规定性上，表现为被束缚在特殊形态中的东西，这种特殊形态是对作为整个运动主体的资本的否定。所以资本在每个特殊阶段上，都是对作为各种转化的主体的它自身的否定。非流动资本。固定资本，本来意义的被固定起来的资本，它固定在各种规定性中的某一种规定性上，固定在它必须通过的各个阶段中的某一阶段上。当资本停留在这些阶段中的某一个阶段上时，——这个阶段本身不表现为流动状态的过渡，而且每个阶段都有其持续时间，——那么，资本就不是流动的，而是固定的。

当资本停留在生产过程中的时候，它是不能流通的，是潜在地丧失价值的。当资本停留在流通中的时候，它是不能生产的，不创造剩余价值，不是作为资本处在过程中。当资本不能投入市场的时候，它便作为产品固定起来。当资本不能和生产条件交换的时候，它便作为货币固定起来。最后，在生产条件停留在自己作为条件的形式上而不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资本就又固定起来，并且丧失价值。资本作为通过一切阶段的主体，作为流通和生产的运动着的统一，作为流通和生产的处在过程中的统一，它是流动资本；资本作为束缚在每个这样阶段上的它自身，作为具有自身差别的资本，是固定起来的资本，被束缚的资本。作为流动着的资本，它把自身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533页。

定起来，而作为固定起来的资本，它在流动。^①

现在让我们再从主体的角度，来看看我们能得出什么认识。事实上，资本在这里表现为主体，表现为一个能动的、创造性的实体。但资本是一种关系。在此关系中，无产阶级的对立必将获得发展，并获得完全的主体性。资本生产所包含的流通必然会将对立提升到同样的高度。关于社会化的前提（我们在第六讲中考察过这些前提），我们必须补充一点，即另一主体（无产者主体）的出现不能不延伸到整个流通领域。与此同时，无产者主体的运动将产生一个与它对立的自然和历史的复杂力量。自然地，这是一般性的定义。但却是一个可靠的定义。在这种社会化程度下，生产如此深刻地与流通交织在一起，它们组成了资本主义关系，这种关系的社会效率不断地增长。正是在这个阶段，无产者主体同样占据了社会中的一方。

如果社会生产将流通归入生产流通——并因此在此层面上提出同样深刻和宽广的工人阶级运动的观念——总之，当所有这些都给定了的前提下，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马克思是如何在此背景下探讨问题的，以及他对于我们所提到的那些基本问题，究竟得出了哪些结论。由对立而获得独立性的社会阶级是否存在扩张的领域？马克思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如前所述）。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总是接近了问题的解答，而且他明确地在寻求问题的答案。此外，这种研究的结论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我们应当补充道，如果我们只获得了本质上是消极的近似性，如果它们主要是在对由社会化的资本所引发的新的矛盾加以分析过程中形成的话，那么，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些结论并非是无关紧要的结论，这些结论也并不仅仅是对资本及其发展的肯定性方面的简单否定。这些结论是我们通过矛盾所把握的，是关于复杂的阶级现实的、分散的，然而也是真实的因素。它们并不因其分散性特征而变得无关紧要。因此，现在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7~8页。

时候来考察主体(无产者主体)是如何在生产流通的内部获得自治空间和动力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点是马克思对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在生产流通中的矛盾所展开的分析。他写道：

价值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或者说，现在表现为资本躯体的使用价值所具有的特殊性质，本身在这里表现为规定资本的形式和活动的东西，它赋予某一资本一种与其他资本不同的特殊属性，使资本特殊化。因此，正如我们在许多场合看到的，以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在简单流通中，只要这种区别得到实现，它就不属于经济的形式规定了——根本不属于经济的形式规定，那是莫大的错误。^①

我们必须将这一分析具体化：

同一规定，时而表现在使用价值的规定上，时而表现在交换价值的规定上，不过是处在不同的阶段上，并且有着不同的意义。使用就是消费，不管是为生产而消费还是为消费而消费。交换就是以某种社会过程为中介的这种行为[使用或消费]。使用本身可以由交换造成，并且是交换的简单结果。另一方面，交换只表现为使用的一个要素，等等。^②

总之，“使用价值本身起着经济范畴的作用。”^③我们如何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使用价值的运动呢？当然不是像“蒲鲁东先生和他的那些社会感伤主义者”那样，承认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在这种社会化的程度上是同一的。相反，资本主义流通的社会延伸使得使用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37页。

② 同上书，37~38页。

③ 同上书，37页。

值和交换价值首先显现为矛盾的，并且总是矛盾的。这种有关具有能动性的矛盾的最重要的案例被描述在关于小流通的那一节中。我们在第七讲中已经较为详细地讨论过那一节。

但正如我们所见，这种关系同样可以变成对立的。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必然屈从于一种双重运动：一方面是通过规定价格的再生产，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自治的再生产。这种在原则上相矛盾的差异，可能上升为对抗。

什么时候这种对立的可能将变成现实呢？在我看来，当马克思将矛盾的分析归于阶级构成的本质以及剥削的质的规定性问题时，这一进程便开始了。“在我们考察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时，如绝对地看，这种生产的条件就是带来最大相对量剩余劳动的最大绝对量必要劳动。”^①这里提到的是剩余价值的量和比率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我们在第五讲中所分析的）完全是危机主题的内部问题；资本受利润规律的推动，并将其力量推至极致；但与此同时，它发现自身完全暴露在对剥削的逆来顺受之中。当这一规律从“趋向”的抽象范围内消失，并降临到相互斗争的阶级间的历史关系层面时，必要劳动，它的大众化，它的定义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联——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的关系完全主观化了。它赋予了它最大的主观强度。正是在这里，我们一直追寻的线索才开始汇聚到一起：从必要劳动、使用价值，一直到从价值规律的消亡中得出的消极论断。在这个层面上，资本主义的关系被消解成了力的关系。这不仅仅是因为资本无法强加推行价值规律，并由此肯定自身的合法性，最重要的是因为工人阶级一方已经将自身主体化并上升为对立的力量。

我们现在必须考虑第三个要素：这是个很重要的要素，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在社会化阶段中的工人阶级构成问题上继续推进。在分析的这一阶段上，马克思问自己：在流通和生产彼此渗透的情况下，在如此剧烈并突出的对立面前，到底会发生什么？需要强调的最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612页。

要现象是，在这些前提下，等价物的中介功能被削弱了。资本，它常常将流通时间视作生产的障碍，它常常倾向于将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之间的矛盾降至最低，它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力的关系中间，这种关系在需要继续这场游戏的同时，也发现了它必死的宿命。“资本的必然趋势是力求使流通时间等于零，即扬弃自身，因为只有资本才使流通时间成为生产时间的决定要素。这等于扬弃交换、货币和以交换与货币为基础的分工的必要性，即等于扬弃资本自身。”^① 横向上的等价物必须主导流通，正如纵向上的等价物必须主导剥削一样：一个人无法同时遵循两条路径。流通和生产的同时性，以及生产中的对立，使得将某种符号归为等价物成为不可能。它们破坏了能够在它们变得对立之前影响这些矛盾的控制的所有职能，尤其是货币的职能。相反，我们看到的对立力量将它自身根植在使用价值和必要劳动的大众化中，这一力量在此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集体的解放空间。资本主义控制手段中更有力和更有效的方面（即使用价值所决定的不平等）也萎缩了。

但是这还不够。新的矛盾又出现了。我们知道，固定资本包含着再生产社会整体的潜力。我们也知道它不像使用价值那样进入流通领域。我们也知道固定资本要求、分层组织、运作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的机制。我们同样知道，这种再生产只是在人类需要的驱动下才是可能的。然而，在我们所得出的结论中，这些关系成为了不可能，因为一方面资本不再拥有解释发展（等价物）的钥匙；另一方面，工人的使用价值在发展自身的主体性时变成了强大的对立物。固定资本使自己成为了工人主体性的敌人。紧张状态达到了顶峰，它成为了对立双方都试图消灭对方的斗争的理论根基。这种起初只是表现为某种可能性的矛盾，显露了它的现实性，并将自身转化为对立。对立的条件，在对暴力的期待的强化下，将把对立者的消灭视作它们的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7页。

我们已经向前迈进了很好的一步。我们开始考察共产主义的动力是如何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范围内成为独立的进程的。共产主义的动力以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危机所带来的主体性作为基础——它消极地，单纯地为其创造了空间——但它同样在这种危机中发现了发展和丰富自身的可能。一旦获得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生产就使得生产与流通间的联系成为必然。渐渐地，流通和生产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变成了相互影射的概念。资本关系的社会对立最终炸开了这个集合体。工人阶级的概念和现实被改变并促成了这种爆发。不单单是“工人”与“无产者”之间的新对立被取代了，而是无产阶级的构成。在这个空间内，它是发展着的阶级的整体构成的进程。显然，它不过是赋予其意义的整体的重新构成；显然，所有这些方面发现它们只有在主观的方式中才能得到统一，只有这种对立和对它的打破的切中才允许这一事件发展到它的全体当中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同时遵循《大纲》中所指出的不同途径。该阶级中的普遍个人在此表现为通过使用价值从而使自我价值稳定化的活动，而后将必要劳动的价值大众化并提升到非常严格的高度。他或她的力量自身包含所有资本主义等价规律，以及所有被神秘化了的剥削的目的。最后，依然是在《大纲》中，成就普遍个人的进程将自身展现为与固定资本的运动处于冲突关系中：这是决定谁控制、谁来支配固定资本这种用以社会再生产的必要中介的问题。在社会化的，普遍个人成就自身的同一进程中，它表现了其具有这种支配力。

按照马克思界定共产主义的方法，只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的颠覆，而且这种颠覆突破了既有的范围时，共产主义于是便开始从云端降下。普遍个人不再是人道主义的怀旧产物：他是唯物主义进程的产物，我们必须在每个质的飞跃，以及主体在每个规定性上的深化理解中引入这种唯物主义的分析特征。最后一点：在这个进程中不存在任何“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中只存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随之而来的时期”，它是与其同时的、蕴含巨

大的对立力量和消灭现实的力量时期。

然而，我们留有一个近似值。我的意思是，马克思为我们展示了一条更宽广的道路。他提供的理论要素更多是过时的观念而非系统的发展。这条道路，就算是从颠覆到建构，仍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所采用的方法的前后顺序导致了他思想中一贯的局限性。这意味着，剩余价值论和生产周期论的牢固统一不能完全取代各自的术语。每当我们面对这些伟大的理论时刻时，我们会感到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阻碍着我们，使我们看不透综合性，达不到对组成部分的新理解。因此，每当我们以为自己终于穿过了形成过程的一部分时，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与此同时给我们作了一种新的描述（一种非同寻常水平的理论提升）：或是剩余价值论，或是生产周期论。这种取代是不自觉的，其结果也是站不住脚的。而且，马克思拥有再现的工具，他为术语替代的过程所吸引，这种替代使得他能改变他研究的基础并实现他所追求的目的。就像他的辩证逻辑被分离逻辑所取代一样，这种替代使得他（在工资、小规模流通、需要问题等方面）得以建构关于讨论主题的相反形象；同理，主体性与循环，从价值规律篇到自我实现规律，对超越价值规律的所有可能性的详尽表述中——这些都应该出现的，而且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并且，如我们所见的，这是以部分的形式出现的。但这还不是全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方法仍停留在为历史可能性经验所追踪的局限上，他所得到的最先进的理论图式仍停留在这一局限上。我们已经对《雇佣劳动》作了评论，也在此对它与《论共产主义社会个体的构成》的关系作了评价，认为是工人组织的滞后阻止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甚至可以怀疑马克思害怕陷入乌托邦主义，害怕未来可能的组织在理论和组织上没有公度性。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点评论。第一，这再次确认了我们在第一讲已经说到的，即马克思从来没有（包括在整个《大纲》中）一种与其说是与实践（在实践中确认的可能性）分离还不如说是与组织（转换为组织的可能性）分离的理论态度。如果联系到马克思工作所处的政治条

件的话，那是很愚蠢的。然而，事实就是这样。这是一次很好的教训。考虑到隐含在方法中的局限，第二个需要在这里考察的是其异乎寻常的理论后果：自我实现和个体在共同体内的建构过程不仅在取代交往的普遍条件时，而且也在成为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时获得了成功。这意味着，建构的主题迫使我们到达这样一个理论阶段，在这里无产者行为的具体决定、无产者的集体实践成为理论动力，成为理论前提的经纬，成为拥有强大的实现自由和自我呈现的力量主体。在理论取代的这个阶段，改变的是理论预设，产生的是主体的转换。没有这种主体转换的经历，超越简单的幻想就是困难的。我们不是要把这个理论演进的清楚犀利的意识强加于马克思，从而判定其局限。我再重复一下，这些局限来自于工人组织的滞后。此外，如我们所见，马克思的理论洞见力早已超越了这些局限。这就是说，在这个过程的再现——从而共产主义的集体个人的建构——必须改变自身，多多益善，以成为一种自觉的再现。

让我们回到马克思思想的这个局限。当马克思把生产和再生产紧密联合时，他并不能（用充分明白的术语）在其所有的物质性上解释社会劳动过程。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为我们在总体上展示了这个系统怎样再生产自身，以及其对立面如何再生产自身，但马克思从来没有来重新考察处于生产流通阶段的生产过程的本质，也没考察生产力的本质。现在，让我们停下来考察一下生产力概念。马克思告诉我们的，我们经常有机会去考察。生产剩余价值者即为生产力。这是我们同意的。但是，当我们要找出剩余价值的源泉及其生产循环时，问题就来了。现在，因为生产和再生产如此密切地混在一起，我们没法分辨出从事直接生产的生产力和从事再生产的生产力。生产循环集中于社会资本的总体中，所有的社会劳动（直接地或间接地）立即地或长远地都被视为从事再生产的生产力。这里，成为马克思分析第一个范畴的一般社会抽象劳动，取代自身获得了一种历史维度，一种具体的维度：它自身即是共产主义社会个体的构成因素。概念和真

实的生产力向循环、再生产的扩展，不仅导致历史特性的出现，还导致出现共产主义主体的历史个体性形成过程的多样性。这样，在定义上，在理论层面上所达到的这个过程，使马克思能实现这种扩展。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定义是一种再生产性的定义，它和人力劳动的社会主义价值论连在一起。当理论条件改变时，这种价值论依然起着决定作用。多深刻啊！对生产力概念的唯一取代就是革命阶级的定义。为了保存这种价值而定义这一概念，并把系统中所有其他的和定义取代，这没什么用，也不会有什么结果。马克思曾饱受由工人运动的这种局限性所带来的苦恼。

但是，让我们从另一方面继续考察隐含在生产力概念中的理论可能性。其从生产经生产循环到再生产的演进，是共产主义社会个体的建设性实践的宝贵的发展指数。在这个过程中，革命阶级将成为这样的范畴：其独立发展将包含形式的多样性和生产力关系的多样性，它将在通过自我积累从而成为稳定资本主义的潜在性力量的同时也成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替代性力量。拒绝工作，这作为共产主义的内容和导致自我实现的解放过程的尺度，当它处于与生产力的普遍关系时，它在这里同样显现出具有生产本质。这是因为，运用其强大力量去摧毁剥削的锻炼，对其自身产生于生产的普遍合作和连续交替中的创造性能量的解放，都大大地扩大了。革命阶级通过自我实现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的强度和广度使之看起来像是发展的结果和自身彻底翻转的结果。从字面上讲，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个人的概念的抽象和普遍方面，在此彻底淡出了。我们可以复原马克思的理论，如果不仅仅是望文生义的话。正是这种理论，引导我们去分析联合生产的深度，去把集体力量视为建设性的实践。理论框架的牢固扩展，一种将全社会的对立能考虑进去的扩展，有时候看来并不能把表示这种联合的程度的概念和表示这种既有创造性又有破坏性的力量的概念在分析中连接起来。但是所有纠正这种偏差的必要条件都具备，并且可以得到复原。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

对共产主义的动态性所下的定义导致了新的方向。在全球范围内取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条件，必须同时取代对主体构成的所有条件。它所显现出来的不是简单的两极对立，毋宁说是革命阶级、财富和自我实现。

赋予共产主义以物质力量，使之更具历史力量（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是我们今天的事业。今天，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和工人组织的条件都已经成熟。我们今天的事业，恰恰仍然是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的。我们可以将之想象为实际运动所形成的轨迹。正如有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讨论中所暗示的那样，唯有实际的运动能改变这种革命阶级的构成。这种实际的运动是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马克思所定义的成熟趋势，该趋势使得在物质基础上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的努力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从而为这条道路和这个阶级提供现实性。显然，我们在此没有把过渡问题（比如我们在正统的政治马克思主义中所发现的）加以考虑。这里的政治批判，远没能呈现出马克思应该发现的领域，这些仍然是被预设的。“正统的”过渡理论是单纯而简单的发明，是可怕的想象。在马克思的分析里，共产主义的动力呈现为一个敌对的过程，它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统治的总体性赋予社会，另一方面又从中产生出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以实现其独立、自由和富裕。超越之路成为不断重复的反抗的累积和这种反抗需求的表达。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性功能得到发挥，甚至在很多时候它决定并接收自我实现的新空间。多样性、差异性是无产阶级财富发展的重要特征。今天，我们眼前所见到的，既有高水平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体性，又有无产阶级的运动和需求所带来的财富：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们能证实马克思的道路。现在它就在我们眼前。有看到这一点的渴望和能力就足够了。这个道路是阶级间永久战争的源泉，此路也许会很漫长，而且它每一步都是物质的。离开无产阶级，这一过程、这一革命道路就变得完全不可能。

这个革命最终使其定义的重要性得到恢复：这个革命是以集体主体的物质性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所探索出来的这条道路的

不可逆转性，植根于阶级构成的物质性，并在其必然的由敌人决定的斗争(如马克思所说的“最后的”斗争)中得到巩固。没完没了而又无聊的关于这一道路是否可能(后者往往是凭理性而非热情所能达到的)的讨论就到此结束吧。这里没有什么要决定的：在革命中，一个人要么活着，要么死去；在共产主义社会，一个人要么活着，要么活下去。在阶级战争的条件下，决定性的力量始终在于未来。

物化共产主义，要变成历史力量，如前所述，就要在其现实的动态过程中寻找共产主义。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以同样的方式，以阶级构成的条件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问题在于展现阶级构成怎样以不可逆转的方式决定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向。所有的理论条件现在都汇聚在一起了。这个问题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提出来的，我们只有在集体实践的构成性现象中解决这一问题。这一实践，给定现有的阶级构成以条件，能在自身中复原对阶级的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别为他们庆祝：为自我实现过程的越来越具体的决定作用而庆祝吧。我们总是回到同样的观点：自由，工人阶级的自主的自治。资本毫不费力地就能看到这个问题的出现，在其中看到解释危机的关键所在，看到所有可控范畴的失效。从工人阶级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是困难的，因为否定性和解构的力量还不足以支持这样的解释。获取强大而合理的积极性，解释自身的发展，是自我实现发展阶段的财富的一般特征。当然这是一个难以满足的需要。考虑到资本的现实运动，我们在对立阶级的边缘处去制定战略，则是更简单的做法。但是当我们必须转而谈及有关这种阶级的自我构成的复杂战术时，我们只不过是给出了模糊和分散的定义而已。首先，阶级构成既是多元的又是积累性的。自我实现的战略必须以能动的多样化为基础，这种多样性来自工人的社会化水平，来自大量的各种压迫，来自需求，来自行动，更来自对每一个不断形成资本家的环节的关节点的攻击能力。这种财富和多样性表达自身的方式施加一种从总体上控制的灵活性给资本。但是请明白，灵活性只是资本一方的：工人一方只有多样性、多元性、能动性，这些财富都是没有弹性的，而且事实上还相当苛刻。第二点需要注意的是：革命

阶级在阶级构成的持久过程中的自我转化，将导致质的飞跃的综合体；这就是在阶级成分的物质地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资本可以控制，可以阻碍这一形成过程，但是决不能使之逆转。马克思在社会化辩证法前提的发展中为我们指出的对立阶级的爆发时刻，是物质地包含在必要工人的现实性中的。最后是第三点：我们必须明白，阶级成分为其多样性和严格性增添了新的因素，它将展现出由联合所产生的极大的力量。我们终于能把阶级成分如其所是地称之为共产主义成分。作为前提的共产主义已经表明了这个阶级的能动性，并不断地被这种能动性所激活、所勾勒。暴力，计划，战争，客体的一体化，先锋所受的攻击，在无产阶级自我实现时刻的历史表达中所遭到的抵抗，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解释，上述因素是最有说服力的。

为更好地勾勒出这种能动性的特征，让我们现在看看阶级敌人是如何行动的。由无产阶级在自我实现运动中的社会联合所产生的自治是敏感的。如果考虑造反的因素，自治是如此的敏感，以致它将始终成为一个重要的框架，而且也成为资本方面的战略进攻的焦点。资本家将以继续重组社会结构为手段，以社会化、扩散的、放大的生产线来应对工人首创精神的多样性。资本家于是极尽刺激之能事，只不过是為了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腐化、分割工人而已。这种手段简直就是纯粹人为的、政治的控制，因为（就像我们在第二点中所看到的）自治是这样的苛刻，以致它阻止所有可能会导致生产削减或不景气的行为。自我实现阶段的工人联合的程度是无法计划的，这至少将表明资本关系的政治和暴力特征。这里，资本完全局限于以力制力、以暴制暴的目的。所有这些在我关于共产主义（阶级成分的共产主义现实性）已经期待并准备将终结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观点中得到证明。在其作为动力和构成因素的角色中，共产主义显现为摧毁资本主义发展的引擎和力量。所有马克思已经指出的能动性——我们已经在《大纲》的最后部分看见过这种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也是过去发展过程的最初表达——都在这里找到了它们的结论。矛盾不再是暗含的而是现实的了；其条件是敌对的差异和相反方向

的发展，尽管它们是分离的。自我实现施加给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不再是解决于资本主义关系中的辩证法的效果了；相反它是纵向联合的条件，是通过位置（自我决定的分离的位置）的力量施于敌手的逻辑。这样，今天我们在马克思用最初的鹅卵石铺就的道路上，就可以把“超越马克思”提出来。但是，一旦我们迈出这一步，面对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以及它的能动性所具有的强大内涵，我们就不要心存怀疑，就必须不断地对自己说：是的，我们已经超越了马克思。

很多人已经说过，《资本论》在帮助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方面并不明显。特别是修正主义者（这些人在资本主义的当代转型发生之前就迫不及待地这样宣称了），他们通过诋毁使马克思著作充满生气的革命精神来反复宣称这样的观点。但是在他们的恶毒动机之外，修正主义（此后，同样权威的分析贴上的所谓的众多趋势）已经找到了足够的空间支持他们的抱怨。有的修正主义者说，我们必须现代化，必须在现有的资本现象水平上、在资本的社会发展中，重新定位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本概念：资本、工人阶级、帝国主义。难道我们能对此做出肯定性的回应吗？我所谈论的全部事情都处于这样的现代化形势之中。但以这种方式看待事情够吗？让我们来看看。首先，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特征加入考虑之列，从而为马克思主义范畴构筑新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大纲》是《资本论》的先行者，因为在《大纲》中诸范畴的社会特征一出现就立即是基础性的。在《大纲》中，几乎找不到有关私人 and 公共之间的辩证法的重要头绪，而这种头绪允许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此加以合理的批判。当然，这样的说法并不意味着能在《大纲》中看到这些范畴的完全再生。当然不能。在许多时候，我们在一些定义中看到了伟大的原创性，但我们应该相信，就算在马克思走得最远的地方，他仅仅（就像我们已经强调的）为资本新社会现实提供了暗示而已。《大纲》超越第一点（为社会化必然性中的新范畴提供新基础）的地方，毋宁说是社会对立主义的定义。在那里，诸范

畴突破了任何可能的改良主义观念，也定义了马克思范畴体系走向现代化的第二大基本因素。

让我们休息片刻来考察一下这个最后的因素。这个因素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开创性也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性，这就是《大纲》的真实情况。马克思的理论在此强调的是社会化理论和剩余价值论的一致。后者使得在对立的条件下理解前者成为可能。社会化理论能使我们把剩余价值论推向普遍的水平。“普遍的水平”意味着现代化工作和马克思主义范畴的重新奠基必须能够在其目标中理解国家管理下的资本发展，理解越来越激烈的多国生产模式正在朝着国际水平成长。政治经济学批判应该同时是政治批判、社会主义批判以及国际性批判。但是这些普遍的水平却表明了真实的对抗程度的水平。资本以国家形式获得的发展，政治机制在动态积累中的干预，政治控制处于其核心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精心设计（有人称之为“后泰勒主义”），所有这些问题将对抗性的工人国家置于临界动态的中心。马克思（特别是在《大纲》中）经常频繁地指出，国家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资本。生产模式的发展使我们认识到，国家是资本的唯一方式：一种社会化的资本，它的积累凭借的是力量，是剩余价值论向关于命令的理论的转变；是市场投放到市场循环的转变，是跨国公司支配下的国家发展。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发展和重新奠基，决不能使我们破坏所有的理论努力，而忘记社会化资本这个中心问题。我们必须从积累、计划的国家集中机制，从各国资本主义的集中化对生产、再生产的所有工具和变化的大量重组来重新阐释资本概念。这是要从《大纲》迈向《资本论》吗？是的，但这是从精确的意义上而言的。对共产主义的动态性分析，则是在另一个补充意义上而言的，这是一个有机的补充。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有可能在对立主义的强度上试图分析共产主义的动态性。我们必须用相反的形式来理解资本主义积累的进步。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个颠倒概念还原为分离概念，那么我们就不能这样去理解资本积累的进步。资本的关系是一种力量的关系，这个力量针对的是它的敌人——工人阶级的自我实现过

程和共产主义的能动性——的分开和独立存在。对立主义不再是辩证法的一种形式，而是其自身的否定。当今时代有很多关于“否定思维”的说法。是的，否定思维，虽然来源于资产阶级，但已是工人阶级观点的基本因素。让我们开始使用它吧，它将给我们带来成果！这些成果，在所有独立性方面，将会收获（也会促进）工人批判的健康、团结的发展。

更进一步说，一旦所有的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仍然必须走这条最内在和重要的路：这条路需要对集体实践，对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作出分析。根据这样的观点，让我们再考察下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非常重要的一段：首先：资本迫使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来做剩余劳动。只有这样，资本才能增殖自己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资本确立必要劳动，是因为并且仅仅由于劳动是剩余劳动，而且剩余劳动可以实现为剩余劳动。可见，资本把剩余劳动作为必要劳动的条件，把剩余价值作为对象化劳动即价值本身的界限。如果资本不能确立剩余劳动，它就不能确立必要劳动，而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只有资本才能确立必要劳动。因此，资本就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用人为的障碍来限制劳动和价值的创造，而资本这样做，正是由于并且仅仅由于它确立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统一理由。因此，资本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说会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这种界限是和资本要无限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因为资本一方面确立他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①

我们已经从另一角度阅读过这一段并作出评论了。现在我们想重读并作出相反的思考。这种方法能使我们重新发现这种新“活生生的矛盾”的发展方向，这一矛盾就是在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工人阶级和无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04~405页。

者。在这条道路上，每一个局限(阶级构成的苛刻环境、被限定了的必要劳动水平等)看来都是拦路石。但是，在资本的局限存在并被由于其不断设置局限和比例而被视为障碍的地方，在这里(根据工人阶级的观点)局限在其恰当的意义上看起来是障碍，是来自另一方。这种看问题的方式是对立主义的方式，因为运用这种方式，障碍的克服并不会产生新的障碍，而会产生最全面地发展使用价值和活劳动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根据马克思的方法，工人主体性成为革命阶级、普遍阶级。在这段话中，共产主义在其构建过程中实现了全面发展。我们必须强调，有鉴于此，对抗的逻辑终结了所有二元论，绝不在其范围里接受敌人的经济现实。它拒绝辩证法，哪怕是在简单范围内。它拒绝所有两面性的客套话。对立过程在此倾向于发展为霸权：它要摧毁、镇压其敌人。拒绝辩证法：这是犹太教和基督教思想的永恒法则，或者委婉地说是(西方世界的)理性。我们已经在马克思那里读到了解构辩证法的最先进计划，我们已经看到他朝这个方向迈出了许多步。我们现在应该全力参与。只有在这个形势下，我们才可能开始谈论新的范畴：不是关于资本的，而是关于推翻资本的。

在此，在我们著作的最后，我们将看到，我们对我们在讨论一开始的时候所提出的假设是满意的。我们必须解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内容。《大纲》为这个道路提供了根本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前进，重新发现把马克思思想向前推进的机制，那么我们最终会达到一个中心点，即对所有强调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只是在那里，我们才能找到马克思思想的实践特征。终结辩证法？是的，因为思想行为在这里并没有任何来自集体力量的自治，来自使主体能动地朝向共产主义集体实践的自治。敌人必须被消灭。只有共产主义实践能够而且必须消灭敌人。消灭了敌人，共产主义也就发展了自己，解放了自己丰富、独立的多样性。

译后记

奈格里的《〈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译稿总算完成了。但这并没有给译者带来轻松和宽慰，恰恰相反，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更多地感受到了自身的局限性，内中滋味可谓五味杂陈。不得不说，这本杰出的理论著作的翻译之旅是极其艰难的。

早在2009年初，中央编译局的鲁克俭先生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杨学功先生在筹划“国外马克思学译丛”的时候，就将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奈格里的《〈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列入了译丛的首批书目。仰赖两位先生的信任和提携，我们有幸参与了这套译丛的翻译工作。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译稿拖延了很长时间。每念及两位先生的信任，我们就感到无比内疚和惭愧。坦率地说，我们辜负了两位先生对我们所寄予的极大期望和信任。

当我们面对“国外马克思学译丛”的首批书目时，三位译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奈格里的《〈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一书。当初之所以选择这本书来翻译，完全是出于我们对奈格里的盲目崇拜。我们都曾读过奈格里与哈特合著的《帝国》，这本著作在国内学界的影响很大。在种种有关全球化的时髦论述中，《帝国》无疑是极具思想性的著作，《帝国》的作者在该书中所阐发的洞见总是令我们难以释怀。在阅读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虽然奈格里将福柯的生命政治纳入到对于全球化态势的分析，但其中许多根本性的洞见仍然根植于他对马克思的创造性解读，诸如《帝国》中对于“普遍智能”的精彩演绎，其渊源事实上就是马克思《大纲》中对固定资本和机器的深刻论述。在此意义上，奈格里在30多年前对马克思《大纲》的深度解读，已经奠定了这位思想家日后的思想轨迹。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未能认真阅读原著的情况下，就轻率地承担了本书的翻译任务。

然而，当真正着手翻译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自己的轻狂和草率。一方面，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学养；另一方面，我们也过低地估计了奈格里这本著作的难度。这就注定了我们要为当初的轻率和鲁莽付出沉重的代价。事实上，《〈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并不像我们当初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本解读，而是在解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构建奈格里自己的理论。如果对奈格里的思想没有足够的认识和研究的话，这本书的翻译始终是无法下手的。奈格里对《大纲》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我们之前对这部手稿的已有认知。当我们沉浸于思考何谓“资本的逻辑”时，奈格里却在书中致力于思考如何构造一个革命性主体从而彻底打碎“资本的逻辑”；当我们面对资本在当今世界的全面宰制而束手无策的时候，奈格里却在我们所不曾重视的“机器论”篇章中探寻工人自治运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当我们依旧习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分析我们所要面对的时代时，奈格里却异常响亮地提出了“拒斥辩证法”的主张，他强烈主张运用分离的逻辑和对抗性的精神来彻底击碎资本家与劳动阶级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毫不夸张地说，奈格里对于《大纲》的解读，由于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和独创精神，给我们的翻译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此外，由于奈格里本人的批判精神，他的语言风格同一般的学院派文字也大相径庭，这也给我们的翻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面对这些困难，我们曾想过放弃，也曾有过消极怠工的状态，以至于整个翻译进程屡次中断，持续了近两年时间，最终在鲁克俭先生和杨学功先生的鼓励和督促下，我们才最终完成了这部书稿的翻译。在此，我们三位译者诚恳地感谢两位先生对我们的宽容和理解。回首这段翻译历程，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治学的道路并不轻松。在治学之路上，首要的问题尚不是学养和功力的问题，而是学术品格的问题。如果没有负责守信的态度，没有基本的诚实和谦逊，我们在治学的道路上只能是举步维艰。经此翻译，我们痛感治学的过程来不得半点虚妄，也不能通过机巧和聪明来规避学术上的难题和

自己的责任。唯有踏实做人，才能无愧于心；唯有扎实求学，才能心安理得。对于译者来说，本书的翻译在我们的治学道路上是一个路标，将永远警醒我们以踏实的态度为人处世、读书求学。

在此书的翻译终于完成之际，我们仍然要再次感谢鲁克俭先生和杨学功先生对我们的教导和帮助。正是因为两位先生没有放弃对我们的教导和帮助，我们方能勉力完成此书的翻译。我们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石老师，她对意大利文的造诣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帮助。

此书的翻译由张梧、孟丹、王巍三人合作完成，其中第一、二、三讲由张梧翻译，第四、五、六讲由孟丹翻译，第七、八、九讲由王巍翻译。本书的中文版序言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石老师翻译的。全书由张梧统稿，由鲁克俭先生校对。中译本导言是张梧和王巍合作撰写的，杨学功老师做了文字上的修改和润色。

由于我们的学养功夫和语言方面的限制，在此书的翻译过程中，对某些概念和表达的转译常有力不从心之感。译文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和错误，完全应该由译者负责，我们也非常欢迎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张 梧

2010年11月6日